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1

- 一、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起步与发展 / 1
- 二、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曲折行进 / 24
- 三、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繁荣 / 27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 / 36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新阶段 / 36
 1.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译与出版 / 37
 2. 列宁著作的编译与出版 / 49
 3. 斯大林著作的编译与出版 / 53
 4. 马克思主义专题文集和少数民族文字本的编译与出版 / 55
-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 58
 1.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 58
 2.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 65
 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 68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 70
 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指导地位的确立 / 70
 2. 百家文化中的主文化 / 74

第三章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与中国/78

一、交贯古今中外文化源流的当代新儒学/78

1. 当代新儒学的东西学缘/79
2. 当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85
3. 当代新儒家的文化思想/92
4. 当代新儒学在海外的影响/101

二、当代西方文化思潮中的“中国热”/107

1. 眼花缭乱的当代西方文化思潮/107
2.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基本特征/121
3.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与中国的“文化热”/126
4.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131
5.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的影响/137
6. 批判地吸收与吸收中的扬弃/143

第四章 中外科技文化交流/146

一、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发展/146

1. 当代世界科技浪潮的挑战/146
2. 中外科技界的友好往来/154
3. 科学技术的国际化趋势和中外科技交流的广阔前景/169

二、中外重大科技项目的合作及其成就/172

三、享誉海外的华侨和华裔科学家/178

1. 数学界的俊杰/179
2. 物理学界的巨子/183
3. 化学界的奇才/189
4. 医学界的杰出代表/191
5. 建筑工程学界的佼佼者/192
6. 称雄海外的电脑大王/193

第五章 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195

一、求学海外的中国留学生/196

1. 走出国门/196
2. 留学生涯/204
3. 文化交流中的科学研究/211
4. 赤子之心/217

二、留学生与中国科学技术的璀璨/226

1. 教 学/229
2. 物 理 学/230
3. 化 学/231
4. 生 物 学/232
5. 医 学/234
6. 天文、地理学/235
7. 工程技术学/236

三、跨世纪的科技人才/238

四、外国留学生在中国/242

第六章 中外作家的“文学之交”/251

一、中国章译文学的繁荣/251

二、亚非拉国家文学的译介/265

三、前苏联和俄罗斯文学的译介/281

四、欧美国家文学的译介/293

第七章 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329

一、古典小说的译介/329

二、古代散文和诗词的译介/342

三、古典戏剧的译介/352

四、现当代文学的译介/355

第八章 百花齐放的海外汉学研究/377

一、前苏联与俄罗斯的汉学研究/377

1. 苏俄的汉学研究机构/377
2. 前苏联对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及其成就/387
3.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汉学研究/394

二、美国的汉学研究/399

1. 开拓中国问题研究新领域的费正清/399
2. 美国史学界的“中国中心观”/402
3. 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趋势/405
4. 美国的当代中国经济研究/411

三、英国的汉学研究/414

1. 英国的汉学研究机构/415
2. 《剑桥中国史》的编纂/426

四、法国的汉学研究/433

1. 法兰西学院与法国传统汉学研究/433
2. 法国的中学西渐研究概况/437
3. 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概况/441

五、德语国家的汉学研究/444

1. 德语国家汉学研究概况/444
2. 德语国家的大学汉学教学与研究机构/449
3. 德语国家主要汉学家简介/456

六、日本的汉学研究/463

1. 日本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463
2. 日本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468
3. 日本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473

七、印度、韩国、新加坡的汉学研究/478

1. 印度的汉学研究/478
2. 韩国的汉学研究/484
3. 新加坡的汉学研究/490

第九章 中外艺术界的“砥砺相进”/493

一、中外戏剧艺术交流/493

1. 外国戏剧艺术的借鉴和发展/493
2. 中国戏剧艺术在海外的传播/501

二、中外音乐、舞蹈艺术交流/506

1. 外国音乐、舞蹈艺术的吸纳/506
2. 走向世界的中国音乐、舞蹈艺术/514
3. 国际艺术比赛场上的中国人/520

三、中外电影艺术交流/523

1. 外国电影艺术理论的学习与实践/523
2. 世界银幕上的中国电影/528
3. 外国电影在中国的播映/535

四、中外美术交流/541

1. 西方美术理论、技法的引进与发展/541
2. 中国书画艺术的国际影响/547
3. 外国艺术展览在中国/554

第十章 五环旗下共铸辉煌/562

一、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562

1. 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564
2. 奥运史册上的中国之页/566
3. 中国与奥林匹克勋章/573
4. 国际奥委会主席与中国公民的情结/575
5. 奥林匹克运动的宣传和教育以及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管理/577
6. 中国与亚运会/579
7. 北京奥运会将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舞台/585

二、体育文化的国际交往/587

1. 常青的“友谊树”/587

2. 中国承办的国际比赛/591
3. 国际体育技术合作/594
4. 中国体育器材登上“大雅之堂”/599
5. 国际体坛的“中国第一”/602

三、球类交流/608

1. 推动了“大球”的“小球”/609
2. 国球“海外兵团”/613
3. 大松博文与中国女排/618
4. 中国足球的“走出去”和“请进来”/621

四、棋类交流/627

1. 中外棋手的“手谈”/627
2. 走向世界的中国象棋/631
3. 国际象棋在中国/634

五、中国武术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640

1. 中国武术的套路运动/645
2. 中国武术的对抗运动/650
3. 中国武术显现出的东方文化艺术/653
4. 出版国际武术教材/656

六、其他项目的交流/657

1. 跆拳道在中国大行其道/657
2. 中国跤热了西洋/661

附录一：新中国中外文化交流大事年表/663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671

后 记/676

作者简介/677

第一章 绪 论

一、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起步与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预示着中外文化交流将出现一个光明的前景。

还是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毛泽东就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①“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②中国人民正是以这样的姿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积极发展同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广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写下了新的光辉篇章。

1949年6月，以解放区一批青年艺术家组成的中国青年文工团赴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为标志，揭开了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序幕。中共中央对这次出访非常重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亲切地接见了代表团成员，指示他们出去要宣传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加强和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国青年的友谊，要向苏联学习。从此，新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紧密地围绕着外交活动逐步开展起来，成为中国整体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建国初期的形势所决定，我国首先开展了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目的是介绍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世界上更多的人听到新中国的声音，同时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发展新中国的文化事业。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为了“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①亲自赴莫斯科访问。翌年2月14日，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明确提出发展和巩固中苏文化关系，首次在中国同外国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中明确地提出发展双边文化关系的意向。1951年4月3日，中国驻波兰大使彭明治和波兰教育部长斯丹尼斯拉夫·斯克列杰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波文化合作协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文化交流协定。此后至50年代末，中国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先后签订了单独的政府间的文化合作协定，从而进一步将同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推进到更加全面、系统、深入的新阶段。

相互派遣各种文化代表团和艺术演出团体进行友好访问和演出，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1949年10月，以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西蒙诺夫为副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来华进行文化交流的团体，他们参加了开国大典，并访问了一些大城市。此后，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等国的文化代表团相继来华，他们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通过参观、访问、座谈，分别和我国有关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增进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在此期间，大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批外国艺术团体相继访华，其中著名的艺术团体有：苏军亚历山大罗夫红旗歌舞团、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国立民间舞蹈团、国家交响乐团、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乌克兰国家歌舞团、“小白桦树”舞蹈团；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军队歌舞团；罗马尼亚军队歌舞团、“云雀”民间舞蹈音乐团；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军队歌舞团；民主德国人民艺术歌舞团、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歌舞团、交响乐团；保加利亚人民军歌舞团；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国家民间歌舞团；朝鲜国立艺术剧院、人民军协奏团、朝鲜艺术团；蒙古艺术团、人民革命军歌舞团；越南歌舞团、人民军总政治局歌舞团；古巴芭蕾舞团等。这些著名艺术团体的精彩演出，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52年，苏联艺术团和红旗歌舞团在我国访问了20个城市，演出140余场，观众90万人，演出的广播或转播大会22次，有组织的听众达2500万人。

中国的艺术团体也满怀对人民的深厚情谊走出国门。从1949年至1956年，我国应邀去苏联进行访问演出的艺术团体就达21个，总共983人，其中包括青年文工团、人民解放军歌舞团、越剧团、杂技团、新疆歌舞团和上海京剧团等，他们的演出都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①中国出访的大型艺术团体主要有：1951年，由周巍峙任团长的中国青年文工团，访问了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苏联、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1953年，由周巍峙任团长的中国青年艺术团，访问了罗马尼亚、波兰、民主德国；1954年，由陈沂任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苏联；1955年，由丁西林任团长的中国艺术团，访问了越南；1957年，由周巍峙任团长的中国青年艺术团，访问了苏联；1960年，由王永年任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工

^① 《文汇报》1957年2月15日。

作团访问了朝鲜，由张致祥任团长的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随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等。中国艺术团体对于这些国家的友好访问，不仅介绍了中国艺术，而且通过艺术使各国人民进一步认识了新中国的新面貌，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并促进了我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

中国人民热爱世界各国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和科学论著，鲁迅先生当年曾经写下了题名为“祝中俄文字之交”的文章，但是他的这一愿望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得以实现。1949年后，中国著名作家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靳以、夏衍、曹禺、冯雪峰、艾青、赵树理、刘白羽、周立波等先后访问苏联。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吉洪诺夫、爱伦堡、西蒙诺夫、苏尔科夫、柯涅楚克、华希列夫斯卡娅、卡达耶夫、穆康诺夫等也都先后来华访问。两国的翻译工作者相互把对方的著名文学作品译成本国文字大量出版。仅1956年一年间，中国从苏联进口的书籍就有11500多种，总计达290多万册。中国向苏联输出的书籍也在10万册以上。中国共翻译出版了2400多种苏联书籍，发行数量达2630多万册，俄国古典文学和苏联各民族文学中的代表作品基本上都已经被译成中文，其中不少作品还有两三种以上的译本，《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等优秀文学作品，鼓舞着我国千千万万的青年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苏联翻译了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发行数量达1000多万册。^①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1957年谈到中苏文学之间的这种交流时说：“最近几年来，苏联出版了数以百计的中国古典和现代作家的作品。中国伟大诗人屈原的遗著、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两卷集）、施耐庵的《水浒》（两卷集）以及杜甫的诗集都已被译成俄文出版。中国现代作家鲁

^① 《文汇报》1957年2月15日。

迅、郭沫若、茅盾、老舍、赵树理、周立波、艾青、丁玲、刘白羽、萧三等和其他散文作家、诗人、剧作家的作品，都在苏联获得了普遍的赞扬。中国现代和古典文学被译成俄文和苏联各族语言，给予从事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们以很大的帮助。”他还指出：“俄罗斯文学，首先是普希金、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在发展现代中国文学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高尔基的艺术创作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比之任何外国作家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为有巨大意义。茅盾在《高尔基和中国文学》一文中指出，中国作家从高尔基的作品中继承了战斗精神，并学会了爱憎，该爱什么，该憎恨什么。郭沫若有次对我说，中国作家们崇拜高尔基。热爱他，并且追随他。”^①

据统计，中国从1949年10月至1956年3月，共翻译出版各国书籍23596种，印行36304万册，其中苏联图书10544种，人民民主国家图书656种，其他国家图书12756种。书刊交换截至1956年6月，北京图书馆和6个国家的564个单位建立了交换和赠送关系，收入书刊169014册，送出301615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与51个国家的737个单位建立了书刊资料交换关系，共收到157103册，送出39366册。^②

交换影片和广播节目是影响广大群众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建国后不久，我国就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大都签订了广播合作协定和影片交换合同，并曾互相代办电影周。中国影片和约六十个国家的观众见了面，并参加了各种国际电影节。《白毛女》、《钢铁战士》、《梁山伯与祝英台》及其他许多影片都受到各国人民的一致赞许。外国观众和影评界认为中国影片“敌我分明，具有高度思想性、战斗性和革命教育意义”，“令人百看不厌”。苏联和各

① 《文汇报》1957年4月15日。

② 《人民中国》1956年11月9日。

人民民主国家的电影，也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珍贵的精神食粮。截至1956年，新中国共翻译和放映外国影片440部，其中苏联电影405部，故事片189部，科教片155部。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等，对我国观众特别是青年人有着重大的教育意义，对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我国的广播组织和38个国家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参加了国际广播组织，并与苏联等10个国家订立了广播协定。新闻工作者的往来日趋频繁，仅1956年1月至8月，经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邀请来访的外国新闻工作者就有来自14个国家的64人。^①

在我国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占有重要的位置。亚、非、拉的许多国家，都有着古老而优秀的文化传统，它们曾经对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事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这些地区广大人民的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许多国家相继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其民族文化也随之得到了复兴，并且在新的基础上发出灿烂的光辉。到50年代初，中国与邻近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斯里兰卡）、阿富汗等国家先后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文化交流也随之有了相应的发展。60年代中期，又有许多亚、非、拉友好国家与我国建交，同时开展了文化交流活动。中国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协定的同时，也与其他许多亚、非、拉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1956年5月30日，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与中国正式签订文化合作协定，这是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在此期间召开的万隆会议，对于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次会议充分讨论了各国人民实现经济、文化、政治合作的办法，并将中印总理联合公报中提出的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

^① 《人民中国》1956年11月9日。

五项原则扩充为十项协议，为更加广泛地开展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万隆会议刚结束不久，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埃及宗教事务部长艾哈迈德·哈萨尼·巴库尔先后来中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成立了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中埃两国政府代表签订了《中埃文化合作的会谈纪要》。此后，中国和亚、非国家的文化交流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1957年12月，楚图南在亚非团结大会全体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促进亚非国家间文化交流的报告中指出：“亚非两洲文化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几千年来亚非各国和各民族间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我们的祖先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克服异常艰巨的困难，通过沙漠丛林、大海高山、开辟着文化交流的道路。他们为求知识、求友谊、求人类的幸福和开展各国人民间的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给我们亚非人民也给全世界留下了光辉的典范。”楚图南表示，“每一个国家在文化科学上都有其独特的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参考。例如，印度的水利工程，埃及的植棉经验，日本的水稻种植，尼泊尔的建筑艺术等等，都是值得我们中国学习的”。“我们彼此应该交换更多的资料，举办更多的展览以及其他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来满足各国人民对于古老邻居的亲切的关怀，不断增进彼此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并且相互鼓舞，相互支援，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善于在科学技术上相互学习和帮助”。^①楚图南的这一讲话，可以说是对新中国成立后与亚、非、拉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高度概括。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9年，中国和亚、非、拉的一百多个国家 and 地区建立了文化友好联系，有文化友好代表往来的达到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仅文化部门和文化友好团体之间有代表往来的就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②

文化艺术界的友好往来，是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文化

①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9日。

② 《光明日报》1959年9月24日。

交流的重要内容。1954年，由郑振铎任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了缅甸和印尼，开创了中国与亚洲友好国家表演艺术交流的先河。1956年，由楚图南任团长的中国艺术团访问了智利、乌拉圭、巴西、阿根廷，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访问拉丁美洲的艺术团。这一年，由鲍尔汉任团长的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出访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和黎巴嫩，这是中国访问非洲和中东国家的第一个艺术团。此后，中国艺术表演团体先后出访了柬埔寨、尼泊尔、阿富汗、也门、阿联的叙利亚地区和埃及地区、摩洛哥、几内亚、古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均受到当地政府和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受到数以万计的观众和各国舆论的赞扬。各国舆论普遍地表示感谢我们的文化艺术代表团给他们带去中国人民对和平与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中国艺术家们虚心地学习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艺术。1962年初成立的东方歌舞团，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学会了三十多个亚、非、拉国家的150个音乐歌唱和舞蹈节目。1964年，东方歌舞团应邀到阿尔及利亚、阿联、摩洛哥、突尼斯、叙利亚等国进行友好访问演出，在各国艺术家们的热情帮助下，又学会了许多新的节目。中国还曾派出艺术家专门到亚洲、非洲的一些国家学习各国优秀的音乐舞蹈和歌曲，并在艺术交流中相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53年7月，印度艺术团来华访问，并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演出，这是亚洲友好国家最早来我国访问的艺术团体。1957年8—9月间，哥伦比亚歌舞团和墨西哥民族现代芭蕾舞团来华，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太原、石家庄等地向广大观众介绍了粗犷、奔放的歌舞节目，这是最早来华访问的拉丁美洲国家的艺术团体。1960年，正在为民族解放进行艰苦斗争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第一次派艺术团来中国访问演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阿尔及利亚独特风格的民族艺术，这也是最早来华访问的非洲国家的艺术团体。这些艺术团体的互访，揭开了新中国与亚、非、拉国家文化交流的序幕。在此前后，印度尼西亚

“峇厘”艺术友好访问团、缅甸文化代表团、泰国艺术团、巴基斯坦民间舞蹈团、柬埔寨文化艺术团、柬埔寨皇家歌舞团、哥伦比亚民族歌舞团、阿根廷奥斯瓦尔多·普洛利赛乐队、玻利维亚“芳达西亚”歌舞团、叙利亚奥玛艺术团、埃及黎达民间歌舞团、苏丹文化代表团、马里艺术团、几内亚第二国家舞蹈团等多个艺术团体相继来华访问演出，向我国观众展现了极具民族特色，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歌舞节目，介绍了奇特的异国民族艺术和民俗风情，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加强双方文化交流的热烈愿望，对巩固和发展新中国与亚、非、拉友好国家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①

除了这些艺术代表团频繁的相互访问外，中国与亚、非、拉国家之间，还在文学、教育、卫生、体育、科技、宗教、广播、新闻、电影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相互地了解彼此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上的成就；相互地学习和观摩；相互地交流经验与合作，密切了文化领域专业人员的关系，促进了各自民族文化的发展。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中国政府历来认为，“日本和中国的来往有着悠久的历史。两国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看的。过去虽然两国间有过一段黑暗时期，但这只是历史上一个短暂的过程。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今后发展和保持新的交流，加强彼此友好关系是必要的”。为了开展与日本人民的文化交流，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1955年10月，日本歌舞伎剧团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演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有机会欣赏到日本独特的民族艺术，并使我国艺术家和日本艺术家交流了经验，增进了友谊。11月，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并与我国对外文化协会签订了《关于发展中日文化

^① 参见文化部对外联络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概览》，第5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交流的协议》，这对于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关系，无疑是有重要作用和意义的。稍后，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首的中国科学代表团赴日访问，受到日本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翌年，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根据与日本《朝日新闻社》签订的协议，组织了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为团长的中国京剧团访问日本，揭开了中日民间交流的新篇章。这些文化交流，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密切了中日两国的文化关系，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化的进步，也是一种重要的有利因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对此有高度的评价，他说：“很早人们就希望展开中日两国间新的文化交流；它的实现首先从剧团的交流开始。在听到日本歌舞伎剧团的访华演出受到中国人民欢迎的时候，我们太高兴了。歌舞伎是日本的传统艺术……以市川猿之助为团长的歌舞伎剧团访华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一事实使我们日本人首先从中国学会了如何尊重传统艺术以及把它的美在现代复活起来的必要性。接着，以梅兰芳先生为团长的京剧团从中国来日本访问，给予了日本的很多观众以深刻的印象。京剧有了很大的改革，这也使我们学会了把传统艺术在现代复活起来的道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是根据中日两国间的文化协定而创立的，它成立于中国京剧团来日访问前夕。由于京剧团的成功，协会的活动得到了很大的方便。因为，在日本人民中间希望文化交流的呼声更加高涨了。”中岛健藏在展望未来中日文化交流发展的前景时指出：“我们并不满足一部分的日本人民对中国敬爱。我们认为，必须展开工作使全体日本国民在同中国的文化交流中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为了这一目的，必须使日本各种文化专业团体参加文化交流的实现。”^①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文化交流日益发展。1958年后，吕骥任团长的中国歌舞团、丁波任团长的北京杂技团、林林任团

^① 《光明日报》1957年11月24日。

长的中国艺术团以及中国京剧团、中国民族歌舞团等先后赴日访问，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日本观众。他们看了中国艺术家们的表演后，都觉得中国艺术对他们来说分外亲切，丝毫没有一点“距离感”。因为访问日本的中国艺术表演团，不管是杂技、京剧，或者是音乐、舞蹈，都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东方色彩，这对于同中国有着两千年文化联系的日本人民来说，自然不会感到生疏。许多人都表示，看了中国的民族艺术，相信“日本人民也一定会像中国人民一样，发展自己的民族艺术”。^①与此同时，日本著名的松山芭蕾舞团、花柳德兵卫舞蹈团、前进座剧团、日本话剧团、蕨座民族歌舞团也相继来华访问演出。日本艺术家们精湛的表演，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松山芭蕾舞团曾多次来华演出根据电影改编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使其成为“在日本和中国之间架起一座坚固的心灵上的桥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切接见了清水正夫、松山树子和剧团的成员。松山树子后来在回忆中说：“我们在日本和中国之间所走过的这四分之一世纪，在宏大的世界河流中，也许只是瞬间流过的涓涓一滴，我们所做的工作，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曾被封锁了的日本和中国现在正在手拉手地准备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认为历史变了、社会变了的人，大概不止我一个。也许我们当时恰好是走到了哪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吧，然而，现在，我们所有的人类恐怕都正处在世界的转折点上。不知世道和时代今后出现什么变化，我们热爱中国的心情是不变的，而且，我相信，对中国朋友的友情一定能代代相传下去。”^②日本艺术团体在国内上演中国的舞台艺术内容也很丰富，有话剧、歌剧、舞剧和音乐。话剧方面有

^① 《人民日报》1964年1月28日。

^② [日]清水正夫：《松山芭蕾舞白毛女——日中友好之桥》，第159—160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戏剧春秋》、《结婚进行曲》、《雷雨》、《压迫》、《宝船》，歌剧方面有《刘三姐》，音乐演奏方面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河大合唱》，歌舞伎方面有根据京剧改编的《野猪林》和《猎虎记》，都受到了特别热烈的欢迎。日本广播协会电台评论《宝莲灯》的演出盛况时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一句对话也没有的舞剧，却可以使观众感动得流下了这样多眼泪”。《宝船》参加了第十一届东京都儿童剧大会演，获得了一等优秀奖，东京都教育委员会还把它列为课堂教育，组织学生观看。^①

中国对外文化协会、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同日本文化交流协会、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为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根据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文化友好交流计划，安排了许多民间的文化友好交流项目，两国文化友好的民间人士、作家、诗人、艺术家进行了频繁的互访和学术交流，文学、美术、戏曲、体育、电影、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也不断发展。以电影方面为例，1963年，日中友协在东京、京都、大阪、名古屋等九个城市分别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第三届中国电影节，放映了故事片《燎原》、《刘三姐》、《阿娜尔罕》、《槐树庄》、《李双双》和记录片《1962年国庆节》、《中国桥》、《掌中戏》、《黄山似画》、《中印边界问题真相》等。所有这些影片，都为日本观众所喜爱。据日本广播协会电台报道，观众“在放映会场挤得无立足之地”，“在不登广告做宣传，并且采取会员制来限制观众人数的情况下，能够有这么多的观众，这不仅说明热望欣赏中国电影的人不知比这要多多少倍，而且可以看到日本有多少人在关心着新中国”。许多日本人民看了中国影片后，都加深了对新中国的认识，纷纷要求参加日中友协，愿为促进中日友好的文化交流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② 所有这些，都有力地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

^① 《人民日报》1964年1月28日。

^② 同①。

谊，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在积极开展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同亚、非、拉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同时，还努力冲破西方国家封锁的樊篱，同对我国实行孤立与封锁政策的国家进行民间文化交流，以便更广泛地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友谊与合作，吸取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特长，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丰富并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楚图南曾代表中国政府在国际会议上阐明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政策，他说：“当我们谈到人类新文化的时候，无疑地我们仍然是把全世界的文化看做一个整体的。我们积极促进亚非国家彼此的文化交流、团结友好，但这并不等于忽视，当然更不是拒绝同西方各国的文化联系和同西方各国人民的团结友好。相反地，同西方国家的文化联系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应该继续加强；但是这种联系必须在平等互利、彼此尊重的基础上来进行。我们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自由，尊重别的民族的文化。在这个天经地义的原则下，我们欢迎东西方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相学习。”^①正是抱着这种态度，我国通过民间渠道安排了许多艺术团体和友好人士的互访活动，结交了许多致力于发展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外国朋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赢得了应有的声誉。

1950年，芬兰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华的西欧国家文化团体。1951年，周巍峙率领的中国青年文工团访问了奥地利，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访问西欧国家的艺术团体。此后，我国各类文化团组、艺术团、艺术家、文化工作者遍访西欧、北欧诸国，其中比较重要的、影响大的艺术团有：由洪深任团长的中国人民杂技团，访问了芬兰、丹麦、瑞典；由张致祥任团长的中国艺术团，访问了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典、意大利、英国；由楚图南任团长的中国古典歌舞剧

^①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9日。

团，访问了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冰岛；由吴晗任团长的中国戏曲歌舞团，访问了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英国、瑞士；由金仲华任团长的中国艺术团，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荷兰。^① 广泛的文化交流，使我国同西欧许多未建交的国家开始有了接触，在国际活动中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凡是中国艺术团所到达的城市，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以至出现购票拥挤的现象。有的人天未明即起来排队买票，有的两人合购一票，有的打着小旗子征购戏票，有的从外地乘车、乘飞机赶来，在西欧且有人以原票价 15 倍的高价购买戏票。有的戏院破例卖站票，有的两三天前戏票即已告罄。在演出闭幕时，群众热烈鼓掌、跺地板，或起立欢呼，或献花致词，以致谢幕有时达二三十次之多。这种场面，据外国朋友们说是很少见的。此外，中国艺术团与各国的艺术家、文化界、教育界人士亦经常举行座谈会、联欢会等，交换关于文化艺术的见解和交流彼此间的工作经验，因而增进了彼此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各国政府也给中国艺术团以各种不同程度的支持和协助，并给予郑重地接待。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艺术团的访问是这些国家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丹麦的报刊上甚至有人制造出一个新的名词“黄热”，来形容人们对中国艺术的爱好和对中国艺术家的热烈欢迎。欧洲各国人民，特别是欧洲的艺术界，对中国的戏剧艺术都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中国的戏剧艺术由于它和人民的联系与现实结合，富有人民性和生命力。它丰富的想象力、细致入微的表现方法，以及它健康的幽默感、高度精确的节奏感和卓越的武功，使它成为一种完整的独特艺术，这是“在生活中微笑的艺术”；中国戏剧艺术的综合性，在创作上高度地融合了歌唱、舞蹈、哑剧、道白、武功、音乐、美术各方面，成为一种完整的统一整体而又各有重点，灵活变

^① 参见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概览》，第 58 页。

化，使人既感到无限丰富，也使人感到无限完美，“对于西方观众来说它在艺术的表现方面打开了一个十分新鲜和动人心魄的天地”。法国著名诗人克劳德罗阿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团的华丽、喜悦和机智的演出，可以说是一种全民的演出。在这里描绘了民族的历史，显示了民族的感情，表现了民族的性格，蕴藏了民族的精英。”人们对中国保存发扬古典文化艺术给予高度赞扬，认为“新中国赋予古老的文艺以复兴”，这是新中国的文化政策“对过去负责也如同对将来一样地负责”。伟大的喜剧大师卓别林专程赶到巴黎观看了中国艺术团的演出后说：“30年前我曾经到过中国，我看过同样的剧目演出，但是情节冗长，内容混杂着珠宝和糟粕。现在看了这种全新的演出，我不能说什么别的，我只能说这就是新中国！”^①

中国艺术团出访演出的成功，还取得了超出文化交流意义的重大效果。一位印度朋友在巴黎目睹了中国艺术团的演出盛况后撰写了一篇文章，称这是一次“艺术战胜了炸弹的巨大胜利”。美国的《星期日纽约时报》上也披露了巴黎戏剧节中我国演出的京剧《三岔口》和一些其他国家的剧照，并且在它的通讯里说：“在舞台上出现了来自美国、共产党中国、芬兰、波兰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演员。在那一晚的招待会上，法国、中国、东德和美国的演员们开怀对饮，谈笑风声，好像铁幕只是薄纱一般的东西了。”^② 这充分说明，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作为外交活动的一种配合，有力地促进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为提高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威望，发展与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在中国文化团体出访欧洲的同时，西方国家的著名艺术团体

^① “楚图南谈我艺术团出访欧洲的收获”，腾云主编：《当代中国文化交流史料》第1辑，第4—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② 《人民日报》1956年4月15日。

也相继来华访问演出，其中主要有：英国兰伯特芭蕾舞团，法国巴黎杂技团、古典芭蕾舞团，瑞典皇家歌剧院芭蕾舞团等。他们绚丽多彩的舞蹈艺术，严谨的艺术作风，都给中国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并为中国艺术界提供了直接观赏和学习的机会。在此期间，中国与西欧国家在文学、艺术、电影、广播、新闻、体育等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仅从电影方面来说，1960年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已同西方的18个国家的电影企业缔结了互购电影发行权的合同，还同更多国家的电影同行建立了业务上的联系。许多西方国家的电影观众和报刊的影评推崇我国电影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西方观众在参加了英国举办的中国电影节后，一致赞扬我国的电影鲜明地反映了新中国人民的新的生活和精神面貌。^① 法国著名影评家萨杜尔先生说：“中国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巴黎上映，轰动了整个巴黎，各影院的售票率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峰，有许多家报纸用很大的篇幅和最美丽的词句来赞美这部影片，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艺术，还有人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比这再好的电影。”^② 中法两国电影工作者合作摄制的彩色儿童故事片《风筝》，不但开创了我国与西方国家合拍影片的先河，而且还获得了法国文艺界颁发的“博爱奖”和拥有45万会员的法国青年电影协会特设的“青年奖”。^③

中国同大洋洲、北美洲国家的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发展。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就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此后，美国一些艺术家、作家、新闻工作者为了了解和介绍新中国，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中国访问。1955年，美国

① 《中国新闻》1960年12月7日。

② 《中国新闻》1957年8月8日。

③ 《人民日报》1959年5月31日。

黑人歌唱家潘基夫妇应中国对外文协的邀请来华访问演出。1958年，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应中国对外文协副会长阳翰笙和作协副主席老舍的邀请来华访问，并常住中国，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著作，成为中国人民真挚的朋友。1959年2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作家杜波依斯应邀来到中国，时年已经91岁。茅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文章“愿月圆人寿”，称赞杜波依斯的“一生都是为了反对种族歧视、为了美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了保卫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指出：“在杜波依斯博士身上，我们看到了黑人的智慧和英勇，看到了美国人民的和平、自由、博爱的传统。他的正义的斗争，给美国以及拉丁美洲的进步运动以有力的支持，给非洲黑人的独立运动以巨大的影响，从而也对全世界善良人民的正义的斗争给予了巨大的鼓舞。”^①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也多次访华，并于1960年后写了介绍新中国的《大洋彼岸》一书。在此期间，由徐光霄任团长的中国艺术团访问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陈忠经任团长的中国艺术团访问了加拿大。至1959年，中国已和24个北美、大洋洲和西欧的国家及地区建立了友好往来的联系。

中国政府还积极地促进和参加了各种国际性的文化活动。从50年代起，中国派团参加了莱比锡、波兹南、法兰克福和卡萨布兰卡博览会以及国际书展，中国的电影参加了许多著名的国际电影节，并多次获奖。1963年，中国派出阵容强大的体育代表团，参加了雅加达新兴力量运动会。这次运动会不但规模宏大、成绩良好，而且冲破了西方势力对国际体育的垄断与控制，充分显示了新兴力量的强大和团结，在国际体育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1964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44个国家与地区数百名科学家参加的科学讨论会，这是四大洲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不仅突破了西方势力对科学事业的垄

^① 《人民日报》1959年2月23日。

断，而且再一次表现了四大洲的科学家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合作、互相交流工作经验和研究成果，为四大洲科学文化的复兴和繁荣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也为人类的科学文化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即科学文化事业必须服务于民族解放、人类进步和人民的幸福，必须反对西方敌对势力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是一件世界文化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① 1966年，在北京还召开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亚非作家会议和亚非记者会议等。所有这些都对于增进亚非国家人民之间的了解、争取和平、反对侵略的斗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政府通过这些国际性会议，多次郑重地声明：中国人民将继续同各国人民合作，为人类科学文化的进步、繁荣和人民的幸福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达到三十多个，平均每年有一百多个、近两千人次的文化交流项目。在表演艺术交流方面，派出的艺术团168个，10133人次；中国接待外国艺术团225个，21524人次。^② 建国后15年内，中国同世界各国相互交换的书刊达两亿多册，影片一万多部，相互举办的文化性展览一千多个。^③

在广泛的文化友好往来中，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政策日臻成熟和完善。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曾多次谈到中国的文化要同一切别的民族的进步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他还说：“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

① 楚图南：《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发展》，《世界知识》1964年19期。

② 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概览》，第61页。

③ 同①。

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这就基本上明确了我们和各国人民进行文化联系的态度和方针。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毛泽东更加明确地阐明了吸收外国文化的必要性，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周恩来总理也曾多次强调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是我国整体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外交工作两翼中的一翼，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是寻求友谊，寻求知识。1956年6月，他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方针与政策做了更加系统、明确的阐述，指出：“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正如在经济上的合作一样，也是促使各国之间的和平、友谊和合作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历史上，各国人民从来就是通过互相学习和互相吸收优点来丰富和发扬自己的文化的。我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将会得到最迅速最广泛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用现代的水平来衡量，我国还是一个文化上落后的国家。我们要认识到，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长处。我们不仅要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学习他们的长处，而且还要吸取所有其他国家的长处。这只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坏处。因此，我们毫不惧怕，相反地，我们热烈地欢迎同一切国家广泛地进行文化交流。事实上，进行文化交流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只需要提到我国的艺术团体和其他国家的艺术团体在进行相互访问时所受到的盛大欢迎，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作为增加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一个方法，文化交流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就中国来说，我们不会在这方面吝惜我们的力量。”同时，在开展对外文化友好联系工作中，党和国家政府还一贯要求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定不移地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的方针，贯彻执行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概括这些重要的指示和原则，新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政策必须同党和国家的对外总政策相一致，并为其服务；对外文化交流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外文化交流的目的是积极引进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借以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是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中国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现代文化以及中国的发展现状，同时学习了解外国的历史、现状、文化传统，从而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理解，取长补短，加强合作，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而努力。此外，要为有关人员提供学习、借鉴的机会，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丰富人类的文化艺术宝库做出贡献；对外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彼此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对方。^① 凡此种种，都为新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并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

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逐步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主要是：第一，必须坚持相互尊重的原则。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反映了他们人民的历史和生活、创造和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该在思想和感情上十分珍视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犹如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一样。对于尚不熟悉、不太理解的东西，应该通过努力去逐步熟悉它，深入理解它，从而对其发生兴趣，直到真正欣赏和吸收它。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成果，都应该很好地研究学习，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对于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真正尊重的程度、鉴赏和认识的能力，也应该是这个国家人民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同时，在各种对外文

^① 参见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概览》，第47页。

化交往的活动中，应该十分尊重和珍视国际友人对我们提出的建议和批评，即使批评未必切合我们的实际，但仍然应该热诚地表示欢迎，严肃认真地对待。既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应采取敷衍轻视的态度。

第二，必须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心。正确认识并尊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统、特色和成就，在实践中不断将其发扬光大，使其继续向前发展。只有具备这样的自信心，才会勇于介绍自己，把我们的成就不吝惜地介绍给各国人民，丰富人类共同的文化乐园。要正确处理尊重自己与尊重他人的关系，反对毫无根据地妄自尊大，同样也反对毫无根据地妄自菲薄；我们必须尊重和热爱祖国传统文化，创造发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从而丰富世界人类的文化宝库。我们应该承认现在自己在文化方面的差距，但我们也完全应该看到多少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和艺术巨匠辛勤劳动的结晶，完全有信心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当然，尊重自己并不是故步自封、抱残守缺之谓，而是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努力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于我有用的东西；但是这种吸收必须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才有用处。

第三，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形式主义和只做表面工作，而应该通过文化交流使双方都能实实在在地学到一些东西。在文化友好活动中，要经得起赞扬，更要诚恳地对待批评。对于外国友人，固然不应该轻率地好为人师，但也不要只是唯唯诺诺。谦虚是必要的，但也不必过分。

第四，必须树立同任何一个国家建立文化联系与合作的观念。文化联系应该在各国人民之间广泛地促进，多方面地进行。遵照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方针，发展同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符合各国人民和公正人士的共同愿望，是人类文化交流的一个总的趋向。事实证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并不妨碍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联系。通过文化交流，增进

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家之间正式的外交关系，使彼此的文化、经济往来正式化、广泛化、经常化，这就是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所走过来的道路。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利于各国人民所从事的进步事业，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①

伴随着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不断发展，新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管理体制也不断完善。为了加强对中外文化交流的领导，1949年11月，在文化部设立了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局长萧三，副局长洪深，主要负责本部业务范围内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1951年3月，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改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领导，局长洪深，副局长陈忠经。1955年1月，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改称对外文化联络局。同年4月，对外文化联络局改为国务院直属局，委托文化部代管。驻外使馆的文化工作以及与苏联、东欧及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工作，连同驻外使馆的文化官员一并由外交部转由文化部管理，同时任命了一批驻外使馆的文化参赞和文化专员。1958年，中央决定将广义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经济贸易实行归口管理。2月，在对外文化联络局的基础上成立了部一级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对外文化活动接受这个委员会归口管理的部门有：文化部、高教部、卫生部、国家体委、广播局、园林局、宗教局、中国科学院、新华社、中国文联、作协、记协等。按照规定，这些部门的对外交往项目都要报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审批或经其转报国务院审批，外事活动经费也由该委员会统一划拨，从而形成了集中的管理体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成立后，相应的机构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经过多年的实践，1965年，中央政府进一步明确该委员会职责是：管理有关政府文教部门和文化团体的外事工作；领导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及各对口

^① 参见陈忠经：“进一步发展与各国人民的文化联系”，《人民日报》1956年4月15日；“张奚若谈文化交流工作”，《人民日报》1959年5月4日。

友好协会的工作；与驻外使馆共同领导使馆文化处的工作；指导地方对外文化友好协会的工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成立后至1966年，主任由张奚若担任，先后担任副主任的有：楚图南、李昌、张致祥、丁西林、屈武、邹大鹏、罗俊、朱光、曹瑛、陈忠经、李琦涛、宋一平、史怀璧、任映仑、杨纯。

为适应和推进我国与各国民间的文化交流，1954年5月，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学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印友好协会、中缅友好协会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等人民团体联合发起，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大会推选楚图南为会长，丁西林、阳翰笙、洪深为副会长，陈忠经为秘书长。其宗旨是促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保卫世界和平。1966年改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文化协会，1969年定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到1963年，中国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先后成立了26个对口的友好协会，分别由各界知名人士担任会长和副会长。其中主要有：中国苏联友好协会总会，会长刘少奇，副会长宋庆龄、吴玉章、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张澜、黄炎培；中国朝鲜友好协会，会长李德全、副会长老舍、魏传统；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会长刘长胜；中国古巴友好协会，会长刘宁一；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会长廖承志。此外，到1959年，已经有38个国家成立了46个对我国的友好团体，分会组织达五百多个，遍布五大洲。^①

建国以来中外文化交流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充分显示出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一定会在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有所拓展，有所前进。

^① 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概览》，第60页。

二、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曲折行进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地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努力为实现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的时候，正当中外文化交流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步前进，不断向纵深领域发展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之命，使我国的文化事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五·一六通知》提出了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左”倾观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将其发展为文化毁灭主义。在科技界，摧毁所谓“资产阶级一统天下”，大批科研机构被撤销，科研仪器设备被损坏，文献资料被焚烧，科研工作被迫中断。在教育界，实行“停课闹革命”，学校关闭，校舍、设备遭到破坏，许多图书资料被洗劫一空。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提供的资料显示，全国文盲和半文盲竟有22580万人之多。在出版界，一片冷落萧条，除了《毛泽东选集》之外，常常处于无书可出的困境。在新闻界，除中央、省市报纸和极少数刊物外，大部分报纸和刊物都被迫停办了。仍在出版的报刊变成千篇一律，甚至发展到“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地步。在文艺界，抛弃了“百花齐放”的正确方针，取消了人民创作、表演的自由，批判“文艺黑线专政”和“大、洋、古”，造成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局面，几乎一切文学艺术都被打入“冷宫”，焚毁书籍，停演节目，封存影片，八亿人口的大国只能上演“八个样板戏”，正如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时所说，这是一个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文艺

评论、没有百花齐放的时期。十年大动乱，使我国的珍贵文物和名胜古迹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洗劫。大量有历史意义的庙宇、寺院、佛像、牌坊、古墓都被当做“四旧”砸毁和拆除；许多有价值的古籍、古画、经卷、档案资料被视为封建残余付之一炬；颇多的名胜古迹被夷为平地，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遭到难以估计的损失。卫生事业和体育事业在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和“锦标主义”的冲击下，也受到严重的摧残。总之，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文化事业遭受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

国内的文化事业尚且如此，国外的文化交流更是在劫难逃。“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刚刚发展起来的对外文化交流事业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当时的极“左”思潮冲击下，对外文化交流被加以“封资修文化大交融”的罪名，视为“毒害人们精神的危险渠道”，机构被撤销，队伍被解散，领导靠边站，业务工作陷于全面的瘫痪，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被全盘否定。更有甚者，一些不明真相、不懂事理的人在极“左”思潮的煽动下，冲击应邀来华举办的外国艺术展览，造成极坏的影响和难以弥补的损失。林彪、“四人帮”之流还借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些争论挑起事端，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众多的文化名士更是惨遭罹难。

但是，这个时期也是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的时期。广大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工作者和人民在一起，通过公开的或隐蔽曲折的方法，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且尽管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行程出现了严重的曲折，但它在建国以后积蓄起来的逐步高涨的发展趋势却是不可阻遏的。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对外文化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直到1967年，中国仍与一些国家保持艺术团互访。1970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应邀访华，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第二天，《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刊发了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向美国政府发出了十分含蓄而富有深

刻含义的信息。1971年4月，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美运动员在名古屋相逢。正是这些手握球拍的体育健儿，在当时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变化进程中，承担起富有戏剧性的使命，揭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以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为契机，中美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渠道”进行接触的速度显著加快。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中国。一年之后，中国乒乓球队成功地举行了回访。尼克松在写给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的信中说：“美国人民期望看到一次关于中国体育技巧和优良的运动员风度的卓越表演”，希望美国运动员“将在这种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的努力中成为我们的大使”。此后，他在白宫玫瑰园中接见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时说：“因为你们开创的人民对人民的接触而取得大胜的是美中人民之间的友谊。”^①正是在中美乒乓球运动员的友好交往之中，1972年2月尼克松来到了北京，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大门。这就是一段被称为“乒乓外交”的历史，这就是“小球转动了大球”的典故。“乒乓外交”从此成为一个专有名词，醒目地出现在浩繁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著作中，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回忆录里。

也是这一年，在中日两国民间交往的推动下，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在此前后，特别是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胜利恢复，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文化团体的互访也逐步增加。据统计，从1971年到1976年，中国共接待了近三十个来自罗马尼亚、朝鲜、日本、瑞士、南斯拉夫、土耳其、阿尔巴尼亚、美国、巴基斯坦、越南、澳大利亚、新西兰、老挝、菲律宾、英国、法国、泰国等国家的艺术团和众多的艺术家。从1966年5月到1976年，中国共派出40个艺术表演团组，近3000人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这些艺术团体大都是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

^① 席来旺：《中美交往实录》，第37页，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合法席位后，中国外交工作出现新的高潮中派出的。^①在此期间，国家文物局还组织了两组珍贵的出土文物展览到欧美、日本、墨西哥等十多个国家展出。展品中有珍贵的金缕玉衣、铜奔马、编钟、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等，向各国观众介绍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以及中国政府挖掘、保护文化的政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观众达千余万人次。

在管理体制方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作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归口管理部门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即被撤销。1972年，周恩来总理鉴于外交工作的需要，经请示毛泽东决定将有关对外文化交流的综合平衡、与外国商定双边文化交流计划、签订文化协定等工作交由外交部管理。有关艺术团和艺术展览交流的具体项目，交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承办。根据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这些指导，外交部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做了许多工作，使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在艰难的道路上曲折行进着。

三、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繁荣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而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① 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概览》，第63页。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顺应时代要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我们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新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作为国家外交工作的一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又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坚持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发展文化事业和繁荣文学艺术服务，在改善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经与世界上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良好的文化合作和文化交流关系，与数千个外国文化组织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为发展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文化交流事业最富有朝气和活力，蓬勃发展和全面繁荣的时期。主要表现在：

中外文化交流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大，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从1978年到1998年，我国派出政府文化代表团和文化官员代表团230余次，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文化代表团和文化官员代表团400余次；与我国签订文化合作协定的国家达140个，是“文革”前17年总数的3倍多；在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基础上，我国与外国签订的文化交流执行计划407个，是“文革”前155个的2倍多。目前，每年仅文化部审批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就有上千起、逾万人次。以1997年为例，各类交流项目达1600多起、2.2万多人次，平均每天5起、60多人次，分别是“文革”前年平均数的16倍和40多倍。^①这些不仅使世界各国人民能够多侧面地了解中国，增进了中外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同

^① 《中国文化报》1999年1月2日。

时也使我国人民从不同的文化视角更多地了解世界，学习和借鉴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值得重视的是，近几年来，各部门、各地方都根据各自的情况，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承办了大量的文化交流项目，人员来往逐年增加。现在，在我国的舞台上，经常可以看到世界各国不同特点和风格的民族文化艺术，有古典和现代芭蕾舞、民间歌舞、歌剧、哑剧、杂技、魔术、话剧、木偶，等等。世界著名艺术家卡拉扬、梅纽因、小泽征尔、帕瓦罗蒂、多明戈等都先后来我国访问演出过。各国优秀的绘画、雕塑、民间工艺、历史文物、图书等艺术展览，品种繁多，各具特色，不断地在我国各地展出。我国的文化使者更是足迹遍五洲，不仅给各国人民带去了我国古老的和现代的民族文化，而且也带去了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中外文化交流的艺术品种更加多样。过去，我国出访的表演艺术团多半是京剧、杂技、歌舞、越剧、昆曲、民族音乐和木偶戏，现在增加了地方色彩浓郁、富有生活气息的川剧、粤剧、闽剧、芩剧、琼剧、黄梅戏、花鼓戏、豫剧、评弹、藏戏、吉剧、华剧、秦腔、潮剧、湘剧、高甲戏、汉剧、正字戏、评剧、河北梆子、晋剧等地方戏曲，受到外国观众的欢迎和赞许，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现“京剧热”、“中国地方戏曲热”。在出国艺术展览方面，有出土文物、民间工艺、传统的国画、书法、剪纸、年画、刺绣、染织、雕塑、陶瓷、水彩画、漆画、儿童画、农民画、油画、连环画、摄影，等等。

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更加宽广。目前，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既有政府间的友好互访，也有民间渠道往来；既有由主管部门举办的交流项目，也有各友好城市之间的交流计划；既有友好访问，也有专业考察。各种渠道互相配合，推动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事业的迅速发展。民间交流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更加引人注目，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都是民间项目多于官方往来。90

年代后期以来，无论是我国派出还是外国来华的艺术表演和艺术展览项目，民间交流所占的比例均达到90%以上，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根据对外文化交流发展的新形势，为了适应民间交流迅猛发展的需要，1986年7月成立了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它是全国性的民间文化交流组织，主要任务是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文化艺术机构、学术团体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进行交流与合作。此外，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等多家民间机构也都组织安排了不少民间文化交流项目。

出国开展有偿演出和展览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文化交流形式，已经成为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交流形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局部试点到大量派出，不仅弘扬了我国的文化艺术，增进了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而且为国家节省了开支，增加了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还促进了我国文艺创作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艺术的国际声誉不断提高。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工作的迅速发展，中国的文化艺术在国际上的声誉日渐显赫，受到各国人民和艺术同行的好评与赞许，邀请中国各类艺术家前去演出和参加国际艺术比赛的越来越多。为了扩大交流，达到互相学习、借鉴和共同提高的目的，我国的艺术家积极参加了国际上一些高水平的艺术比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98年，我国艺术家在参加的杂技、声乐、钢琴、小提琴、作曲、芭蕾舞、民族舞蹈等国际比赛中共获得一百多个金奖，银奖和铜奖各近百个，其他奖项四百多个。杂技艺术堪称我国艺坛的一枝奇葩，在法国“明日”世界马戏杂技比赛、英国世界杂技锦标赛、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比赛等具有国际水平大赛中获得的金牌数和奖牌数一直雄踞各类艺术比赛之首。一批中国青年歌唱家在国际声乐比赛中崭露头角，摘取多项奖牌。继1982年中国女歌唱家胡晓平在布达佩斯国际音乐比赛

中击败所有对手后，又有梁宁、迪里拜尔、傅海静、詹曼华、张建一、汪燕燕、曹群等在国际比赛中获奖。骄人的成绩令西方乐坛对中国声乐水平刮目相看，不得不发出要对中国音乐重新估价的惊叹。被世界许多国家认为标志一个国家艺术发展水平的芭蕾舞，经过中国舞蹈艺术家的刻苦摸索和实践，既保留了原有的艺术风格，又汲取了民族的内容，出现了一批富有民族特点和时代精神的节目，引起国际舞蹈界的关注。他们称中国舞蹈家把西方的形式与东方的内容相结合是对芭蕾舞的推进和发展。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青年舞蹈家在国际芭蕾舞大赛中连续获奖，仅在近两年，继1997年张剑在莫斯科国际芭蕾舞比赛中摘取金奖后，1998年中央芭蕾舞团的朱妍又在国际上难度最大、号称芭蕾舞界的奥林匹克比赛中荣获女子组第一名，充分显示了中国青年舞蹈家良好的艺术素质和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水平。

中外文化交流带动了多边交流的活跃。继1982年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亚洲地区保护与发展民间和传统舞蹈讨论会”后，在中国举办的多边性文化艺术活动以及中国参加的国际性文化艺术活动逐年都在增加。除全国性的中国艺术节外，各地文化部门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充分利用各自的文化优势，举办了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文化艺术节，例如山东的潍坊风筝会、甘肃的兰州丝路文化节、西藏的雪顿节、湖南的龙舟节、哈尔滨的冰雪节、西安的古文化节、上海的国际电影节、北京的文物节、天津的国际友好城市艺术节、内蒙古的草原旅游节等，都吸引了众多的外国朋友前来参加。这些活动还日益紧密地将文化、经贸、旅游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力地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为了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我国参加了国际德尔菲委员会、国际环球艺术委员会等二十多个文化艺术类国际组织，主办或倡导开展了一些大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1996年，我国成功地主办了第27届国际图联大会，九十多个国家的两千六百多名代表与会，为历届图联大会之最。同年主

办的国际档案大会，也是一次国际性的文化盛会。1998年，我国政府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瑞典召开的“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广泛结交了朋友，加强了友谊。199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于中国的“和平与文化”网络也成功地在天津南开大学开通，拓展了网上文化交流的渠道。

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各种专业会议和学术研讨会也促进了我国文化艺术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与世界各国同行间的了解和友谊，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共同就发展各自文化艺术事业进行切磋和学习的机会，加强了业务交流和合作关系，同时也有利于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向着更宽广的领域发展。

中外文化交流在促进国家政治关系的发展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不少重要的引进和派出交流项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文化交流意义本身。例如，1996年，江泽民主席、德国总统霍夫曼出席了德国著名收藏家路德维希的捐画仪式和万国交响乐团的首演；奥地利总理弗拉尼茨基专程来华与李鹏总理共同出席并欣赏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出；1997年，江泽民主席和法国总统希拉克就加强两国的文教合作互致信件，江主席还亲自出席观看了因此而成行的法国国家芭蕾舞团的演出；1998年5月，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夕，我国有关部门又专门邀请美国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和纽约爱乐交响乐团访华，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都观看了演出。总之，这些重要的文化交流项目，对于促进我国与这些国家政治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的外交政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是新时期制定对外文化交流政策的依据。周恩来总理生前所指出的，外交工作有两翼：一是文化，一是经济。指明了文化交流与外交的关系和它鲜明的政策性。在建国以来对外文化交流实践的基础上，新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的政策进一步完善，这就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积极开展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增进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重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

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积极借鉴一切有益的外国优秀文化，同时不断地把我国传统的和现代的优秀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为人类文化的进步做出我们的贡献。“寻求友谊，繁荣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宗旨。

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原则是“多出，进好”。这就是说，文化交流既要有数量，也要重质量，一定要讲求实效。我们送出，是为了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化艺术，按照“多出”的原则，文艺团体要敢于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我们的任务是要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引进，要坚持“进好”的原则，绝不能把国外的一些伪劣精神产品搬运进来。我们在引进外国文化艺术问题上，必须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并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对高雅的、优秀的、有利于提高民族文化修养的艺术，要大胆引进；对现代艺术流派，要听取专家意见，有选择地引进；对格调低下、庸俗颓废的，要予以抵制。^①

新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要积极适应形势的发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言以蔽之，对外文化交流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形势下，文化主管部门要适当放权，提高工作效率；文艺团体要进行改革；对外进行有偿和商业性的演出，是一条新路子，可以允许艺术团体本身作为独立法人自主经营对外商业性演出；商业演出的经纪人体制还需完善；企业参与文化交流要支持。这样既可促进经济发展，又有利于文化交流；要为艺术家出访、讲学、参加国际文化交流创造方便条件；对移居他国的文艺工作者，只要不从事反对祖国的活动，就要团结、关心他们，并支持、欢迎他们参与有利于祖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应鼓励艺术家、青少年演员通过官方或民间渠道参加各种国际艺术比赛。各级政府应该适当增加对文化交流事业

^① 《中国文化报》1993年6月9日。

的投入，同时要争取社会资助。要有计划地在我国举办钢琴、小提琴、声乐、芭蕾舞、民间舞等国际比赛；在国外举办较大规模的综合文化周，等等。总之，在这些方面，胆子再大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依靠各方面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文化交流活动。

党和国家这些对外文化交流的政策和原则，为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是：

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江泽民同志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大会上就指出，我们必须“积极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它熔铸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中”。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又强调指出：“我国的文化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范围、门类、形式和渠道。

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文化艺术，特别是舞台艺术和造型艺术，较少语言障碍，容易为各国人民所接受。通过文化交流的形式，向世界各国弘扬中国的优秀文化，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当代中国的伟大形象，增强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重视同周边国家扩大文化交往。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一政策，近年来中国特别重视同这些国家发展文化交流。从历史的渊源来说，中国同周边国家有着密切的文化往来，许多周边国家的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生活习俗上有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对彼此的文化容易理解和相互吸收。这是中国同这些国家开

展文化交流的有利条件。

继续发展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交流。第三世界是当前国际上重要的政治力量，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有共同的语言，加强同它们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因此，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往来，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广大人民曾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他们创造的民族民间艺术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发展同他们的文化交流，可以扩大中国人民的文化视野，也可为有关专业人员提供创作的素材。

进一步发展同西欧、北美国家的文化关系。这些国家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的水平较高，在文化事业的经营和管理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展同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引进它们优秀的文化成果，对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是有裨益的。另一方面，通过文化交流，可以帮助这些国家人民正确地认识中国，消除由于某些舆论工具的歪曲报道而形成的对中国的误解。由于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文化交流常会遇到一些困难，中国方面的态度是在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使文化交流得以正常发展。

进一步开创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新局面。为了使对外文化交流继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并适应世界各国不同的情况，对外文化交流应是多层次的，既有政府高级官员的互访，又有各类文艺团体和个别文化艺术人员的来往；应是多渠道的，即“官民并举”，利用官方的、半官方的、民间的种种渠道；应是多形式的，包括艺术表演团体和艺术展览的无偿演展、有偿演展、商业性演展、展销结合，各类专业人员的讲学、进修，以及各种形式的双边和多边文化活动等。^①

^① 参见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概览》，第51—52页。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学说，同时也是人类文化中的瑰宝。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马克思主义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推动了欧洲文化的重新改组；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和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改变了世界文化的总格局。马克思主义使这两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独特社会性质的国家，都改变了它们原有的意识形态格局和文化态势，接受了一种新的文化的植入。马克思主义在事实上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都起着重大的统领作用。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革命和建设都迫切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理论的启示和指导，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逐渐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出版成为日益迫切的重要问题。1953 年 1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从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进入了集中力量、统一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新阶段。

1.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译与出版

建国初期，由于时间和其他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主要在重印和新译这两个层面展开。

第一，为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中共中央用解放社的名义重印了大量解放前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其中主要有，博古校译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何思敬译的《哲学的贫困》，何思敬、徐冰译的《哥达纲领批判》，沈志远译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柯柏年译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王字文、何锡麟译的《反杜林论》，曹保华、于光远译的《从猿到人》，郭大力译的《资本论通信集》，何锡麟译的《资本论提纲》，张仲实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艾思奇译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共产党宣言》及《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等等。

三联书店、新华书店和各地出版部门也大量重印了解放前出版的马恩著作的中译本。主要有郭大力、王亚南译的《资本论》，曹汀译的《新德意志帝国建设之际的暴力与经济》，吴黎平译的《反杜林论》，张仲实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这些著作重印时，译者对译文大都做过不同程度的校议，使译文质量有了新的提高。印刷、装帧设计也有所改善，很受读者欢迎。

第二，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和一些报刊也相继出版和发表了相当数量的首次译成中文的马恩著作。《新建设》、《中国青年》、《学习》、《新华日报》、《译文》、《经济周报》、《史学译丛》、《民族殖民地问题译丛》等报刊先后发表的马恩著作主要有：季羨林、曹保华译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陈翰笙、张之毅译的《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和结局》，严中平、汪敬虞译的《绿壳船亚罗事件》、《巴麦尊内阁的失败》、《英国统治》、《俄国与中国》，仲南译的《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序言》、贺麟译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批判》，何思敬译的《疏远化了的劳动》，郭大力译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导论》，曹保华、于光远译的《自然辩证法导言》、《辩证法》、《读书札记》、《数学和物理学》，郭大力译的《论权威》，刘祚昌译的《北美内战》、《资产阶级与反革命》，日知译的《前资本主义形态》，胡世凯译的《论土地国有化》，王士章译的《被迫移民》、《马克思主义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谢家译的《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张广达译的《答维查苏卫奇的信和草稿》，等等。其中《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由人民出版社以《马克思论印度》为题出版了单行本，《自然辩证法导言》、《辩证法》、《读书札记》和《数学与物理学》由人民出版社结集为《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出版了单行本。《新建设》是最早也是最多译载马恩著作的杂志之一。据统计，自1949年9月创刊到1956年出版的1月号共发表马恩的文章、通信36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马恩的重要著作，在读者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民出版社这一时期主要出版了新译马恩著作的单行本。除了《马克思论印度》、《辩证法与自然哲学》外，主要还有何思敬译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经济学——哲学手稿》，曹保华、关斯侗译的《论住宅问题》，曹保华、毛岸英译的《法德农民问题》，徐志坚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费青译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贺麟译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一般批判》，中央编译局译的《共产主义原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曹汀译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集》。上海时代书局出版了张古梅译的恩格斯的《追忆马克思》。三联书店出版了郑易译的《自然辩证法》。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了王道乾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和艺术》。上海泥土出版社出版了贾植芳译的《论住宅问题》。

建国初期重印和新译的这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起了重

要的作用，但也暴露出其中的局限。主要是系统性不强，不能突出地反映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这些重印和新译的著作大都是个人所译，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译文不能很好地体现原文的面貌，因此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读者学习的需要。

中央编译局成立后，这种局面得到了彻底的改变，1955年，中央编译局遵照中央指示根据前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开始着手翻译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时，局内除几位是从事过翻译经典著作的老同志外，其余大部分是刚从俄语专科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为了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编译局举办了各种外语学习班，要求工作人员每天提前一小时上班用来学习，已掌握一种外语的人再学习一种外语，同时采取各种形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日常工作中通过以老带新、能者为师的办法，迅速培养了一支优秀的翻译工作者队伍。

为了保证译文质量，中央编译局还制订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出版程序》，规定校译工作必须经过准备、翻译、定稿、复查四个阶段，强调翻译者要深入研究所译文章，对于每篇著作中特别重要的章节、语句在译校时要特别注意文字的准确，使译文能表达出原文的精神、观点、逻辑结构以及文章风格。编译局在对《马恩全集》俄文第二版进行翻译的同时，还大量参考国内以前的译本，广泛征求国内专家的意见。1956年夏季，中央编译局两次召开翻译座谈会，总结翻译经验，加深对翻译标准的认识，以保证译文的质量。经过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马恩全集》第1卷于1956年9月译校完毕，同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而使《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卷成为我国首次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集版本。

1958年中央编译局决定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于1959年10月以前译完出齐《列宁全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由于编译局马恩室的同志参加《列宁全集》的“献礼计划”，马恩著作的翻

译暂时停止。1960年以前,《马恩全集》总共出版了六卷。从1960年开始,编译局的工作重点转到翻译《马恩全集》。经过《列宁全集》的翻译实践,工作人员的水平进一步提高,经验更加丰富,从而为《马恩全集》的翻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1961年到1965年,《马恩全集》的翻译进展顺利,每年都能翻译出版三至四卷(每卷50万—55万字)。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马恩全集》第1—22卷已全部译出,其中除第20卷外,全部出版,形势十分喜人。然而,“文化大革命”使《马恩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林彪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鼓吹“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实际上扼杀了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1966年到1970年,编译局没有出版一本马列的书。直到1969年,毛泽东一再发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的号召,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直接关怀下,编译局才开始恢复业务工作,《马恩全集》的翻译也得以重新开始。1971年,周恩来提出继续出版《马恩全集》和重编《马恩选集》的任务,根据这一指示,中央编译局的同志在“斗、批、改”的夹缝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人民出版社的同志积极配合,编译出版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1971年出版三卷,1972年出版八卷,1973年和1974年又陆续出版了九卷。至此,《马恩全集》中文版39卷本全部出齐。

编入《马恩全集》39卷本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和书信,但还有不少著作、读书笔记和手稿特别是大量经济学手稿没有编入全集。《马恩全集》俄文第二版的编者从1968年开始编译这些被39卷本遗漏的著作,作为《马恩全集》俄文第二版的第40—50卷。其中46卷分为上下两册。中央编译局从1977年开始翻译《马恩全集》俄文第二版第40—50卷。经过六年的不懈努力,50卷本,总计3200万字的《马恩全集》中文版终于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日子里与中国人民全部见面。

《马恩全集》中文版编入各卷的著作都是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的,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39年至1895年7月的

著作，包括论文、报告、讲话、书信和手稿等。第1—15卷收有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写的每卷“说明”（第1卷还有全集的“第二版说明”）；第40—50卷收有中共中央编译局写的每卷“说明”。每卷书后都附有注释，人名索引和其他索引，第1—22卷还附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0卷各卷出版年月如下

卷次	出版时间	卷次	出版时间	卷次	出版时间	卷次	出版时间
1	1956.12	2	1957.12	3	1960.12	4	1958.8
5	1958.11	6	1961.8	7	1959.4	8	1961.1
9	1961.12	10	1962.4	11	1962.6	12	1962.8
13	1962.11	14	1964.8	15	1963.12	16	1964.2
17	1963.11	18	1964.1	19	1963.12	20	1971.3
21	1965.9	22	1965.5	23	1972.9	24	1972.12
25	1974.11	26(I)	1972.6	26(II)	1973.7	26(III)	1974.12
27	1972.6	28	1973.3	29	1972.6	30	1974.9
31	1972.6	32	1974.1	33	1973.12	34	1972.6
35	1971.6	36	1974.1	37	1971.6	38	1972.8
39	1974.11	40	1982.2	41	1982.12	42	1979.9
43	1982.12	44	1982.5	45	1985.12	46上册	1979.7
46下册	1980.8	47	1979.10	48	1985.2	49	1982.12
50	1985.12						

《马恩全集》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马恩全集》中文第1版也显露出不足，如“收的文献不全，有些译文质量不确切，编辑体例不够严谨等”。^①因此编译一部更高质量的《马恩全集》十分必要。

^① 《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7日。

80年代中期，中央编译局在基本完成《马恩全集》中文第1版的编辑任务后，就立即着手《马恩全集》中文第2版的准备工作。并于1986年5月向中央提出《关于重新编译出版〈马恩全集〉中文版的报告》，7月被中央书记处批准。为了编辑一部译文质量更高，文字资料更全，编排更合理的《马恩全集》，中央编译局对世界上已有的和正在出版的版本做了细致调查，包括《马恩全集》俄文第2版，原民主德国迪茨出版社出版的《马恩全集》德文版，尚未出齐的《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等。经过认真比较，最后确定以体例最周密，考证最精确，资料最丰富的历史考证版为依据。

《马恩全集》中文第2版计划编60余卷，正文总字数4000万字，分为4个部分。第1部分为1—29卷，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所有公开发表过的著作以及手稿、草稿、提纲等（《资本论》及其手稿除外）。第1部分还在附录中收入在马克思、恩格斯帮助下或经他们修改过的由别人撰写的文章和其他资料。这些著作的数量远远多于中文第1版。尽管它们并非出自马恩之手，但有助于了解他们的思想。附录中还收入与他们生平有关的文献。第2部分为第30—45卷，包括《资本论》及其直接有关的著作和准备材料。这里收入1857—1858年、1861—1863年及1863年以后的各种经济手稿，《资本论》三卷。其中《资本论》第1卷除收入恩格斯生前最后审定，并于1890年出版的世界通用的德文第4版外，还收入德文第1版和法文版。第3部分为第46—59卷，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书信。第4部分从第60卷开始，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笔记。

收入《马恩全集》中文第2版的所有著作都按照原著文字重新进行校订，凡是马恩著作在生前有多种版本的，以他们审定的最后版本为准。不同版本有重大出入的地方，在脚注中加以标明，这就消除了第1版大部分著作由俄文转译而造成的缺点。在编辑方面，新版《马恩全集》也做了调整，第1、2、3部分基本

上按照著作的写作时间编排，纠正了第1版分为正卷和补卷的做法。第2版的资料部分比第1版也有很大改进，首先每卷都有《前言》，介绍本卷收入著作的写作背景，即有关的历史时期、当时的国际形势、某些国家的内部情况、工人运动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以及主要文章的内容和主要论点。与第1版相比，新版的注释范围扩大了，数量增加了，资料更翔实，内容更充实。新版各卷索引中的人名也都经过重新审定，第1卷、第11卷增设文献索引，这也是对中文第1版的一个补正。

《马恩全集》中文第2版，总计超过60卷。从1995年开始由人民出版社每年出版2—3卷，预计20—25年出齐。这项艰巨工程的完成，必将为读者提供一套文献更全，译文质量更高，资料更充备，编排更合理的全集本，从而能够更完整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马恩全集》的编译和出版，为中国人民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帮助，但由于卷本太多，阅读量很大，给一些没有太多精力的读者和初学者带来了不便，从而有必要精选出马恩著作的重要篇目，出版马恩著作的选集本供读者学习。

1965年，中央编译局开始进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选编工作。当时马恩著作除书信外，大都已译成中文，这就为编辑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马恩选集》原定为四卷，由于“文化大革命”曾使选编工作中断。1971年，编译局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利用过去编辑《马恩全集》时的材料，于4月下旬重新开始了编译《马恩选集》的工作。1972年5月，《马恩选集》中文第1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自行编译的第一部马恩著作的选集，共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90篇，书信96封，约180万字。

《马恩选集》中文第1版基本上按著作的写作年代编排，个别文章的次序根据内容略有调整。第1卷卷首收入了列宁在1885

年所写的悼念恩格斯的文章《费里德里希·恩格斯》和1914年为格拉纳特兄弟百科词典出版社所写的传记条目《卡尔·马克思》两篇文章作为序言。

《马恩选集》中文第1版采用《马恩全集》中文第1版的译文，有些著作的译文如《共产党宣言》等经过重新校订，有些篇幅过长的著作则只摘选了其中一部分。在每卷正文之后还附有注释，人名索引，文字著作和神话人物索引。

《马恩选集》中文第1版第1卷收入作者1843—1852年的重要著作25篇，主要是1848—1849年法国革命时期的著作和后来对这次革命进行总结的著作。其中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

第2卷收入作者1853—1875年的重要著作44篇，包括有关中国的一组文章、经济学著作、论述巴黎公社的著作和第一国际时期的文章，其中主要有《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导言》、《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章程》、《工资、价格和利润》、《法兰西内战》、《论住宅》等。

第3卷收入作者1875—1883年的重要著作9篇，包括《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等。

第4卷收入作者1884—1895年、即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写的重要著作，包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重要著作11篇，还有马恩的书信96封。

《马恩选集》中文第1版自1972年出版后，二十多年间多次重印，广泛发行，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版本不够完善的方面也越来越明显，“一是在文献选录方面，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多寡悬殊，不够均衡。二

是在译文方面，除了一些重点著作外，许多文章和书信是依据俄文版转译的。这就难以消除译文在表达方式和修辞方面与原文的距离。三是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编者对有关史料难以进行周密的考订，注释的内容不够充实，各卷缺少读者在学习和研究时需要的名目索引”。^①因此，有必要重新编译一部选材更科学，体例更严谨，译文更准确，资料更翔实的《马恩选集》。

中央编译局从1992年开始编译《马恩选集》中文第2版，总的编译原则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手稿和书信中选编或节录各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文献，力求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最重要的观点，使读者通过这部《马恩选集》比较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理论。为贯彻这一原则，中央编译局对《马恩选集》中文第1版篇目做了调整，适当充实了哲学方面的内容，保留了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增补了少量具有重大意义而第1版没有收入的著作，删去了一些观点相近的文章和书信，以较多篇幅增选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述。为了使文献的辑录和编排能够更科学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编译人员逐篇分析了《马恩选集》中文第1版的全部文献，反复研究和论证有关篇目的取舍问题，提出初步意见。接着又对《马恩全集》中文第1版未收入《马恩选集》第1版的某些文章进行研究，组织编译人员对其中的13卷书信逐篇进行分析，对建议选录的每一封信写出提要，通过权衡筛选，初步拟定了应当增补的篇目。与此同时，还查阅了国外出版的各种《马恩选集》版本，列出篇目比较，以取其所长。在拟定《马恩选集》第2版初步方案后，又广泛征求意见，邀集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和教学的专家学者，对需要保留、删除和增补的篇目逐一审核，经过充分讨论和修改，最后才确定新版《马恩选集》的文献篇目。

^① 《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7日。

为了保证译文质量，中央编译局制定了严格的翻译校审程序。要求编译人员在着手翻译前，必须通读原著，了解原著的中心思想，主要内容，必须阅读有关参考书，熟悉有关著作的历史背景，了解文中涉及的各种事件。评校时，不仅要吃透一字一句的意思，还要把整篇文章的思想、观点、风格、逻辑联系充分表达出来。既不能“乱译”，也不能“死译”，要做到“意思正确、文字通顺”。

经过编译局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马恩选集》中文第2版于199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版《马恩选集》仍为4卷，总计约285万字，删去了第1版收录的23篇文章和25封书信，增补了《资本论》节选和重要理论文章20篇，书信26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选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1859年的著作。其中选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前半期撰写的著作，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以及他们批判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初成果，首次揭示了新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1卷还选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在40年代下半期为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组织起草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以及他们在这一时期为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工人阶级而写的著作。此外还以较大的篇幅选载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法国和德国1848—1849年革命和总结这次革命经验的著作，以及他们阐述民族问题和殖民主义问题的文章，并且选编了作者在19世纪50年代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等十篇有关中国的文章，这些文章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做出了精辟的分析。

与收入第1版的同时期著作相比，新版《马恩选集》第1卷

增补了四部著作，即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英中条约》、恩格斯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删去了《反克利盖的通告》等11篇文章。

《马恩选集》第2版第2卷选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7—1871年的著作，节选了《资本论》第1、2、3卷的重要内容。其中《资本论》节选在全卷中占中心地位。编者力求通过选编的《资本论》序言，跋文和有关篇章，比较完整地反映《资本论》这部著作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第2卷还收入了作者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撰写的其他12篇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阐述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思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性的表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坚持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扼要而通俗地说明了剩余价值的理论，强调工人阶级必须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除了经济学著作外，第2卷还收入了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两篇重要文献（《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为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而写的文章。新版《马恩选集》第2卷最突出的地方是大大充实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

《马恩选集》第2版第3卷选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1883年的著作。其中有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些著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了系统阐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除此之外，收入这一卷的许多著作都是作者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思想，批判各种影响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思潮所写的。第3卷还选编了马克思

阐述俄国社会发展前景和俄国资本主义命运的两篇重要文献，以及恩格斯论述马克思理论贡献和革命业绩的文章。

与收入第1版的同时期著作相比，新版《马恩选集》第3卷增补了4篇文章，即马克思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于1880年和1891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和德文4版写的前言和序言，删去了《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等5篇文章。

《马恩选集》第2版第4卷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选编了恩格斯在1884—1895年的著作和《自然辩证法》，这些著作大部分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为捍卫、传播和进一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而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他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为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战略和策略而写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法德农民问题》、《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49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等）。除此之外，第一部分还收入了恩格斯根据形势的发展，进一步阐述俄国发展前途和俄国社会革命问题的文章《〈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以及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著作。第二部分则选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1895年的书信。这些书信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它们不仅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重要补充，而且对一些原理进行了新的探讨和发挥。

与收入第1版的同时期著作相比，新版《马恩选集》第4卷第一部分增补了六篇文章，即《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和《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删去了《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等两篇文

章。第二部分也按照新版的编辑原则，增补了作者的 26 封书信，从而大大地充实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保留了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通信；删去了 25 封观点接近的书信。

与《马恩选集》中文第 1 版相比，《马恩选集》中文第 2 版有四个鲜明特点：“更加科学合理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比较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论述；译文质量有了全面提高；参考资料更加翔实。”^① 这套《马恩选集》对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列宁著作的编译与出版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人民成功的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的著作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央编译局一成立，就开始了《列宁全集》的编译。但由于当时编译局工作的重点是翻译《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的翻译工作进展迟缓。

1953 年，中央编译局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开始编译《列宁全集》中文版，到 1955 年共翻译了五卷，仅在 1955 年 12 月出版了第 1 卷。1956 年《斯大林全集》的编译工作接近结束，中共中央指示编译局加快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为此编译局制定了 1956—1960 年的五年工作计划，确定五年内译出 23 卷《列宁选集》。但是，按这个速度，当时已经出版的俄文版 38 卷《列宁选集》（第 39 卷尚未出版）要到 60 年代末才能全部译出。这种情况既不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广大干部群众渴望学习马列主义的要求。一些六七十岁的老同志给中央编译局写信说，我们革命了一辈子，如果连《列宁全集》都

^① 《人民日报》1995 年 10 月 27 日。

看不到，真是遗憾。中央领导同志也多次做出指示，希望编译局加快《列宁全集》的翻译出版。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厂等单位表示，编辑、校对、排印、装订各个方面都已安排好，就希望编译局尽快把稿子送来。在这一形势的鼓舞下，编译局的同志经过多次讨论，修改了工作计划，决定在1959年10月1日前完成《列宁全集》的译校工作，“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余下的时间不到两年，而尚未译校的全集还有31卷，为了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编译局全体总动员，并且重新调整了力量，改进工作组织，简化工作程序，争分夺秒，日夜苦战，为完成《列宁全集》的“献礼计划”而奋斗。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厂与编译局协调一致，紧密配合。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列宁全集》的“献礼计划”顺利完成。1963年，中央编译局又翻译出版了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作为《列宁全集》的第39卷。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的编译和出版对于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研究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献礼计划’也有不足之处，由于时间紧迫，也由于干部水平的限制，译文质量存在着不少问题”，^①并且明显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为此，1982年5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编译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1984年开始出版，1990年由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齐，共60卷。编译出版连准备工作在内，前后历时15年。中央编译局近百人参加了这一艰巨的工作，12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五十名教授专家参加了校译工作。每卷印数两万册。新版全集的纸张、印刷、装帧都是第一流的，“可以毫不夸

^①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第18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1版。

张的说，这是完成了一项足以与国家重点工程相媲美的宏大工程”。^①

新版《列宁全集》是我国第一部自行编辑的马列经典著作的全集。它内容丰富，卷帙浩繁，比第1版增加21卷，收入列宁文献近万件，加上各种参考资料，总字数达2800万字，在目前世界上各种版本的《列宁全集》中，中文第2版是收载列宁文献最丰富的版本。

收入新版全集的列宁文献有相当一部分是首次译成中文，原载《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和《列宁文稿》各卷的译文，在收入新版全集时，都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或其他俄文版本逐字逐句进行了校订。有些著作列宁不是用俄文，而是用德、英等其他文字写的，则依据或参考相应的文本校订。总的来说，中文第2版全集比中文第1版改动很多，除了订正原译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外，还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补正了俄文第4版时列宁原著的删改。有个别列宁文献俄文版本根据第二手资料刊印，且有诸多删节，在编译新版全集时，则设法找到了第一手资料校译，恢复了列宁文献的原貌。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编者在掌握俄文版《列宁全集》第1—5版和《列宁文稿》第1—40卷等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收入新版全集的近百篇著作的准确性和写作日期逐一进行了核实，按照较科学合理的历史分期编定各卷篇目，并且按文献的性质分为三大部分，即著作卷（第1—43卷）、书信卷（第44—50卷）和笔记卷（第54—60卷）。

新版全集各卷都有较齐备而翔实的参考资料，各卷的前言介绍本卷著作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主要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的变化，以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堪为读者学习和研究本

^① 胡乔木：《祝贺列宁全集第2版出版发行，努力学习列宁著作》，《人民日报》1991年4月28日。

卷的“导游”。

《列宁全集》的出版，便利了广大人民对列宁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但人们感到还有必要编译出版一些供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列宁著作的人门书，为此，中央编译局从《列宁全集》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篇目，着手编辑《列宁选集》并于1960年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列宁选集》中文第1版共4卷，收入列宁1894—1923年的著作205篇。1972年10月，编者根据当时形势，对所选文章做了一些增删和调整，对注释做了较大的增补和修订，出版了《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共收入列宁1894—1923年的著作179篇。

收入《列宁选集》的著作，大部分是全文，只有小部分是摘录。所有文章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的顺序编排。每卷正文之后有注释，并附有人名索引。第2版注释比第1版多340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收入列宁1894—1907年写的27篇文章（比第1版多一篇）。主要有《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怎么办》、《退一步，进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

第2卷收入列宁1908—1917年写的37篇文章（比第2版少13篇）。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

第3卷收入列宁1917—1919年写的60篇文章（比第1版少8篇）。主要有《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论口号》、《国家与革命》、《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论“民主”和专政》、《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向匈牙利工人致敬》、《无产阶级和叛徒考茨基》等。

第4卷收入列宁1919—1923年写的55篇文章（比第1版少6篇）。主要有《伟大的创举》、《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的幼稚病》、《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土地问题提纲初稿》、《论我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

《列宁全集》第1版和以它为基础编选的《列宁选集》，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列宁选集》第1版、第2版的“译文有些地方不够准确，选材时带有时代烙印，偏重于有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附录的资料不够丰富，准确等”。^①因此还不能完全适应读者学习和研究的需要。为此中央编译局于1995年根据中文第2版编辑出版了《列宁选集》的新版本。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在选材上做了适当调整，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列宁思想遗产的精华，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理论贡献，同时尽可能照顾社会各界广大读者的需要。为了帮助读者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提高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本版选集酌量增收了列宁有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著述。从探索和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出发，还较多地增收了反映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文献，包括有关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改革经济政治体制，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科技事业，完善法制等内容，删减了某些重复和涉及党内历史斗争细节的篇幅。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又一重大成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斯大林著作的编译与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列经典著作编译出版的过程中，考虑到

^① 《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7日。

当时形势的需要，首先是以翻译《斯大林全集》作为中心任务。为了保证翻译质量，编译局调整劳动组织，加强译校力量，制定了严密的工作程序，集体校审、主译、副译、校审员、助理校审员、资料员、修辞员分工负责，紧密配合。室主任精益求精，理论上推敲，文字上琢磨，精雕细刻，一丝不苟。每篇译文都要经过七八次校改，每万字的校改时间平均为220小时。凡遇疑难问题，有争论的问题，都要提到全局业务会上讨论解决。仅为第1卷举行的业务会就达28次之多。有些译文是局长亲自主持召开会议逐字逐句，集体讨论定稿的。经过局外各界的大力帮助和全局同志的紧张工作，《斯大林全集》中文版13卷终于在1958年全部出齐。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收入了斯大林在1901—1934年1月间的著作，其中包括论文、演说、报告和讲话等。编入各卷的著作均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每卷卷首都有说明，卷后附有注释和年表，总共收入著作近500篇，300余万字。

为便于广大中国读者的学习和研究，中央编译局还编译了《斯大林选集》，共分上下两卷，收入了斯大林从1901—1952年各个时期的56篇文章，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入选集的著作除少数几篇是摘录之外，大部分是全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编排。中央编译局在编辑这套选集时重新校订了译文，每卷正文之后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

《斯大林选集》上卷收入了斯大林1901—1927年间的重要著作。主要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略论党内意见分歧》、《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论列宁》、《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再论我们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

下卷收入了斯大林1928—1952年的重要著作。主要有《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和德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

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附录收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

4. 马克思主义专题文集和少数民族文字本的编译与出版

在中央编译局集中力量编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三大全集”、“三大选集”的同时，各出版社通力协作，编译出版了大量马列著作的专题文集，如建国初期解放社翻印了由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两卷本）等。又如1975年人民出版社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编辑了《马列著作选读》三卷，附有详细的注释，是供广大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较好的普及本，其中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59篇文章，53万字，共印了384万册，对普及马克思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1978年，中共中央党校编辑了一套《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学说编为4册，其中全文收入或节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重要著作33篇和恩格斯的8封书信，部分著作的译文经过了编译局的重新校订。这套选读本是为党校学员学习使用的，共印了113万册，适应了广大党的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需要。从1981年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共5卷，收入马克思军事著作293篇和86封书信；《列宁军事文集》和《斯大林军事文集》各一卷，收入列宁著作125篇，斯大林著作93篇。这是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不可缺少的读物。至于其他专题文集和专题言论汇编则更多，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共编辑出版了几百种。

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单行本也大量出版。据1984年的粗略统计，共出版28种，基本上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比较重要的著作。又据1989年的统计，公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上都已有了中文本。其中许多重要著作多次再

版，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无产阶级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等。一些著作还同时出版不同的译本，如《资本论》既有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也有编译局的译本；《共产党宣言》既有编译局的译本，也有成仿吾的译本；《反杜林论》既有吴黎平的译本，也有编译局的译本。这些单行本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广泛流传，发行量很大，如《共产党宣言》的印数至1984年已达5990多万册；同一年，《国家与革命》的印数已达6270多万册。

把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气象。1953年，民族出版社作为第一个全国性的专门翻译少数民族文版图书的机构在北京建立。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使用蒙、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50年代初，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首先被翻译出版。随后，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列宁的《怎么办》和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相继被翻译出版。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斯大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殖民地问题》等著作陆续被翻译出版。70年代翻译出版的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书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论权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自然辩证法》、《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

为加快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少数民族文字版翻译工作，以适应少数民族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1978年，中央批准

在北京建立了中央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民族语文翻译局，简称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专门负责马克思主义著作、毛泽东和中国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著作的民族文字翻译工作。

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的同志为此付出了艰辛劳动。大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汉语文和民族语文，学习外语。翻译局还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工作人员水平，如聘请中央党校和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比较系统地辅导翻译人员，选送翻译人员到中央党校和一些高等院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语和相关课程。局内开办了十多个外语学习班，组织人员学习德语、英语等多种外语。为了确保译文质量，整个工作严格按照翻译、初审、复审、定稿、核对原文，统一名词术语，通读译文等程序进行，努力使译文达到较高水平。

经过辛勤工作，中央语文翻译局陆续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单行本，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书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导言》、《论权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自然辩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

在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单行本的同时，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还着手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通过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直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对于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各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印行，表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编译出版事业的繁荣兴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入人心，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1.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观察事物的一般观点和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马克思主义同其他任何学说一样，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许多原理和结论，不可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和地域，而必须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和丰富。然而，要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层而的“引进”变为实践层而的嫁接，要把“俄国式”的社会主义理想，变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实运动，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付出艰辛的努力与求索，关键在于找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国情的结合点。五四运动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开端，就在于它找到了这一中西文化在现代历史时空的结合点，即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是在这两大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由理想到现实的创造转换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为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极为痛苦的探索，中国革命也付出过高昂的代价。人们不会忘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真理、倡导社会主义运动方面的不朽贡献。但勿庸讳言，他们当中一些人在理论上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不懂得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同时，他们盲目照搬共产国际的“本本”，盲目模仿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导致了“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无论是后来沦为取消主义的陈独秀，还是把马克思主义极端教条化、“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忠实”的王明，他们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

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血的教训使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认识了“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加速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和特殊规律的探索。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总结两次革命失败的教训，逐步把军事战略和政治方针、策略问题上升到思想路线，即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来。还是在1936年底，毛泽东就强调对苏联革命战争的经验不能照搬，否则就“要打败仗”，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重点放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上。稍后，他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则把倡导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作为主题，为党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的理解是：第一，要立足于中国实际。不能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和国外经验，而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第二，要带有民族特性。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同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三，要有新的理论创造。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上，而应不断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使之理论化，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没有的新结论、新观点。总之，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认为必须有对马克思主义

的精湛的研究，有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深入了解，有对实际斗争经验的不断总结。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而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以及近代以来整个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并给以理论的高度概括，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须途径。

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产生了，而且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其丰富的内容集中到一点，就是解决了中国需要进行一种什么式样的革命以及如何进行这一革命的问题，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并且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国家独立、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其鲜明特点，就是采取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

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物质基础，而社会主义改造又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从而把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革命和技术方面的革命，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紧密结合起来，互相促进，有力地推动工农业生产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把对生产关系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创举。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中国实现了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①

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开展建设，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中国的国情与苏联并不完全相同，而且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本国实际走自己的路。1955年底，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此后，他更是在各种场合多次阐述对待外国经验应该有的辩证态度，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要调动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强调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这些重要的思想，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道路，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领导全党开始了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56年中共八大明确宣布：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虽然我们还有解放台湾、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等艰巨任务，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设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

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① 这次会议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成果，尽管毛泽东很快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但是这些重要成果毕竟为后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矛盾的新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明确提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严格地区分和处理；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这种时候，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为此，他具体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项方针，即：在人民内部日常政治生活中，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学说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 809—810 页，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史上，毛泽东第一次将我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创性发展。1979年，邓小平在谈到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时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他多次强调，即使在1957年以后，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仍有重要的贡献，毛泽东思想还在发展中。邓小平认为《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他还肯定并引用了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的一段话，即必须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等等。^①

总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②直到“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③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发展史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5页。

② 同①，第345页。

③ 同①，第172页。

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2.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胜利发展。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是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反复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不能胜利；有了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也不能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也可以说是一条基本规律。富于理论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①

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出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 列宁也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③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邓小平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④ 按照这种科学态度，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说出了许多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提出的新观点，如社会主义必须改革开放的观点，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社会主义要加强两个文明建设的观点，以“三个有利于”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判断标准的观点，等等。这些新观点，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一个半世纪前，《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

① 《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③ 《列宁全集》第1卷（第2版），第27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

向。但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思想解放。邓小平在纠正过去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

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问题的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这些变化，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针对新的形势，邓小平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在做出这个总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领导我们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国际战略，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我们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我们在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供了明确的指针。这也是邓小平理

论所蕴含的鲜明的时代精神。

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一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成功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它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已经被证明是指导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的科学理论。

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并且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论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着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所作出的精辟论断；是深入总结我们党近80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

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作出的科学结论；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的新概括，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新要求。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 21 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解决党的建设两大历史性课题，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创造力的行动指南。

江泽民同志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三个代表”的丰富思想内涵和巨大的现实作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克服困难、战胜强敌，夺取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中国先进文化、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战胜各种风险，经受各种考验，不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根本原因也在于坚持了“三个代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一些挫折和失误，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不同程度地背离了“三个代表”。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中，我们党要解决好诸多复杂的矛盾和困难，经受住新的考验和锻炼，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党的根本性质，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作用；创造历史的是人民，人民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在当代中国，三者有机地统一于党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① 由于这一重要

^① 参见《人民日报》2000年5月2日。

论述更为完整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它的提出也进一步丰富了对于执政党的时代使命、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指导地位的确立

“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①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其最大的作用就是有力地撞击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原有的旧文化机体产生裂变，并且被共产党人日益紧密地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都要求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建国以后，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更为艰巨，更迫切地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1955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 1950 年开始的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的基础上，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更为深入的唯物主义思想教育。指出：“不加强这条战线，不首先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胜利，就不能保证在实际斗争中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对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使他们通过生动的思想斗争认识唯心主义思想的反动性，学会鉴别唯心主义思想，从而更深刻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663—664 页。

认识唯物主义思想的正确性”。^①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全国人民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增强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的自觉性。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以后的历次宪法都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把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写入宪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更加明确。实践证明，这是非常必要的。

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坚持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又反过来给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经济以巨大的影响。我国文化建设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更好地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需要，并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我国的特殊国情也决定了我国文化建设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发展到近代，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在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样，我国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就越过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充分发展的阶段。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但同时也使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显得特殊而复杂。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胜利避免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幸，但同时又把本国应由资本主义扫

^① 《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1955年2月。

荡封建主义的任务留给了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面对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及其对社会主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样，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包括自身在内的三极关系——社会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并相应地构成三种矛盾关系——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处在这样一种复杂关系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然会遇到一些特殊的问题。例如：当肃清封建主义影响时，外来资本主义思想可能会趁机风行；当反对资产阶级思潮时，封建主义的东西有可能会还魂。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我国文化建设中存在的规律，从而科学地制定我国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既防止“左”又警惕“右”，既不能僵化，也不能“自由化”，从而保证我国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时说过，新的文化“是民族的”，“必须带有民族的特性”，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站在民族振兴的立场上对中国文化提出的战略性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民族对立和差别未消失之前，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对于每一个民族都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没有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就没有民族的一切。民族的独立自主和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又是分不开的。事实上，从古至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具有民族精神和独立尊严的国家，在文化上仰赖别人的需要而生活。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既是凝聚整个民族的无形纽带，也是推动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当前我国生产力比较落后的状态下，更加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弘扬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弘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同时，马克思主义坚持文化的民族性是反对文化交流中的奴化思想和对世界文化优秀成分进行吸收的辩证统一。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民族独立自主精

神，才能在文化交流中实行拿来主义，用世界文化的精华来滋养自己，丰富自己，对其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合理改造，使其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而不至于随人俯仰，任人驱使，在文化上被人同化。

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正确地揭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为我们进行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建设必然具有科学的品格和科学的精神。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使我们自觉地吸收当代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优秀成果，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使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人类现代科学发展的进程相契合。有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才能科学对待本民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正确地协调民族性与科学性的关系。无论古人的东西，还是外国人的东西，都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有待加工的原材料，要区分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而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总之，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在“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的基础上实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标”。

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性。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指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而文化中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才得到了科学的解决。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农劳动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应该是“大众的”文化。所谓文化的大众性，是相对于文化的专制

性而言的，其实质是文化的支配权问题。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文化的支配权经历了三大阶段的依次更换，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依次处于文化的支配地位，而人民大众则始终处于被剥夺文化的地位。历史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文化的支配权理所当然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在文化领域中，人民大众的民主主义文化必然要占据主导地位。而人民大众的民主主义文化地位的实现，除了人民政权的建立之外，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文化才能由人民创造并为人民服务，其文化精神才能与人民大众的意愿息息相通。也只有这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由人民群众创造并为人民服务和文化、才能更好地发挥凝聚和激励群众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服务，更好地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并作用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步。

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指导，是丝毫不能动摇的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①而“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②

2. 百家文化中的主文化

文化有“主文化”与“亚文化”之分。所谓“主文化”，是指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它影响着这一时代大多数人的行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为准则；“亚文化”是一种支文化，是代表不同阶层和群众的文化，表现为多种多样。新中国实行的文化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学术自由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化精神生产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能够自由思考和自由讨论的环境有利于推动科学前进。精神生产劳动又是一种自由性的劳动，精神生产者需要有自主权和主动权。而这种自主权、主动权需要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的环境来培养和激发。精神生产还是一种认识的智力的活动。人的认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存在犯错误的可能。任何人都不可能保证他绝对正确，如果在探索中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就无异于不许探索，从而堵塞了追求真理的道路。文化科学史上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往往经历了几年、几十年甚至百千年的争论才得出正确的结论。有的争论，开始由于掌握资料的局限性而有利于一种理论，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又有利于另一种理论，或者两者可能互相补充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完善的理论。有的争论，开始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没有掌握住本质，而提出了错误的理论，经过若干次反复，才抓住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形成正确的理论。如果没有学术自由，而从某个人的认识成好恶来决定一个作品或科学研究的正确或错误，不但达不到对真理的认识，反而会使正确的东西得不到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造了科学文化发展的民主的政治环境。学术自由需要政治上的民主，学术争论本身不是政治生活，但是否允许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则属于政治生活的范畴。发展科学文化，需要有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需要克服“定于一尊”、以政治标准代替学术标准、不尊重学术研究成果和学者智慧、以权力和行政手段对学术问题进行干预等弊端。科学研究应该只尊重客观事实，崇尚真理，不迷信权威，不屈从个别

人的意志。领导者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力，不要害怕讲出不同意见。领导者可以不同意研究人员的观点，可以否定他们的结论，不接受他们的建议，但不能强迫他们违心地改变观点，修改结论，以迎合自己的需要。“双百”方针反对在科学文化领域以简单粗暴和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说、一种观点、一种风格，压制其他学派、观点和风格的做法，从而在政治上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民主的条件。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解决了发展科学文化的学风问题。发展科学文化，必须有好的学风，这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需要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但这种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平等的，既正确对待本派学说，又正确地对待别派学说。要有一种平等论争的风气，以理服人，不以势压人，不能只要求别人对自己宽容，而自己对别人一点也不宽容。要不怀偏见，勇于吸收各家各派的合理东西，修正和放弃自己观点中不合理或错误的东西。要提倡团结协作，同心协力探索真理，不能互相拆台，互告刁状，落井下石，不能一部分人在那里艰苦探索，另一部分人专在旁边指手画脚，说长道短，搬弄是非。这样“双百”方针所提倡和包含的论争自由和论争平等的原则，就为科学文化的发展确定了一个正确的学风。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不仅自觉地提倡和创造了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主文化。

马克思、恩格斯集中了当时世界上优秀的文化遗产，并对其进行合理改造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其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在当今社会，马克思主义这种开放体系使其能够改造和吸收各种文化的优秀成分，整合到自己的体系中来。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正是这样，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被马克思主义辩证

地吸收并用来指导人们的实践，而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自然会遭到马克思主义的抵制和抛弃，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被文化发展的潮流所淹没。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割断人类的历史，相反总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一定的历史基础上创造和发展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以及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等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而创立的。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都包含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文化遗产不是不分良莠地兼收并蓄，而是批判地继承，吸收其精华，抛弃其糟粕。我们继承优秀民族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推陈出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主张积极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果，而不是盲目模仿，机械照搬，要求立足于本民族的实践，对外来文化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改造，做到洋为中用。所有这些，都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三章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与中国

一、交贯古今中外文化源流的当代新儒学

面对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难以消解的矛盾与冲突，注重和谐、强调心性的新儒学在当代社会中日益成为诸多中外人士的理想期待和热门话题。由于当代新儒学交贯古今中西文化源流，因此，当代新儒学的发展过程，实际也可以说是中外人士对中西文化进行认真反思的过程。探讨当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便不容忽视当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

相对于先秦孔孟原始儒学而言，宋明儒学通常被称为新儒学。五四以来，面对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明对传统文明的种种冲击，出现了一批重新诠释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学人，他们力图重建儒家文化的价值系统，“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谋求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他们的思想学说被称为“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① 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人；50年代至70年代为第二阶段，新儒学思想主要在港台地区得到弘扬与发展，代表人物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80年代以来为第三阶段，新儒学不仅在港台与海外，在大陆思想文化界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代表人物有杜维明、余英时、成

^① 见方克立著：《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第45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中英、刘述先、蔡仁厚等人。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特按通行“现代”与“当代”的划分方法，将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现代新儒学统称为“当代新儒学”。1958年元月，香港的《再生》、《民主评论》杂志同时发表了由张君勱、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共同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成为“当代新儒学”崛起的标志。

1. 当代新儒学的东西学缘

当代新儒学的主要目标是“返本开新”（返儒家传统之本，开民主、科学之新）。要达到此文化重建之目的，既须深钻儒家经典，直接内中精言要义，又须洞悉西方文化源流，把握近现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只有这样，方能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取得融会中西文化的发言权。从思想资源上讲，当代新儒家可以说是交贯东西古今的。从知识传承上来看，几代新儒家之间有一线较为明显的师承关系。第三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等均为一代大儒熊十力的门人弟子；^①在第四代新儒家中，刘述先受业于方东美（第三代）、牟宗三，杜维明受业于牟宗三、徐复观，成中英亦系方东美亲传弟子，余英时乃史学大师钱穆（第二代）之得意门生。职是之故，当代新儒家便以深厚的传统功底阐释着各自理解的儒家传统。

“六经”被认为是孔门义理的宗骨，这自然是当代新儒家所关注的重要对象。对“六经”，当代新儒家并不执着于作者与内容的考辨，而更留意于对经典中“心”、“性”、“天”融为一体、以道德为本、以成就道德为旨归等内容的阐释和发挥。不过，总

^① 徐复观虽与熊十力无师生关系，但徐复观之由政治转向学术，乃是得益于其1943年在重庆熊给予他的教诲与启示。熊为第一代新儒家的重镇，曾受教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后由佛入儒，自身体认儒学的功夫尤为精深，其深邃的传统学识和生命承当的精神追求影响深远。

的来看，当代新儒家更注重、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还是宋明理学。因为“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①为当代新儒家的共识，而“心性之学”又正是宋明理学的重心所在。

宋明理学有程朱、陆王之别，一般来说，当代新儒家虽对程朱“理学”有一种同情式的理解，但在义理的大端处更倾心于陆王“心学”。

牟宗三是明显高扬陆王而抑斥程朱的。他认为宋明儒学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把《论语》、《孟子》、《中庸》、《易传》的思想推进了一步，明确说明了“天道性命通而为一”和“心性天为一”，从而意味着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完成。在牟宗三看来，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南宋的胡宏、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刘宗周等人为宋明儒学的主要代表。其中，北宋前三家尚未分系，而以下胡、陆、王、刘则为一大系，程颢、朱熹为一系。在这二系中，前者是大宗，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主流，上承着儒家经典的本有之义，体现了“理心合一”、“即存有即活动”的儒学真义，使原儒义理得到更圆融的展开；而后者将心性、理气相分，道体、性体“只存有不活动”，只是宋明儒学发展的歧出的旁支，是“别子”和“继别子为宗”。

唐君毅虽对程颐、朱熹一系的理学做过繁冗的发掘，但其从《孟子》、《中庸》、《易传》的思路直贯下来，研究重心始终未偏离陆王的“性之所在，即心之所在，亦即天命性命之所在”的思想，始终认为“由孔孟之精神为枢纽，所形成之中国文化精神，吾人即可说为：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即上帝之德直接现身）于人性、人伦、人文之精神仁道”。^②“中国文化之神

^①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见景海峰编：《当代新儒家》，第2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② 见《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转引张祥浩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编序，第2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髓，惟在充量的依内在于人之仁心，以超越的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普遍化此仁心，以视自然与人生，兼实现之于自然与人生而成人文”。唐君毅的哲学核心为“心本体论”，所谓“心本体”乃是能使精神活动有形有相而本身无形无相的本体，它能开出种种心灵境界，但又是心灵境界本身。这一思想与陆王的“心即理”、“良知”说也是一脉相承的。

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实质上是“心的文化”，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指出人生价值根源是来自人生命的本身——人的“心”。他在对程朱异同做了考辨后，指出“程朱陆王的性即理、心即理的争端，也未尝不可以泯除而归向于平铺的人文世界的大方向。平铺的人文世界，是走向现实社会而加以担当的世界”。^①似在调和程朱陆王，实不同意朱子所建立的“贯通的人文世界”，而更多地倾向于陆王心学。

余英时从新儒学的最终理想是要在“此世”中完成使命的角度出发，高度评价了阳明心学普世化的重大意义。认为“新儒家之有阳明学，正如佛教之有新禅宗。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至新禅宗才真正找到了归宿；新儒家的伦理也因为阳明学的出现才完成了它的社会化的历程”，而“程朱理学则并未完全扭转儒家和社会上下层脱节的情势”。^②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体，当代新儒学所诠释的儒学重心——宋明儒学本身“即多半是由于受到佛道的刺激而起”，是以原儒为体融进佛（禅）道而成，并从“二氏借了不少的概念与名言，来开拓自己的领地”。^③同时，佛道尤其是佛学

① 李维武编：《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徐复观新儒学论著辑要》，第2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② 辛华、任菁编：《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第34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③ 景海峰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第7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本身也在传统中国人的身上产生了深深的影响。故而，重建儒家传统的当代新儒家依然不能不对“既有复杂的宇宙观，也有细密的心理学”的佛学予以回应。当代新儒学既严格二者的实质性区别，又借佛门的智慧为新儒学的诠释铺路架桥。在当代新儒家中，牟宗三、唐君毅思想体系中所受佛教的影响尤为明显。“牟宗三哲学中的一组最重要的概念，诸如‘执的存有论’、‘无执的存有论’、‘分别说’、‘非分别说’乃至‘权教’、‘圆教’，或衍自佛教，或直接从佛教引出；他的巅峰之作《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用以判教和贞认圆教的方法，甚至完全是对佛教天台承袭。‘察业识莫若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立价值之主体，莫若儒。’这是牟氏对佛、道、释各有千秋的评说”。^①在唐君毅那里，“心灵九境说”标志着唐思想体系的最后形成，唐自称其“心灵九境说”是受了佛家“判教”的启示，其中第八境即佛教的“我法二空境”，地位仅次于第九境即儒教的“天德流行境”。在东西文化观上，当代新儒家多与第一代儒家一样，常用佛家语言的“趣寂”来对应西方现代文明的“执有”，从而凸显儒学对二者的超越优势。

在知识结构上，当代新儒家与第一代主流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相比，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前者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掌握比后者要全而深入得多。牟宗三早年苦读罗素、怀特海、康德哲学，从事于逻辑、知识论和康德知性哲学的研究，受到了很好的西方逻辑和概念分析的训练；晚年他重读康德，出版了《康德的道德哲学》等数种著译，对康德哲学有十分精深的把握。唐君毅“早年为学，先从西方哲学人手，曾自言历受詹姆士、英美新实在论及布莱得雷、康德、黑格尔等的影响。乃至几乎任何哲学宗派之思想家的书，只要能得着，都要看一看。30岁后，乃走到西方

^① 黄克剑、周勤著：《寂寞的复兴——论当代新儒家》，第2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唯心论路上，受黑格尔影响尤大”。^① 第四代新儒家在西学的吸取上比第三代又更占优势。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均系 60 年代留美博士出身（而牟、唐、徐均无留学经历），直接系统地受过西方哲学的训练（四人中除余英时为史学博士外，余皆哲学博士）。目前，除刘述先于 1981 年定居香港外，其他三人一直就职海外。刘述先在译介西方哲学典籍方面有卓著的表现，他还是华语世界研究德国现代哲学家卡西勒的第一人。成中英更是一位亲身参与了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当代学人，其“哲学生命受到了西方哲学最严格的陶冶和锤炼”，并已“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②

新儒家欲使传统儒学适应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并期望走向世界，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中占主导地位，便不能不注意西方哲学。他们一方面批评西方哲学，指出其并非解决人类终极问题之道；另一方而借鉴吸收西方哲学的内容和方法，来诠释、发展传统儒学，给儒家思想以新的证明。

当代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吸收，在唐君毅那里，明显体现出对黑格尔的吸收与消化。唐君毅思想中最重要的“心灵九境说”既受佛教的启示，也深受黑格尔的影响，其“九境”的次第转进和相互贯通的论说，大体合着黑格尔思辨哲学正、反、合的律则。“三境、主观三境和超主观三境循序排成的三三方阵中，无论是横的向度或纵的向度，也都多少含着正、反、合为逻辑延展之链的意趣”。^③

牟宗三则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其有关学说实为康德哲学与儒家孔孟、陆王一系心性之学相结合的产物。如在其晚年《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和《现象与物自身》两书中，着力阐发康德

① 景海峰编：《当代新儒家》，第 315 页。

② 成中英著：《世纪之交的抉择》，第 398 页，上海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寂寞的复兴》，第 33—34 页。

《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包含的形而上学（存有论）思想，特别是康德有关现象和物自身（物自体）的区分及意义；通过融摄康德，牟宗三开出了著名的“两层存有论”即“执的存有论”和“无执的存有论”说。^①

余英时融会西学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有突出体现。他吸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著名观点，从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角度考察了宋明儒学的发展演变，得出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大体若合符节”的结论。对此，有人尖刻地批评说：“如果把韦伯的观点和理论架构抽掉，本书将只剩下一些中国历史的整理爬梳。”^②

刘述先在文化建设方面尤致力于儒家心性之学的解释学重构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深度融合。他借用西方哲学“超越性”、“内在性”的概念范畴来分析儒家的“天人合一”理论，以表达其关于人的内在的生生不息的精神生命的源泉的思想；西方哲学尤其是卡西勒的形式符号哲学更是成为他目前构造自己“系统哲学”的一个坯模。

成中英作为亲身参与现代西方哲学进程的学人，积极开展中西哲学之间的“哲学的批评”，并在中西哲学的互诤互释中，创立了有名的“本体诠释学”哲学理论，力图以此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全球化，进而创立未来的“世界哲学”。

杜维明则对主导现代西方价值取向的启蒙心态进行了反思，对韦伯、帕森斯及哈贝马斯等人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认为韦伯、帕森斯及哈贝马斯一脉相承所建构的理性化过程为现代性的本质特色，因之“深深感到发掘儒家传统的人文资源不仅

① 郑家栋编：《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编序，第35—4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杭之著：《一苇集》，第21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

有助于中国现代精神的发展，也可建构全球伦理这个设想”。^①

正因当代新儒家在学识上贯通古今中外，尤其第四代新儒家的思想比起他们的前辈来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故而他们能站在更高的起点上重新诠释儒家传统。尽管当代新儒家依然具有本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但他们在对现代社会种种流弊的批评、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把握、对中西文化的会通、对文化重建的种种构想上，不但在学理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在实践上对当今中国文化的建设乃至世界文化的建设亦不无启示作用，且不容忽视。

2. 当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

1958年初，香港的《民主评论》和《再生》杂志同时发表了由当代新儒家的四位核心人物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共同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一文，向全世界昭示其对中国文化所持的基本态度与基本立场。“自1949年后，这四人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积极与最具诠释力的发言人，所以此篇宣言足以代表保守思想趋势的重要大纲”。^②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当代新儒学思想的一些共同趋向。下面试以这篇宣言为主，结合第四代新儒家的思想来探讨当代新儒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1）民族本位文化的立场

现代新儒学本是五四以来在欧风美雨冲击下民族文化力图自救的产物。50年代以来，当代新儒家流落港台、海外，这种“花果飘零”的特殊处境，使他们尤具强烈的“寻根意识”，要求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中国的大陆还是二战后的西方世界，价值世界与形上世界均已失落，惟有“灵根再

^① 杜维明著：《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自序，第33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② 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见《当代新儒家》，第53—54页。

植”，弘扬传统方能有所补救，所以他们格外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传承性，以使用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去抵制各种“西化”的迹象或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调，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心。在《宣言》中，新儒家首先针对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已经死了的谬论，宣称“我们真切相信：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①任何客观上的历史文化，自始都是人类客观精神生命的表现，所以对任何文化欲作“真实的了解”，必须怀有“同情”与“敬意”的态度。据此，他们强调，中国的历史文化“亦是继续不断的一活的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自来即有其一贯之统绪的存在”或者说有“一本性”，中国文化历久不灭正说明了问题。故而，那种认为中国文化已死的想法“却系大错”，而且中国文化还有诸多值得西方人学习的深刻的、不朽的智慧。牟宗三尤其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指出中国文化要想真正发展，“只有维持他自己的主位性；对于这个文化生命动源的主位性，我们要念兹在兹，把他维持住”。^②80年代以来，面对“工业东亚”世界的崛起和西方文明病的危机，当代新儒家对民族本位文化更具信心。当代新儒家还从学理上探讨了坚持中国本位文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宣言》指出，具有“一本性”来源的中国文化自有其独立性，不必向“多元性”来源的西方文化认同。徐复观还着重探讨过文化的异同与古今问题，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共性和个性，故而“各民族有各民族的价值系统，而不应该以西方的价值系统为此方面的惟一标准”。^③余英时也认为“每一个文化系统中的价值都可以分为普遍与特殊两类”，那种“以西方现代的价值是普遍的，中国传统的价值是特殊的，这是一个根本站不住的

① 见《宣言》，收入《当代新儒家》一书，此见该书第3页。

② 见《当代新儒家》，第177页。

③ 转引李维武编：《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徐复观新儒学论著辑要》编序，第1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观点”。^①总之，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中国传统亦不对立于现代化，中国本位文化自有其现代的生机与活力。

(2) 强调儒家“心性之学”的泛道德主义倾向

“心性之学”论及的是人自身的“当然的义理之本原所在”，出自先秦儒学，经宋明理学家详加阐释后“大盛”，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当代新儒学继承和发扬宋明理学的精神，进一步高扬了“心性之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认为“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亦是中国思想中之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之真正的理由所在”。他们指出，中国儒家的“心性之学”既不同于佛教的“由观照冥会而来之心性之学”，更不同于西方心理学或传统哲学中理性的灵魂和认识论形而上学。这门学问，用车宗三的话来说是“强调道德意识，讲求道德意识、自我意识的体现”，宋明儒特重的内圣“即是内在于每一个人都要通过道德的实践做圣贤的功夫”。^② 这门学问，“是人之道德实践的基础，同时是随人之道德实践生活之深度，而加深此学之深度的”。它注重“知行合一”，在实践中觉悟心性，使“知行二者，相依而进”。如将这种道德实践由个体推及家庭、国家、天下宇宙、历史及一切吉凶祸福之环境，则“人生之一切行道而成物之事，皆为成德而成己之事”。这些从内在的觉悟中看，都“不外是尽自己的心性”，由于“人之道德实践之意志，其所关涉者无限量，而此自己之心性亦无限量”，故而在道德实践中，得以印证个人与天地万物实为一体，通过这种印证，“即见此心此性，同时即同于天。于是人能尽心知性则知天，人之存心养性亦即所以事天。而人性即天性，人德即天德，人之尽性成德之事，皆所以赞天地之化育”。或“人欲能尽心性，便可以达天德，天理，

^① 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见《当代新儒家》，第160页。

天心而与天地合德，与天地参”。即“天人合一”。这种“心性之学”，通贯于“社会之伦理礼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行上学而一之者”。《宣言》旗帜鲜明地宣称：“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这门学问，在中国文化中显示了明显的优越性：“中国文化以心性为一切价值之根源，故人对此心性有一念之自觉，则人生价值，宇宙价值，皆全部呈显，圆满具足。”故而，中国历史文化才会如此之长久。与这种“天人合一”的心性之学相对立的是，在西方文化中，无论是希腊的知性传统，还是希伯来的宗教传统，或罗马的法制伦理传统，都预设着主客对立、人与自然、人与上帝的种种对立。随着时代的进步，出现了种种价值失落、意义迷失的矛盾和冲突，使人的终极意义终难有安顿之处。而儒家心性之学所讲的此心此性与天心天理的合一性则成为“我们德性的生生之源”。故中国虽无宗教，实有一宗教性的超越信仰，或者说心性之学即为以道德实践为基础的道德宗教。在新儒家们看来，要医治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心性儒学才是治病之本。“儒家的‘仁心’的托付与‘生生不已’的精神……之能解决个人内在安心立命的问题，实在可以解决现代破除迷信以后的宗教信仰与终极托付的问题”。儒家的心性之学具有万古常新的永恒价值，道德形而上的解决成了根本的解决，这是当代新儒家的共识。正因心性之学在时代发展中具有如此优势，牟宗三致力呼吁重建“道德的理想主义”，要用中国的心性“内圣”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刘述先大胆宣称：医治时代的慧解在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即他所谓“仁心与天道的生生体证”），从而“中国哲学的日子正要到来”。余英时突出走“内在超越之路”的现代意义。杜维明也依此满怀信心地期望着“儒学的第三期发展”。

（3）援西人儒、返本开新的乐观信念

“西方文化是支配现代世界的文化”，这是新儒家们谁也不否认的事实，而且他们也积极主张吸收、接纳西方现代文化尤其是

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以适应时代的潮流，跟上时代的步伐。但他们与种种西化论、现代化论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是“援西学入儒”，“儒化西洋文化”，将“民主”与“科学”纳入儒学体系中，通过返儒学之“本”开“民主”与“科学”之新，使传统儒学向现代儒学转变，走上儒学现代化和世界化的道路。对这种以儒学为根本的中西融合及传统儒学现代转化的前景，当代新儒家们充满信心。在他们看来，虽然传统儒学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及种种实用技术，以致未能实现工业现代化，但传统儒学与“民主”、“科学”并非水火不容，“不能承认中国之文化思想，没有民主思想之种子，其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亦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反科学的，自来即轻视科学技术的”。用余英时的话来说，则是“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并不是两个原不相干的实体，尤其不是互相排斥对立的”。^①《宣言》指出，我国古代文化是注重实用技术的，从明末以来儒学的经世思想直至清末的富强运动，“此中仍一贯有欲由对自然之知识，以达于正德兼利用厚生之要求，贯注于其中”。中国所缺少的只是在“正德和利用厚生之间，少了一个理论科学知识之扩充，以为媒介”。所以解决知道，便是在道统之外，再建一“学统”，即科学知识传承不断之统，而这也正是儒学完善自身的应有之事。在牟宗三看来，“儒家的内在目的即要求科学”。^②至于“民主”观念的开出，当代新儒家们更是充满信心。《宣言》从儒家肯定“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并一贯相信在道德上，人皆可以为尧舜为贤王，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等来看，此中之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即为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至少亦为民主政治思想之种子之所在”。这种制度，“必然当发展至民主制度之肯定”。另一方面，从中国现代政

①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5页。

② 《当代新儒家》，第165页。

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人民要求民主政治也是根本不成问题的。尽管当代新儒家们在返本开新的具体途径上见仁见智，在理想层面向现实层面落实的过程中难以打开局面，但对返本开新，由“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前景则始终是乐观的。如牟宗三认为，“儒家亦不只是消极‘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所以儒家之于现代化，不能看成个‘适应’的问题，而应看成‘实现’的问题”。^①刘述先指出：“我们没有理由把看重生民的仁心的儒家传统与科学、民主对立起来，不仅如此，尤有进者，这一传统甚至还可以超越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一些要求结合起来，而在未来有一个光辉的远景。”^②同时，80年代以来的新儒学在吸收西学的问题上也越来越具有开放和包容意识。

(4) 中国文化必将挺立于世界的优越意识

当代新儒学在港台和海外的继续和发展，并非仅是海外华人学者民主文化危机感的产物，也有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回应，对世界文化走向的理性反思。《宣言》对西方文化本身是否有足够的力量领导人类文化深表怀疑。虽然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突飞猛进，令其他古老文化望尘莫及，西方文化中也有诸多普遍永恒的价值，但在此过程中，也明显出现了种种难以克服的冲突和弊端。对外是种种宗教、民族战争和以强欺弱的殖民行为；在内则是个体价值的失落，意义的迷失，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等等。以至“在今日科学已发展至核于武器，足以毁灭人类之时期，人类之前途乃惶惶不可终日”。之所以如此，根源即在西方

^① 《当代新儒家》，第156页。

^② 转引《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编序，第15页。所谓“看重生民的仁心的儒家传统”是在刘述先看来，儒家生命哲学的态度是：在宇宙之内，永远没有一刻停滞的时机，四时代序，万物滋生，万物以仁德为本，不断向前发展。而没有任何杂乱和纷扰，生活在这一宇宙里的人只要把自己的良知良能尽量实现出来，就可以上下与天地同流，而达于至善。

文化本身的缺点上。由于“西方之传统文化，是来源于以理智之理性，认识客观世界之条理之希腊精神，注重社会国家之法制组织之罗马精神”，在哲学上存在本体界与现象界之分，宗教上天国与人间之分，社会思想上乌托邦与现实之分（余英时语），因此人类只知道“求客观的了解世界，以形成知识，本知识以理想，再将此理想，不断客观化于自然与社会，成为如存在人生以外之文化物财。其不断积累加重，而自成一机械的外在桎梏，遂非人力之所能主宰”。使人不能超化于自身，向上升进于神明，尤其在现代世界中，在“上帝死亡”、“消除神话”后带来了种种困顿和迷惑，终极观念无从着落。而中国的心性之学由于是“一种由知贯注到行，以超化人之存在自己，以升进于神明之学”，因而始终是圆满自足的。鉴于中国文化这种道德形而上的优势，《宣言》不无自豪地宣称，西方人要完成自身精神思想之升进，必须从五个方面来东方智慧（实即儒家文化），即：“当下既是”的精神与“一切放下”的襟抱；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惻怛或悲悯之情；^① 如何使文化悠久之智慧；天下一家之情怀。《宣言》进而期望世界学术在知识学问之外，还当重视一种学问，即中国所立的人极的学问，也即强调道德主体性的儒家的心性之学，“这是这个时代的人应当认识的一种大学问”。在唐君毅眼里，现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只能用他所设想的新宗教——儒教来解决；在刘述先看来，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理想才是提供现代世界惟一健康的信仰的出路。新儒家们的这种文化优越意识，实际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新儒家学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夸大了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某些不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所限定的恒常价值在解决人类文化发展中所遭到的普遍性问题方面

^① 新儒家认为“惻世”是仁者对他人的“最深的爱”，这种“惻世悲悯”与一般的爱不同，它是自己的真实存在的生命精神，与他人生命精神间的一种共同的内在振动。

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①

3. 当代新儒家的文化思想

国内关于“当代新儒家”划分是不一致的，而且一般将“当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视做同一概念。^②本章根据全书的体例，按通行现当代历史的划分方法，将1949年后寓居港台、海外弘扬儒家传统的第三代、第四代新儒学学者称为“当代新儒家”（第一代、第二代新儒家1949年后虽都健在大陆、港台或海外，但因他们的思想体系均在1949年以前已完成，故不属本书所限定的当代新儒家的考察范围）。第三代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四代的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为其代表人物。第四代与第三代虽有较为明显的师承关系，总体趋向也基本一致，但各自在对传统儒学的诠释及文化重建的主张上又独具特色。

徐复观（1903—1982年），湖北浠水人。他是当代新儒家中惟一一位由政界转向学界的传奇式的人物。抗战期间，在重庆受熊十力的教诲，深悟文化问题的重要性。抗战胜利后，以陆军少将的身份志愿退役，转而从事学术活动。离开大陆后，成为当代

① 郑家栋：《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编序。

② 如罗义俊编著的《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将梁漱溟、张君勱、熊十力、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七人视为“当代新儒家”加以评说；景海峰编的《当代新儒家》（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当代新儒家”指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黄克剑、周勤著《寂寞的复兴》中的“当代新儒家”指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五人；以上均不包括第四代新儒家，大概是因为在当时评论第四代新儒家的思想和学说尚为时过早。不过在郑家栋的《现代新儒学概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已将“现代新儒家”的范围扩及第四代，以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为代表；在方克立主编的《现代新儒学论著辑要》丛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1992年陆续出版）中，也已出版了第四代余英时、刘述先、杜维明、成中英的专集，将他们视为“现代新儒家”。

新儒家在港台崛起的重要发起人之一。

在文化哲学观中，徐复观认为只有价值才是文化的核心，价值世界比科学世界更重要。在文化的共殊、古今问题上，认为每一文化都有共性与个性，不应以西方的价值系统为惟一的标准；传统与现代“相互定位”，实无古今之别。

在中国文化观上，提出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为《易传》中所说的忧患意识。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指导下，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仁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实质上又是“心的文化”。由此出发，徐复观认为重视现实生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从天道天命一步一步地向下落，落在具体的人的生命、行为之上”。^①这种“天的人文化”进程，从孔子开启，一直到二程建立了“平铺的人文世界”才得以彻底解决。“平铺的人文世界，是走向现实社会而加以承当的世界”。^②这种重视现实生命的非形上学特点，是他与同代的唐君毅、牟宗三思想的明显区别。

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对现实生命的重视和对人文精神的高扬，主要体现在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上。中国道德精神的代表是孔孟儒家，以仁为内容，人性论是其主干；艺术精神则以老庄道家为代表。显然，徐复观在中国文化观上并不独尊儒学，传统文化的视野较为开阔。

在儒家文化的现代出路上，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和民主政治相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中国历史上个人与专制、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主张复兴中国文化的途径是复古与开新的结合，即“古今同在”，是中国的“仁性”文化精神与西方的“知性”文化精神的结合。“使仁性知性，互转互忘而互相成，这是

^① 《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第 282 页。

^② 同^①，第 335 页。

儒家精神新生转进的大方向”。^①

唐君毅（1909—1978年），四川宜宾人，牟宗三誉其为“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1958年，牟宗三、张君勱、徐复观、唐君毅四人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便是由唐君毅执笔起草的。

道德学说是唐君毅思想学说的核心部分。内中以“道德自我”的观念立论，认为“道德自我”是文化意识的主宰，其内容即宋明儒学所讲的理性。从“性善论”说，相信“人能不断地实践其性中所具之善”，而使宇宙日趋完满，同时通过对儒学特别是阳明心学的现代阐释和发扬，强调弘扬道德实践中的主体精神作用，并提出“当下一念的自反自觉”的道德修养论。

在文化观上，其核心观念乃“文化是道德理性的分殊表现”。依此，他比较了中西文化，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它的融和性、一体性，中国文化的精神是“由孔孟之精神为枢纽”、“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于人性、人伦、人文之精神仁道”。^②这种以“仁”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始终具有无限的统摄性和宽容性；而分殊发展的西方文化则必须学习中国文化的这种统摄精神。他相信，未来的世界文化，必将是以中国文化为根基的新文化。提出以中国文化为主，吸收和统摄西方文化精神的文化建设途径。与此相应，他还提出了建立未来新宗教的设想。在他看来，现代社会问题只能用宗教来解决，而这种宗教乃是他所设想的新宗教：一种基于儒教、参照佛教、不同于基督教的“能使一切宗教逐渐会通融合”的宗教。

在哲学思想上，心本体论是其核心。从心本体论出发，他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为理论基础，吸收“佛学唯识无境”的思想，提出了著名的“心通三向九境说”，“三向”，即心灵生命先朝向

^① 《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第227页。

^② 转引《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编序，第27页。

客观境界，其次朝向主观境界，最后朝向主客观境界。每境又有体、相、用的区分，以生命心灵的三观对应于三境不同的体、相、用，就发展出所谓“九境”。其中第九境为天德流行境，相当于儒家所说的天人合德所成之境。“三向九境”归为一点，均源自心本体。唐君毅的心灵境界哲学是其一生学问和思想的本原所在。

牟宗三（1909—1995年），山东栖霞人。在当代新儒家中，他是公认的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在中国历史文化及其现代出路的问题上，牟宗三认为，中国历史文化是有道统而无学统与政统，“内圣强而外王弱”。中国文化要跟上时代，必须现代化，其途径则是他提出的“开出”说：用儒家的“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由“道统”开出“政统”和“学统”。他将自己的有关思想概括为“三统说”，即“道统之肯定”、“学统之开出”、“政统之继续”。其中“道统之肯定”是接续民族文化生命之本源大流；而“学统之开出”和“政统之继续”则是要把儒家的“道统”落实到外王事业上以开出“新外王”，即发展出现代科学与民主。牟宗三从黑格尔精神的“内在有机发展”的必然性观念出发，相信“新外王”及其背后的基本精神一定会从传统文化中的“老内圣”中开显出来，“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开出的途径就是“道德理性（良知）的自我坎陷”，通过“坎陷”，良知从与物无对的直觉状态转为主客对列的知性状态，从道德主体转出知性主体即“科学”与“民主”。

对“内圣之学”的把握，牟宗三认为不光要肯定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更要确定儒学自身的“传法统系”。在他看来，只有孔孟、陆王一系才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主流和正宗。认为宋明儒对儒学的发展意味着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完成，故对宋明儒做了深入研究，他一反传统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区分和“朱子集北宋理学之大成”的说法，认为陆象山与王阳明归为一系，胡宏与刘宗周归为一系，两者又合为大一系，上承北宋周敦

颐、张载、程颢而为“宋明儒之大宗”，而程颐和朱熹一系则是旁枝。宋明儒的贡献在于弘扬内圣之学，但无外王方面的积极讨论，后者的任务正是当代新儒家的使命。

70年代以后牟的重心在以儒家心性哲学融会康德哲学以重建儒家“道德的形上学”。他认为，只有康德是西方哲学中承前启后的真正哲学家，因此，“中西融统的桥梁乃在康德”。受康德形上哲学的启发，他提出“人可有智的直觉”和“两层存有论”的理论。“两层存有论”指“执的存有论”和“无执的存有论”，即道德的形上学，它上通本体界也下开现象界，是“全体大用之学”。

余英时（1930— ），天津人。作为第四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本人却并不承认自己是新儒家。然而，其新儒学思想的倾向是较为显明的。

在文化观上，余英时强调，“我们的注意力应该从一般文化的通性转向每一个具体文化的个性”，每种文化都包含着普遍性与特殊性，不能将西方现代的价值视为普遍性的，现代化更不等于西化。

在中西文化观上，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个性特征为“内在超越”，西方则是“外在超越”；西方存在超越世界（即上帝）与人间世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对立，而中国则两个世界相互交涉，离中有合，合中有离。结果是西方虽然科学愈益进步，但价值之源已断，从而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境地；中国的内倾文化却使中国人具有“依自不依它”的人生态度，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反身而诚”的方式而感到它的真实不虚，并督促自我不断奋斗，儒家思想还推己及人，成就了人伦秩序和宇宙的和谐。认为儒家“君子”“刚毅进取”的精神具有即动即静、即思即行的兼容特征，是一种“最合于现代生活的宗教信仰”。

余英时明确指出：“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不是两个互相排斥的实体”，因而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持乐观态度。他从人与天

地的关系出发，认为中国的价值系统中，“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态度在接受西方的科学方面无甚障碍；从人与人的关系着手，认为中国的“人伦”、“仁”的道德观追求的是一种比西方“更高的‘公平’和更合理的‘秩序’”，中国人要建立民主制度，只须把政治从人伦秩序中分开，凸显人伦秩序中的合理成分后，向现代民主转变就不难了。

他吸收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探讨了中国宗教伦理的转向及其与商人精神的关系，认为宋明新儒学代表了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并对商人精神产生了实际影响，由宋明新儒学培养起来的商人精神与“新教伦理”一样具有“运用最理性的方法达到非理性的目的”的根本特征。

刘述先（1934— ），生于上海，祖籍江西吉安。第四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自己既不认为自己是新儒家，也不反对别人说他是新儒家。

刘述先主张坚持儒家的理想，认为医治时代疾病的“慧解”在东方的传统智慧，尤其是儒家的“心性之学”，因而大胆宣称：“中国哲学的日子正要到来”。他指出传统文化有三大基本特征（即：生命价值的自具性、内在性；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礼的观念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和五大局限（即：科学不发达；缺乏抽象逻辑思考方式；强烈的一元正统意识；缺乏一套公正客观的体制；缺乏对超越精神力量的虚心追求）。他将儒家传统做了三个方面的分疏，一是“哲学的睿识”，二是“传统典章制度的机括”，三是“民间价值的储存”。认为第一义在当下有蓬勃的生命力，第二义已成过去，第三义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并存。总之，他一方面肯定传统在理想层面的价值，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揭露其在现实层面的弊端。他认为，“儒学最中心的本质不外乎内在仁心的亲切体证”，由此推广出去，“人能体现自己生命内在本

具的价值，自强不息，不断创造更丰富的价值”。^① 儒家的这种生命哲学与生命情调，“当然是一种真正敞开的生命观”，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它将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成为一个重要支柱，在世界哲学领域中亦然。不过，他也清醒认识到，现实状况还不太乐观，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最大症结在于不能落实“新外王”，“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在现实上的矛盾冲突，还必须经过好几个世代才可望彻底解消，有机地整合起来”。^②

在文化哲学观上，他以深厚的中西学养致力于儒家心性之学的解释学重构及与西方哲学的深度融合。他借用“理一分殊”的概念，认为以往中国文化在实际表现上过分侧重“理一”，今后须多侧重“分殊”，才可与现代多元文化结合。他提出“系统哲学”的构想，即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普遍的架构，把分殊的文化成就熔为一炉。纳入一个开放的系统中作一个统一的考虑，而让各分殊的文化成就在这个系统中得到适当的定位。

成中英（1935— ），生于南京，祖籍湖北阳新县。第四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他认为，“中国文化不仅仅只是为自己所用，而且能够代表中国人的积极努力而贡献于世界”。“现代化包含着世界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的世界化的一个条件，而中国的现代化脱离不了一个世界化的内涵，也必须以世界化为目标，也可以说只有世界化，才能对自我进一步发展有利”。^③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有起点、理想（或目标）和方法等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解决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没有问题了。在他看来，起点和基础是历史的反省，理性的自觉目标和理想是整体化的世界观，是整体化的现代化与世界

① 《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第199页。

② 同①，第207页。

③ 成中英：《文化·伦理与管理》，第2页、第1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化。方法是从起点达到目标的一个过程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他自己融会中西思想所创立的“本体诠释学”，包括“从本体到原则，从原则到制度，从制度到运作”四个层次。总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的中心思想是：自觉地融入世界，但却运转如道之恒动，动而愈出，以致于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这也才是中国文化世界化的最深精义与最高境界”。^① 他相信，只要中国的“价值”文化与西方的“知识”文化能够相互对流，世界文化就有办法发展出来。

成中英的新儒学思想特点有三：一是力图在“世界哲学”的背景下，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表现出了超越新儒家与西化派简单对立的理论意向；二是尝试着在哲学“本体”的层面，探讨知识理性与情欲生命的价值意义；三是以比前辈新儒家更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及其重建的现代意义。^② 他认为自己所关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而不偏执于儒家一家的传统及现代重建，他对道家和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也加以肯定和宣扬，并经常儒道并提，正因如此，成中英本人并不承认自己是新儒家。

杜维明（1940— ），生于云南昆明。第四代新儒家中公认的代表人物。自述从1966年起，就决心全力从事对儒家精神做长期的探索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专业研究工作。

杜维明试图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批评西化论者的主张，说明儒家传统的历史和价值，认为既不可以西方现代文化为标准来取舍民族文化，也不可以把传统文化当做已死或僵的历史陈述，而应对其进行全而深入的反思，以谋求儒学的现代新发展。

他认为，不能把“儒教中国”和“儒家传统”混为一谈，指

^① 成中英：《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见《现代与传统》第8辑，第77页。

^②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295—298页。

出“‘儒教中国’可以理解为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在现代文化中各种曲折的表现。这也是国内一般所理解的封建遗毒”。“儒家传统”则是中国民族文化的构成要素，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精神。儒家的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具有历久长新的恒常价值。

他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发挥了牟宗三关于儒学发展的“三期”说，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认为从先秦到两汉是儒学发展的第一期，并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来加以说明；宋元明清是儒学发展的第二期，这一期儒学是东亚文明的集中体现，是针对印度佛教挑战的一个创造性的成功回应；而第三期儒学的发展，则是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在他看来，“儒家在21世纪是否有生命力，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经过纽约、巴黎、东京，最后回到中国”。即儒学只有在这些文化中生根，才会以康庄的姿态回到中国。他自称“我对此相当乐观”，其中一个重要依据在于儒家思想所独具的意义和价值：儒家思想可以使人在不断扩展的人际关系中实现一种自我超越，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推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具体环节和努力方向上，杜维明一方面强调与西方杰出思想家开展广泛、公平对话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除了哲学的重建外，还必须从超越的层次（即以西方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传统）、社会经济层次和深度的心理学层次等三方面对西方文化加以吸收。

杜维明认为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已经有了一些乐观的见证，90年代初，他提出“文化中国”的概念，并提出三个“文化中国”意义世界的观点，第一个意义世界是大陆、港、台和新加坡，第二个是指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第三个是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但对“文化中国”这个概念和中国有非常深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世界”。

4. 当代新儒学在海外的影响

当代新儒学是新儒家张君勱、钱穆、方东美特别是第三代新儒家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于50—60年代以一种强烈的“文化悲情”感在港台掀起和推动的。他们穿梭于港台之间，或创办书院（如香港新亚书院）、或创办刊物（如香港的《民主评论》、《人生》）、或组织学会团体（如台湾的人文学会），宣传各自的文化主张，弘扬传统儒学，在港台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是时在海外，新儒学基本上还可以说是默默无闻，很少有人问津，不少海外学者还深受韦伯观点的影响，即认为中国的儒学是一种无法转换成适应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保守的意识形态，所以西方人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态度多只是为研究而研究，而缺乏同情式的了解。职是之故，1958年元旦，张君勱、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四人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呼吁世界人士注意中国文化的活的生命力、思想的独特性及其现代意义。此文的英文译本刊于香港的《中国宗教》杂志（节译）和台湾的英文杂志《中国文化》上，1963年，作为附录收入张君勱在美国出版的《新儒家思想史》（下）（英文版），凡此种种，都在海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70年代，新儒学在海外的影响才真正出现转机，这主要是60—70年代亚洲经济变化的结果。从60年代起，日本、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始起飞；70年代，它们的飞速发展令世人瞩目；到8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已成为世界经济圈中举足轻重的经济势力。从70年代起，人们在探讨经济发展的原因时，开始注意到东亚这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均属儒家文化的辐射区，于是海外诸多学者纷纷从文化的角度来探究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儒家文化的关系。如美国学者赫尔曼·卡恩在1979年就出版了两本著作：《日本的挑战》（合著）与《世界经济的发展：1979年以后》。尤其是前一书在美国、加拿

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时出版，在日本又出了日文版，传播甚广。这两书提出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称为“新儒家社会”，认为作为儒家传统在现代社会表现形态的新儒家文化（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密切相关。在海外，探讨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的集大成之作大概要属 1989 年美国华盛顿学院出版的论文集《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该书系美国华裔学者协会于 1983、1984 年发起举办的两届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汇编，内中诸多海外学者具体深入地探讨了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儒家伦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凡此种种，就为当代新儒学在海外的影响创造了较好的外部条件。与此同时，东亚诸国自身也加强了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与研究。

日本、韩国均有自汉唐以来吸收中国儒家文化的悠久历史，并且已发展成各自富有特色的本国儒家文化，其国民心理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儒学在学术界的受重视是众所周知的。如在韩国，儒学一直被尊为国学，影响极深，波及甚广，目前除中央有专门研究儒学的成均馆大学外，各郡县还有三百多所加强儒家伦理教育的三嘉乡校。不过，他们多注重的是具有本国特色的儒学。在当今海外，新儒学真正产生影响的还是在新加坡。

新加坡 76% 以上的人口系华人，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自然甚广。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诚如其国立大学的陈荣照所言：新加坡经济发展在动力上是西方的，在精神上是儒家的。^① 新加坡经济起飞后也出现了诸多严重的道德问题，这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意识到只有重建儒家伦理传统，才能抗拒“西方文明的侵蚀”，保证国家健康稳定的发展。于是从 1979 年 6 月起，在新加坡掀起了一场文化再生运动。内容包括礼貌运动、敬老运动、道德教育改革运动等。1980 年 2 月，政府郑重宣布《儒家伦理》为选读课程之一。为此，政府还于 1982 年特地从美国和台湾请杜维

^① 《光明日报》1994 年 10 月 7 日。

明、余英时、许烺光等八位教授来新加坡讲学和提供编写方案，以完善学校的儒家伦理课程；同时，大众传媒也广泛宣传，从而使推广儒家伦理的活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80年代以来，政府又进一步将儒家伦理上升到国家意识的高度。1988年，当时的副总理吴作栋明确指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升华为国家意识。”^①至今，儒家基本价值观已深入新加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来新加坡指导《儒家伦理》课程的美籍华人杜维明、余英时本身就是第四代新儒家的核心人物，他们的讲学与指导，就是一种最直接、最典型的当代新儒学的传播，而他们对儒学与新加坡发展关系的思考，也成为其新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杜维明的名作《今日儒家伦理——新加坡的挑战》于1984年在新加坡出版。1989年，他的《道·学·政——儒家知识分子论集》又在新加坡面世。除外来的儒学学者外，在新加坡本国也还出现了一批像陈荣照这样学识精深的儒学专家。所以，不光儒家伦理在新加坡的现实生活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学理层次的当代新儒学在新加坡学术界也有较大的势力。

不过，当代新儒学作为一门“学”来说，在海外影响最大的地方是在美国。第一代新儒家张君勱、第二代的钱穆和方东美、第三代的唐君毅等均有在美国讲学、参加学术会议乃至出版著述的经历。如张君勱晚年的新儒学巨著《新儒家思想史》，系其50—60年代旅居美国十几年期间精心著成，以英文先后于1957、1963年在美出版上下两册，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第四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四人基本都是在70—80年代崛起于美国的，新儒学是他们成名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美国自70年代以来，还有一大批学者在新儒学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就。据此，在研究和弘扬新儒学方面，美

^① 陈岳、陈翠华：《李光耀》，第109页，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

国完全可以说是大陆和港台之外的第三块基地。

论述新儒学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不能不首先提及陈荣捷，这位北美大陆的儒学拓荒人，用杜维明的话来说，这是一位通过身教、讲习、笔耕和心传，把儒家伦理的因子播种于北美的人师。^① 陈荣捷（1901—1994年），广东人，留美博士。1928年回国任教，抗战前再度赴美，自1942年起，任新罕布什尔州达特默斯学院中国哲学和文化教授，直至1966年退休。在陈赴美时，北美大陆的中国哲学研究，包括儒学研究，基本处于荒漠状态。陈第二次赴美后，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地做着儒学在北美发展的奠基性工作。首先，他将中国哲学史上各个时期重要的哲学家有代表性的著作一一译成英文，于1963年出版了英译本《中国哲学资料汇编》，厚达856页，为西方人研究中国哲学（包括新儒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影响甚大。其次，他撰写了不少中英文儒学专著，如《现有的中国的宗教的趋势》、《孔子之道》、《朱熹新论》、《朱子论集》、《王阳明与禅》等。自1960年起20年间，各种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哲学部分几乎都出自陈荣捷之手。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创办《东西方哲学》杂志，参与筹办各种有关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的学术活动等。

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东亚经济的发展，第四代新儒家在美国弘扬新儒学的努力等原因，加上陈荣捷等人所做的基础性工作，新儒学在美国的影响日益扩大，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所了解乃至认同。

大致说来，扩大当代新儒学在美国影响的队伍主要有两支。一支是第四代新儒家的杜维明、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等人。他们的经历大致相同：在台湾或香港受到大学或硕士阶段的教育，然后60—70年代在美国获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美国任教，定居美国（刘述先于1981年回香港定居）。第四代新儒家中西学

^① 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封页。

养精深，尤其在对西方当代主流哲学的理解和把握上为此前新儒家所不及，因此在中西哲学的会通上展示了更为开放的文化心态，逐渐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当代新儒学思想。成为当代新儒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他们在海外创办刊物，组织团体，筹办会议，厕身教坛，出版专著，利用各种机会，积极传播新儒学。如：成中英 1973 年创办了《中国哲学季刊》，1976 年创建了国际中国哲学会；杜维明曾在法国高等学院讲授儒家哲学课；刘述先 1985 年在新加坡主持“儒学伦理研讨会”，等等。目前，他们在海外学术界已是影响较大的一代学人。另外，他们作为第二代、第三代新儒家的门人弟子，还在各种场合中，分别对钱穆、熊十力、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等现当代新儒家的思想做了详尽的介绍、阐释和发挥（本来，他们的思想就是在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从而扩大了当代新儒学在海外的影响。

另一支队伍是一批美国学者（包括美籍华裔学者）的儒学研究。与第四代新儒家不同的是他们研究新儒学并非出于一种儒学重建的信念和精神信仰，而是一种纯学术的研究。但出于“同情式的了解”，他们的某些结论又与当代新儒家不谋而合，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部分通过著作和授课等形式，对扩大新儒学在海外的影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学者有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赫大维（Hall Davil L）、安乐哲（Ames Roger T）、艾恺（Guy S. Alitto）、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蒙罗（Donald Jacques Munro）、柯雄文（Antonio S. Cua）、张灏（美籍华人）、秦家懿（女，旅美华人）等人，其中影响最大的要属狄百瑞。狄百瑞自 1949 年起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曾先后任该校系主任、副校长和教务长，还担任过美国亚洲学会会长。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地研究和介绍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曾与其他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合开过“新儒学思想专题讲座”，有《新儒家的展开》、《理学与实学》、《道学与心学》等多种著述面世。他的思想

受新儒家钱穆与唐君毅的影响甚大，其编撰的《新儒学的展开》一书就是献给唐君毅的。鉴于狄百瑞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他多年的儒学研究和介绍工作便有力地推进了新儒学在美国的传播。在学术专著方面，墨子刻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度影响较大。该书是针对韦伯关于儒教阻碍现代工业发展的观点进行重新思考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全书共五章，其中第二章专论“唐君毅的儒家自我完成的概念”。该书1977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了美国及国际汉学界的普遍重视，美国亚洲研究学会1979年春季的年会即以此书作为讨论的主要论题。此外，艾恺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也颇值一提。该书1986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是海内外研究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的第一部专著，曾获“费正清最佳著作奖”，在美国学术界受到普遍好评。

目前，由于西方现代文化在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冲突，愈益引起了世人的焦虑和不安，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或儒家文化在海外便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引起了人们越来越浓的兴趣。1994年，在北京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担任名誉会长，韩国成均馆馆长崔根德任理事长。该会以弘扬儒学文化为己任，参加者有来自美国、德国、瑞士、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各国学者。该会的成立，既说明儒学在海外影响的扩大，反过来，也将进一步推动儒家文化在海外的的发展。同时，儒家伦理传统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觉的文化认同，这虽然与作为学问、注重本体论的新儒学的影响是两码事，但随着对儒家道德伦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同情，自然会有更多的人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对新儒学真正有所“会心”。凡此种种，加上当代海外新儒家的海外努力及其薪火相传，当代新儒学在海外传播的前景是比较乐观的。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当代新儒学能否真正在西方产生深刻的影响，主要还取决于新儒学自身能否解决理想与现实脱节的内

在矛盾、新儒家如何以更开放的姿态会通西方文化等因素。此外，新儒家们认为儒家文化将在未来世界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观点也是需要商榷的。

二、当代西方文化思潮中的“中国热”

1. 眼花缭乱的当代西方文化思潮

二战结束后，世界两极格局的尖锐对立，战后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的恢复与重建，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的明显变化。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革命为特征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出现、世界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加上世界政治力量的改变与重新组合等因素，世界局势、社会面貌急剧变动。西方世界的文化观念更是变化显著。因此，自二战至今，在西方国家，出现了领域众多、流派纷呈的种种文化思潮（此指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这些文化思潮涉及当代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政治文化思潮、经济文化思潮、科技文化思潮、艺术文化思潮、宗教文化思潮、人本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生态文化思潮、未来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等等。这些思潮或为综合性，或为专门性，或为战前思潮的发展，或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新生物。种种思潮交织一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1) 当代西方经济文化思潮

作为文化思潮的经济文化，是指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时的价值观念体系及活动方式，大体包括制度经济文化、公司企业文化、个体经济文化等三个层面。因篇幅所限，这里着重介绍制度经济文化思潮。在当代五花八门的经济学流派中，主要有三种流派令人瞩目，即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新货币主义学派和新制度学派。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后，以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标志，在西方经济学界很快出现一场“凯恩斯革命”，从40年代起，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便风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到五六十年代，这一学说经过大批经济学家修改、补充和发展，逐渐形成两大派别：新剑桥学派、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其中后者处主导地位，主要代表人物为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萨缪尔森的著作《经济学》（与诺德豪斯合著）自1948年面世以来，至1985年已出至第12版，第12版是“最彻底的一次修订”。1998年出到了第16版。该书成为战后西方世界一直最畅销、最流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且还被译成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阿拉伯文等多国文字。1970年，萨缪尔森因此而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在《经济学》前几版中，萨缪尔森将该书的理论体系称为“新古典综合学派”和“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即为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体系的混合物，其中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观念，体现为“混合经济”观念体系。“混合经济既是指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共同存在、共同发挥作用的，又是垄断资本主义与完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结合的一种经济模式”。战后西方各国所建立的经济体制，便是这种“混合经济”的充分体现。在第12版中，萨缪尔森发展了新古典综合学派，称第12版的理论体系“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它是在新古典学派的基础上，吸收当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观点形成的以总供给和总需求为支柱的宏观经济理论。该理论企图通过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互作用，说明包括滞胀在内的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波动原因，并提出消除波动的政策建议。“企图论证的是：在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下，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

场机制能导致出最理想的社会”。^①

新货币主义经济学兴起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是作为这一时期由于推行凯恩斯主义而在西方经济中普遍存在“滞胀”现象的对立而出现的。其主要内容是：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提倡经济自由，主张通过“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它信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通过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来达到均衡状态和稳定增长，而当时严重存在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等现象，是国家推行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和错误货币政策、过多干预“经济自由”的结果。新货币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于1956年、1957年相继出版《货币数量论》和《消费函数理论》两书，奠定了这个学派的理论基础，标志着货币主义学派的产生。70年代以来，这个学派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传播。1976年，弗里德曼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70年代以来，该理论在实际应用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例如：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针对国家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转而实施一套完整的货币主义政策，依靠市场经济内在的平衡功能来摆脱困境；1981年，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混合经济文化”的束缚，将货币主义政策和供应学派政策融为一体，制定了一个经济复兴计划。撒切尔和里根的实践都取得了成功，这也进一步推动了新货币主义学派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派是后旧制度学派在二战后的演变和发展，其代表人物为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迪·加尔布雷恩、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C·诺思和法国的别鲁等人。这一学派强调制度因素，认为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效率、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制度是经济问题的核心。其中产权制度是基础性

^① 《经济学》第12版中译本，译者序，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

的经济制度，产权制度的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其他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他们主张社会改革，希望通过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二元经济结构的权力均等化，从而达到“新社会主义”。这一理论虽不是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潮，但其影响正日益扩大。

(2) 当代西方政治文化思潮

在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政治文化思潮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新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新保守主义政治文化和社群主义政治文化。

新自由主义因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严重威胁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出现。它被迫放弃传统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思想，转而求助于政府的干预，以期保护社会大多数人的权利和自由。新自由主义批评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思想，强调扩大国家的职能和作用，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并以积极的行动谋求整个社会的福利。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是当前西方国家实施诸多“福利国家”政策的行动指南。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 H·拉斯基（1893—1950 年）和约翰·M·凯恩斯（1883—1946 年），美国的 J·K·加尔布雷思（1908— ）和约翰·罗尔斯（1921— ）等人。其中以罗尔斯的影响为最，其代表作是 1971 年出版的《正义论》。此书一出，很快被誉为“二次大战后伦理学、政治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理论著作”，不但在美国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在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也激起了热烈的反响，有人甚至认为英美政治哲学因此而步入了“罗尔斯时代”。在该书中，作者提出著名的有关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是社会和经济安排的机会均等和“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①

^① 何怀宏等译：《正义论》，第 56、7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政治思想上的保守主义主要是强调尊重历史和传统，主张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不赞成对现实社会进行重大变革。其创始人为英国的柏克（1729—1797年）。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经济的萧条和自由主义经济干预政策的衰弱，在传统保守主义和传统自由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保守主义逐渐兴起。其主要理论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反对政府的集权，主张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主张恢复市场经济，回到传统的自由主义。其代表人物海克认为，社会进步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它所遵循的规则系统是进化而非设计的产物，而这种进化的过程乃是一种竞争和试错的过程，任何社会中盛行的传统和规则系统都是这一进化过程的结果。^①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弗里德里希·冯·海克（1899—1992年）、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 ）和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年）等人。目前，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主导作用正日益增强，在英国，连公认最保守的撒切尔夫人也自称是哈耶克的信徒。

80年代以来，由于当代西方社会国家能力的进一步弱化、新旧社群的交替、70年代兴起的人权运动进一步发展等因素，社群主义开始崛起。其代表人物为美国的迈克尔·桑德尔、阿拉斯太·麦金太尔、查里斯·泰勒等人。社群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强调人们的公益优先于正义即优先于个人权利，强调社群对自我和个人的优先性，倡导从“权利政治”转向“公益政治”。其社会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新出现的人权运动与社群运动等均与社群主义不无关系。当代西方诸多政治家对社群主义十分重视，如德国总理科尔和社会民主党领袖沙尔平在大选期间，曾分别约见社群运动的主要代表；美国参议员更是认为社群运动对未来政治的影响将如一个世纪以前进化论对

^① 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译序，第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美国的影响一样。^①有人说,8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题是社群主义者的社群,90年代正义和社群同时成为政治哲学的主题,可见社群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影响。

(3) 当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

现代西方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和精神世界空虚形成的明显反差,引发了人们对人生的意义、价值、人的本性、本质等问题的重新思考,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怀疑和反叛便成了现代以来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主导倾向。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克尔凯廓尔等人是这一思潮的先导人物。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荣格、弗洛姆等为当代的代表。在当代西方,对人们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及新弗洛伊德主义学说。

让·保尔·萨特(1905—1980年),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他一生写下了大量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作品,为法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其主要哲学著作有《存在与虚无》(1943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1946年)、《辩证理性批判》(1959年)。萨特考察人的问题的出发点是著名的“存在先于本质”观,即“首先是人存在、露面、出场,然后才说明自身”。其主旨是“自由”。“人就是自由”,人的存在和自由是一回事,因而,人就具有自我选择的主观性。在萨特看来,只有自由选择才是人的价值的惟一的基础。在自由的基础上,萨特还认为人具有烦恼、孤寂和绝望的特性。存在主义虽然创始于丹麦的克尔凯廓尔,但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在西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却要归功于萨特。二战结束不久,首先在法国,然后波及整个欧美,掀起了一股“萨特热”,萨特关于存在主义的演讲备受欢迎,其著作和思想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并深入人心。60年代在欧美,由于人们生活没有保障、精神空虚、行动不自由而出现的一系列

^① 俞可平:《社群主义》,第124、1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反主流文化运动如欧洲大学生运动、嬉皮士运动等，均与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在1968年波及整个欧洲的“五月风暴”中，运动的主角公开打出了萨特的旗号。1980年4月，萨特在巴黎逝世，世界各国反响强烈，重新掀起了一股“萨特热”，直到80年代后期，这股波及世界的热潮才慢慢冷却下来。

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想中，对人们影响最大的恐怕要属精神分析学说。其创始人为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年），他试图通过对精神病人的临床分析研究来揭示人的本质特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弗洛伊德将人的精神世界分为三个系统，即无意识系统、前意识系统和意识系统。认为无意识系统隐藏在心理活动深处，不受意识的支配而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与此相应，弗洛伊德创立了一套与人类创造性活动有关的生理能量理论即里比多理论，认为性本能是里比多的核心，是一切原动力之源。在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中，他进一步建立起了一套人格结构理论即个体的人格或个性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组成。精神分析学说提出了以往心理学不曾注意到的最隐蔽心理现象和精神活动规律，加深了人们对人的本质的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完成了由精神病理学向人的理论的过渡。精神分析学说出现后，很快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人类学、伦理学、社会学、文化学、宗教学、文学的研究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直接体现在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至今影响不绝。仅在美国，自1920年至80年代中期，就出版了二百多部论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著作。

不过，弗氏精神分析学泛性论的缺陷也是明显的。早在本世纪初，就有人对他的学说提出批评和修正。这种修正到本世纪60年代，发展成为种种“新弗洛伊德主义”学派。在当代，主要有C·荣格的“分析心理学”、E·弗罗姆的“心理文化弗洛伊德主义”、赖希和马尔库塞等人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弗罗姆），等等。瑞士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荣格（1875—

1961年)认为,性本能不是里比多的惟一内容,“集体无意识”才是创造力的来源,是性格形成的基础,一切社会文化现象都能用“集体无意识”来解释。因而他将弗氏的人格三结构发展成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个层次。弗罗姆(1900—1980年)认为,在个体人格形成过程中,个体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条件才起决定作用。二战后,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给人们带来了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但自由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是“异化、焦虑、孤独、深深的恐惧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产生了“逃避自由”的念头。只有推广一种高尚而广泛的“爱的艺术”,才能建立起一个“健全的社会”。弗罗姆的新弗洛伊德主义在当代美国处于支配地位,影响甚大,其成名作《逃避自由》1941年在纽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轰动,至1980年,在美国已再版17次。以威廉·赖希(1897—1957年)和H·马尔库塞(1898—1979年)为代表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于50年代中期,主要是以精神分析理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诊治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病的“灵单妙方”。在赖希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备受性的压抑,得不到性的快乐,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性革命”作为补充,以获得精神上的真正解放。在60年代西方青年兴起的“性解放运动”中,赖希被奉为时代的先驱。马尔库塞则对现代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人被异化、工具化,由具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双而人”,变成了仅受物质欲望支配的“单而人”;认为文明的进步都是建立在压抑本能欲望的基础上实现的,随着现代物质和技术的进步,对性的压抑已成为多余,满足爱欲才是幸福的,爱欲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因此,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不是人的真正解放,人的解放还得继续前进;主张“意识革命”、“本能革命”、“性欲革命”,提倡“个体性的暴乱”。马尔库塞的思想在60—70年代的西方相当盛行,被称为“反文化”的代言人、新左派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被誉为威震西方资本

主义世界的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之一。总的来看，新弗洛伊德主义不但是60年代以来西方一系列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行动指南，而且对当代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的创作，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4）当代西方未来主义文化思潮

二战以来，西方社会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一切，促使人们去反思社会的现状，去思考人类未来的前途、命运，去设计未来发展的理性方案。60年代以来，各种谈论未来命运的专著和刊物在西方纷纷问世，形成一股“未来热”，这股热潮延续至今，并引起了世界的普遍重视。

未来文化思潮在近四十年发展过程中，核心内容有一条明显的变化轨迹，“即由以经济发展和随后以技术发展为重点，转向以人和文化发展为重点”。^①60年代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提出解决办法和设想，预测今后发展趋势。70年代则将重点转向探讨科技的发展，出现了悲观和乐观两种对立态度。70年代末至今，进入制订以人和文化为核心的综合发展模式新阶段。^②未来文化思潮流派众多，各流派之间又往往互动和互补，各流派之间很难加以严格的区分，但在对未来发展态度上，明显存在悲观主义派和乐观主义派的对立，两派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悲观主义派的代表主要是罗马俱乐部的成员。罗马俱乐部是1968年由世界著名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组成的世界性组织，代表人物有贝切伊、米都斯、亚历山大·金等人。1972年，由米都斯等人编写的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集中体现了其悲观主义倾向。该报告从人口爆炸、资源危

^① 周绍珩：《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第22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第220—223页。

机、生态失调、环境污染、军备竞赛、东西对抗和南北悬殊、社会邪恶等方面来阐述全球问题，结论是如果让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依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将在今后一百年中达到增长的极限，并出现零增长和负增长，这将是全球危机的来临，前景十分可怕，令人悲观。该报告出版后被译成34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并同1974年由梅萨罗维奇等人编写的第二个报告《人类处在转折点上》一起被列入第31届联合国大会文件，影响深远。为解决全球问题，罗马俱乐部提出，要从改造传统价值观和提高人的素质上着手。在罗马俱乐部看来，那种相信科技作用万能和能量无限的错误观念，是导致全球问题的一个关键原因。这种科技悲观思想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其中从理论上比较深刻、比较系统阐述这一思想的是杰里·米里夫金和特德·霍华德合著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1981年）。熵是不能再被转化作功的能量的总和的测定单位。作者声称，今后统治人类各方面的将是熵的定律，熵值的趋向告诉人们，人类科技的迅速发展正在加快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能源、总量不变的能量。因此，人们只有以熵规律作为新的世界观，来考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才能减慢熵的增长和延缓地球走向宁静“热寂”状态的速度。该书的问世，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普遍震惊。同年，美国政府发表了对前景抱悲观情绪的《2000年世界情况报告》。悲观主义派虽然在各方面的批评下不断修正、补充自己的观点，但悲观基调没有根本改变。悲观主义派在90年代仍有较大的影响，尤其在美国发表和出版了系列文章和著作，1995年美国《外交季刊》称这一现象为“新悲观主义”。在众多的著作中，布热津斯基的《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1993年出版）、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1993年发表）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7年出版）在国际上反响甚大。在《失去控制》一书中，作者认为世界已陷入了“全面的精神危机”，这一危机是由无限追求消费

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的美国造成的。在分析和预测了美国和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极不乐观的状况后，指出“未来的世界秩序的特点将是强权政治、民族对抗和种族关系的紧张”，甚至有可能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世界前景黯淡。在作者看来，只有使全球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根本改变，才能扭转这一局面。^① 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今后全球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而“亚洲文明”正日益兴盛，“西方文明”却正在衰落，故对所谓“亚洲文明”（主要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进攻下的“西方文明”的未来忧心忡忡。呼吁西方各国坚守北大西洋公约，以维持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这一思想在全球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乐观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的卡恩、朱利安·林肯·西蒙、阿尔温·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丹尼尔·贝尔等人，《未来的预测》、《最后的资源》、《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分别为其代表作。他们坚信科技的发展，能给未来和全球问题的解决带来光明的前途。奈斯比特认为未来新的财富是技术知识，而知识“不适用于守恒定律”，“最重要的是它有合作增强的作用”。^② 《未来的预测》、《最后的资源》两书都集中对《增长的极限》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逐一批判和回应。在未来的发展措施上，他们强调科技力量的作用，将未来社会称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电子技术社会”等，强调发挥资本主义传统文化的种种优势，以增长文化为核心，建立通向未来的新文化模式。

乐观主义派从70年代后期开始占主导地位，在美国形成了技术统治论思潮，并进而深深影响到整个西方世界。这一思潮发

^① 参见李慎之：《二十一世纪的忧患》，《读书》1996年第4期。

^② 梅艳译：《大趋势》，第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展到 90 年代，便是“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在今天，知识经济正开始替代工业经济”。^① 美国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在 90 年代初的崛起，是知识经济开始形成的标志。“知识经济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② 这是一种以知识创新的速度、方向决定成败的经济，它预示着信息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的主流。在当今世界，软件知识产业的勃兴使知识经济初具框架，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便是 5000 家软件公司。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已是人们的共识，如何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今西方各国政府均高度重视知识经济的研究与开发，美国总统克林顿称，知识经济是美国打开未来世界大门的钥匙。因此有关“知识经济”及其时代、社会诸特征的文章和著作不胜枚举。可以说，“知识经济”成了当今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5)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一种风靡欧美、遍及所有人文学科领域的文化思潮。“正式出现是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前期。其声势夺人并震慑思想界是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这一阶段，在欧美学术界引起一场世界性的大师级之间的‘后现代主义论战’。到了 90 年代初，后现代主义开始表现出狂躁以后的疲惫，声势大减”。^③ 它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种种弊端的情况下，对现代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反叛，是上帝死了、人死了之后的再思。它兴起于美国和法国，很快波及西方其他国家乃至影响整个世界，最先出现在艺术和文学领域，然后遍达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法

① 杨福家：《谈谈“知识经济”》，《人民日报》1997 年 12 月 18 日。

② 惠永正：《知识经济与科教兴国》，《人民日报》1998 年 3 月 31 日。

③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第 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学、美学和教育学等诸领域。各领域代表人物众多,^①“当代一流思想家几乎无一能置身于这一思潮之外”,在70—80年代这一思潮最热的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伽达默尔、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科、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罗蒂、利奥塔、杰姆逊、哈桑和斯潘诺斯等人。这一思潮因其领域广泛、人物众多、异见纷呈、层次不一而具有“极其丰富、复杂的思想 and 理论内涵”,难以加以清晰的描述。大致说来,其理论特征是反中心论、反二元论、反体系性、反整体性、反二分化、反机械化和实利主义,强调否定性、不确定性、多元性等,其文化逻辑“体现在哲学上,是‘元话语’的失效和中心性、同一性的消失;体现在美学上则是传统美学趣味和深度的消失,走上没有深度、没有历史感的平而,从而导致‘表征紊乱’;体现在文艺上则表现为精神维度的消失,本能成为一切,人的冷漠的纯客观的写作成为后现代的标志;体现在宗教上,则是关注焦虑、绝望、自杀一类课题,以走向‘新宗教’来挽救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信仰危机”。^②

后现代主义注重于对现代主义进行“解构”的同时,还有其建设性的一面,尤其在经过一阵阵“喧嚣”之后,80年代后期以来,由格里芬等人倡导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新趋向。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倡导对世界的关心和爱护,如格里芬认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精神有三大特征:一是强调个人与他人和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constitutive)”。二是信奉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有机主义”,在时间上注重与过去、未来的关系。三是走向重建男女平等关系的后父权

^① 参见《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第17、18页。

^② 《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第19页。

制社会。^①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精神是重构主义的、乐观的、合乎规范的。它不是要抛弃现代主义的积极的一面，而是试图取代其消极的一面。意味着要吸收现代性的优点和缺点”，是对现代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后现代可能意味着人类将有能力摆脱当今世界的暴力、贫穷、生态恶化、压迫和非正义现象”，^②或者说是寻求现代性的现代化。

(6) 多元文化主义思潮

这是一股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在美国开始流行、并在世界多极化格局的背景下不胫而走、内涵日益丰富的世界性文化思潮。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包括：激进的白人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主义者。他们主张文化生而平等，否定价值体系的优越感，抨击美国主流文化即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的男性主体文化的价值体系，以服务于美国的弱势集团。他们要求在大学不再开设单一教授西方文明的课程，要平等对待一切少数民族的母文化，不准在种族、性别、性爱及审美标准等方面歧视弱者，不能以英语作为惟一法定的语言，主张宗教信仰多元化，等等。这些主张和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并在许多地方得以实施。文化多元主义在美国之所以流行，首先是美国自由主义理论的支持，它已发展到不容许人们有任何种族歧视、宗教歧视、语言歧视、性别歧视的公开表现，其次是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即 60 年代反主流文化的青年造反者已成为今日社会的中坚，拉美裔人、黑人、亚裔人等非白色人种的人口数在美国日益上涨，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的自我意识增强，等等。这种美国国内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流行，有力地推动着国际文化多元主义思潮的形成。冷战结束时，在国际上出现了非西方文

^① 详见〔美〕大卫·雷·格里芬编、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第 21—27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后现代精神》，第 125 页。

明国家寻求本土化和非西方化的追求，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功，充分证明了现代化等于西化观的错误，“西方中心论”已经过时。世界多极化格局出现后，人们更是充分认识到世界各国只有相互尊重才能共同发展。文化多元主义成为世人的共识。1993年以来，美国的政治理论家亨廷顿所宣扬的“文明冲突论”，虽出于维护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目的，但将世界文明分为七大或八大文明，认为世界不存在普世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每一种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处”的想法却不无道理，广为人知，并成为世界文化多元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当代文化多元主义思潮虽难举出公认的代表人物，其内部层次也较复杂，但其在世界上的广泛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种类繁多，这里难以尽述，仅略述数种如上。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视角不同，对思潮种类的划分也不一样，加上思潮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各思潮之间常常相互包容，而并非截然可分。

2.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基本特征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领域广阔，流派众多而瞬息万变，对其从整体上做一较清晰的把握，显然并非易事。不过，若从当代西方的文化发展和社会变动着手，将西方文化发展和社会变化的历史与现实做一纵向对比，将东西方文化面貌的不同特点做一横向考察，同时，对多彩多姿的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本身做一大致的分析和归纳，我们仍可发现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征，即多维视野性、交叉综合性、非理性主义性、现实批判性、关注未来性，等等。

多维视野性。多维视野性首先体现为在当代文化思潮的涉及面上全而宏阔，此起彼伏，纷纭繁盛。举凡政治、经济、科学、思想、文艺、宗教、文化等各学科均有思潮出现，涉及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过去与现实、现实与未来诸关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些是以往思潮的时代发展，如：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文化结构学派、文化符号学派；有些则是时代发展的新生物（指作为一种思潮），如：社群主义思潮、生态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未来主义思潮。其次体现在各思潮内部学派林立，观点各异，对立明显，如：进化派与反进化派、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科技决定论与反科技决定论、乐观主义派与悲观主义派、生态保护派与经济增长派，等等。这种多维视野的特征，既是资本主义精神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开拓性的充分体现，也是解决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种种新形势、面临的种种新问题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现代科学愈来愈细的社会分工，当代新学科的出现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观察问题的视角。

交叉综合性。随着当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联系愈益密切，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愈益复杂，这就需要解决现实问题时，一方面各领域的理论和方法须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另一方面须着眼全局，综合考虑。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正体现了这一交叉综合性。各思潮之间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切相关。如：经济思潮、政治思潮均须认真考虑生态思潮中的种种生态因素；对多元性的重视为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共同理论特征；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即是新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又是政治上新保守主义的代表；萨特的存在主义既属于当代人本主义思潮的范畴，亦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的理论支撑。至于综合性，在科技思潮、后现代思潮、未来思潮诸思潮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科技思潮涉及理论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资源学等方面；后现代思潮则涉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未来思潮是对未来社会的全面预测和理想设计，举凡科技、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伦理道德、文化素质、生态环境、传统与现代、战争

与和平等无不研究。文化思潮的这种交叉综合性，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本世纪以来科学由分工走向综合的社会表现。

非理性主义性。理性主义本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一切情欲、本能和爱憎都应受理性的支配，人们深信只有对知识、民主、科学、道德规范的追求才能带来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当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随着物质文明巨大进步而来的却是道德文明的普遍堕落，并出现饥饿、失业、精神压抑等系列社会问题，因而对现代理性主义的反叛便成为现当代西方思潮的一个重要趋向，非理性主义成了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主流。尼采是非理性主义的“始作俑者”，他在世纪之交所宣扬的“权力意志”、“超人哲学”至今影响不衰。当代西方的文化符号学派、人本主义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文艺思潮等均表现了明显的非理性主义性。如：怀特的文化符号理论认为文化是不可驾驭的力量，现代人的文化系统的运动趋势是把地球变成不毛之地，体现了文化宿命论倾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当代反理性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正统弗洛伊德也罢，新弗洛伊德主义也罢，其理论基点都是非理性主义的，即强调人类创造力的源泉为本能的冲动；在当代，“在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领域里的超现实主义，以及后来的象征派、未来派、表现派、意识流、荒诞剧，都是沿着反理性主义方向发展而来”；^① 在存在主义戏剧中，几乎没有塑造什么人物的正面形象，而多是以懦夫、叛徒、色情狂、同性恋者、杀人犯身份出现的卑鄙下流、自私自利、悲观厌世和精神变态的角色；60年代，在西方影响甚大的系列反主流文化运动，如欧洲大学生运动、性革命运动、嬉皮士运动均是反理性主义的实践表现，其思想来源既有弗洛伊德主义和赖希的“性革命”的深刻影响，亦与萨特存在

^①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第28—29页。

主义的“行动哲学”不无关系；反二元论、反中心论、反体系性的后现代主义更是明确主张对现代理性主义进行“解构”。不过非理性主义的主流性并不意味着理性主义在当代没有影响，非理性主义一直受到理性主义的反击和批判，90年代以来，在非理性主义的“热闹”和“喧嚣”之后，理性主义又开始占主导地位。

现实批判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时代思潮既是现实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产物，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舆论导向。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正是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内在矛盾、危机中产生的，对西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便成为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题中应有之义。“后工业社会之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充分展示了现代西方文化一味追求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庸俗主义的种种表现，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弊端，都与经济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形式和准则，同现已成为文化中心的自我准则之间的分裂有关，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未来主义的悲观主义派正是依据战争、技术、物质增长的诸多反文化倾向，得出西方文明衰落的结论，从而对未来充满悲观情绪。布热津斯基在《失去控制》一书中，列举了当前美国社会中存在的20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医疗、教育和贫困、暴力、精神空虚等方方面面，指出“美国显然需要花一段时间，在哲学上进行反省和文化上作自我批判”。即便是乐观主义派的卡恩，也认真地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流行的社会病及其所带来的破坏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严重后果。在文艺作品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屡见不鲜，如存在主义戏剧常用辛辣的讽刺揭露现实社会中一切非正义行为及应被取缔的弊端，例如《恭顺的妓女》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种族主义的血腥罪恶和人权自由的虚伪性，《禁闭》使人联想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可怕情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是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批判，认为：在经济

上，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已是发达的工业社会，但这种发达是通过不合理方式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存在着两极分化的不合理、不道德的社会，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仍然存在，并以“合法危机”（哈贝马斯）的形式出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各个领域，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在政治思想上，当代资本主义“技术理性主义”的统治使人全面异化，成为“单面人”，当代资本主义便成为没有反对派的新型极权社会（马尔库塞），当代资本主义民主成为一种新型的虚伪民主，在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原则支配下，人们的精神生活异常空虚。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普遍对西方社会现状进行的揭露与批判，充分暴露了当代西方社会种种矛盾的严重性，有助于我们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全面了解和认识。尽管西方学者们分析现状时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所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我们不一定赞同。

关注全球未来性。在当代，不光西方社会自身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全球范围内人口爆炸、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贫困饥饿、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等问题也日益严重，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又正日益连接成一个整体的“地球村”、“经济村”，这就使得当代西方文化思潮不光关注未来，也着眼于全球。宗教思潮、生态思潮、未来思潮、多元文化思潮等都明显体现了这一点。1993年9月，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宗教及非宗教组织的代表6500人，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世界宗教议会，通过了创始性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提出了一种世界诸宗教现有的最低限度的共有的全球伦理，希望“邀请所有人，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一起来把这种伦理化为自己的道德，并且按照这种伦理去行动”，^① 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这次行动由西方宗教界酝酿发起，“宣言”亦由德国神学家孔汉思起草，体现了当代西方宗教思潮

^① [德] 孔汉思、库舍尔编、何光沪译：《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原序，第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关注全球未来的新趋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马俱乐部的贡献，俱乐部成员怀着关心全球人类发展的强烈使命感，进行了大量扎实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十几个有关全球问题的报告，对全球未来做了种种预测，提出了种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同时对人类提出种种警告，在国际上引起了普遍的关注。随着国际一体化趋势的增强，可以想见，西方思潮也将越来越重视全球性的未来问题。

3.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与中国的“文化热”

从五四到解放前夕，文化问题、东西文化问题的探讨在学术界、知识界一直是颇为热闹的，还出现过黄文山、陈序经等一批文化学理论研究的大家。解放后，由于两大意识形态领域的原因，文化学的研究陡然冷却下来，尤其从5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学和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作为一门学科被正式取消后，文化研究几乎完全中断，“文化”、“文化学”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成了十分陌生的字眼。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在短短的30年后即80年代以来，因种种时代的因缘际会，被遗忘的东西又被人们重新拾起，“文化”又开始成为热门的话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并很快形成了全国范围内文化研究的滚滚热潮。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这股热潮更是盛况空前，而且从8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至今不衰。

近二十年来，这股前所未有的“文化热”在内容上表现为：

一是西方文化学理论和各种文化思潮的大量引进。一方面知识界纷纷撰文介绍西方文化学的历史、文化理论的流派、各种文化思潮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西方各文化学理论、各文化思潮代表人物的代表作被大量翻译出版。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等人的著作广为人知，不少著作还出现了多种译本，如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弗洛姆的《自为的人》等在80年代就至少有两种以上的译本。80年代中后期可以说是西方文化著作的翻译出版热，一个明显的表现是翻

译西方原作的文化丛书纷纷面世，如北京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文化新视野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较文化丛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国际文化系列丛书”、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宗教与世界丛书”，等等，蔚为壮观，内容涉及西方各种文化理论文化思想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旧中国诸多有关文化研究的著作也被重新影印出版。9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著作的翻译热尽管有所降温，但每年仍有许多西方译作问世，且持续而稳定，并紧跟当今西方时代的步伐。

二是文化研究逐步深化和文化研究范畴的扩大。如果说“文化热”在80年代的学术界主要是侧重对西方文化进行介绍的话，那么在热闹非凡的介绍热后，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知识界开始以较为冷静的态度从事扎实的文化研究，有关文化研究的专著如《文化哲学》、《文化学》、《文化学概论》陆续面世，并体现了一定的深度。其中，司马云杰一人就出版了《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文化主体论》等“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反响良好。西方文化思潮各领域也都有一批研究成果出现，如王一川的《后现代文化研究》、车铭洲等人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同时涌现了一批专项研究专家，如海德格尔专家、弗洛伊德专家、马尔库塞专家、罗尔斯专家等。在“文化热”中，文化研究不再限于文化理论的抽象探讨，各个学科“都力图在文化学的研究上寻找出路，把文化取向作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生长点和方法原则”，从而出现了政治、经济、哲学、科技等各具体学科的文化研究热潮。文化一度成了各学科最前沿的话题。

三是文化研究从知识理论界走向民间和日常社会生活。在学术界文化研究热的氛围中，种种日常社会生活现象也被人们冠以“文化”的名目，喜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谈论，出现了诸如家庭文化、企业文化、公司文化、广告文化、消费文化、饮食文化、青年文化、老年文化、旅游文化、校园文化、鬼文化等五

花八门的文化科目，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里的文化概念虽与学术上的文化概念相去甚远，但这些文化在人们的口中几乎无处不在，争相探讨，曾几何时，“文化”字眼满天飞，几有泛滥成灾之势。

“文化热”还表现为在组织上，文化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室、文化学会等各级文化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研究还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关注和大力支持，各省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专题调研活动，提出了诸多文化发展规划。在传播渠道上，各高等院校纷纷增设文化学、文化史等文化课程；出版社也十分重视各种文化书籍的出版；广播电视、报刊杂志都注重加强各种文化思想的传播内容，一些专门的文化报刊次第出现。

20年来的“文化热”，在总体上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大致说来，80年代为“西方文化热”，90年代为“传统文化热”或“国学热”。但这并不意味着80年代不管传统文化，90年代忽视西方文化。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在80年代，当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进时，人们纷纷借用西方的文化理论武器来批判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主要是揭露其消极面，以至一时出现了种种民族虚无主义论调，学习西方文化成为80年代“文化热”的主流；至90年代，知识界则转而重视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在寻求本土现代化模式的世界潮流下，强调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传统文化便成为90年代“文化热”关注的基点和焦点。同时，继续大量引进西方文化，而且在80年代的西方文化热过后，90年代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心态较为平静，态度较为理性。总的来看，无论是“传统文化热”还是“西方文化热”，其目的都是为了重建中国现代文化。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出现的这种“文化热”是历史、社会、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是对十年“文革”的深刻反思，“文革”中整个社会混乱无序的状态，人的灵魂的扭曲、对人性的种种摧残、物质生活的贫困、精神生活的贫乏等非正常现象，促使人们对意识形态领域僵化的教条主义模式进行痛苦的反思，而渴望一种理性、健康、丰富多彩的新文化。

其次是改革开放时代的迫切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诸多新现象、新问题，这必然要求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动准则等发生相应的转变，而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动准则正是文化的核心内容。因此，文化理论、文化建设自然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和重心所在。

第三是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如果说前两个原因只是提出了问题的话，当代西方丰富多彩的文化思潮则不但直接为中国的“文化热”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文化建设的有益启示，而且向中国的文化建设提出了挑战，从而加深了中国人的文化危机意识。当代西方，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来，也可以说是“文化热”的时代，文化研究成为西方学术理论研究极为重要的内容，文化思潮此起彼伏，流派纷呈，广泛影响到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80年代，文化问题更是成为西方世界普遍关注的中心课题，日本官方甚至声称，80年代的日本为文化的时代，文化立国论成为日本经济、政治发展和占领世界市场战略的理论指导。这股西方世界的“文化热”给中国的“文化热”带来了直接的影响。改革开放的中国只有努力吸收当代世界一切积极的文化成果，才能缩小差距，顺应世界的发展潮流，避免落伍的危险。西方文化的丰富成果、西方“文化热”的直接影响和中国文化建设的迫切要求聚在一起，共同促成了中国80年代的“文化热”或者说“西方文化热”。

80年代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显得极为迫切，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该丛书主要介绍现

当代西方各领域的文化成果，从1984年到1987年，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内就出版了60种之多。在80年代，西方文化理论的译作颇为畅销，研读西方文化理论的热潮日甚一日。有人概括说，80年代初是存在主义热和西方早期人本主义热，80年代中期是西方技术文化和未来主义热，80年代后期是弗洛伊德和尼采主义热，而中西比较文化研究贯穿十余年文化热的始终。从这里可以看出，吸收西方文化的热点与当代西方的文化思潮并不同步，由于中国走的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道路及特殊的国情，西方早期和现代的文化思潮一度备受青睐，可以说，80年代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是颇为全面的。尽管如此，当代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毕竟紧贴时代的步伐，故在80年代大都被介绍进来，而且理所当然的成为“西方文化热”的主流。

90年代“文化热”依然深受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方面继续深化此前对西方文化思潮的吸收，另一方面及时引进当代西方的新思潮，如近几年才在西方兴起的知识经济思潮也很快在国内盛极一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出现的“传统文化热”，虽有国内社会发展的特殊背景，亦与国际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不无关系。在文化理论上，也喜用西方文化相对论如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文化历史学派如汤因比的文明类型说等西方文化理论来作为“国学热”的立论依据。

总的来看，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既是近二十余年中国“文化热”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中国“文化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明显特点。中国的“西方文化热”对当今中国文化建设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顺应了改革开放对文化的迫切需求，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了新时期人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的革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由于中、西世界毕竟处在不同的发展时代，并非一切当代西方思潮都能适用于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加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本身具有的一些痼疾，还有些文化思想在西方本身

就受到批判，这就使得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在全面涌进中国后，也产生了一些明显的消极影响，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的对策。

4.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由于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避之犹恐不及，更谈不上传播了。虽然在学术界，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时有零星译介，但多是作为批判的靶子来利用的，也说不上有何真正的影响。改革开放后尤其 80 年代以来，这一不正常的局面才得以根本改变，随着经济开放而来的必然是文化的开放，在国人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中，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了进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因之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理所当然地在传播中占有重要位置，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近二十年来的文化输入中，基本上可以说，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在国内都有比较全面的介绍和译述。当然，各思潮的传播并不是平衡进行的，由于现实社会变化巨大，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学习和研究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热点，如先后有存在主义热、科技文化和未来主义热、弗洛伊德主义热、后现代文化热和知识经济热等。热点的出现，增添了各思潮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而传播的途径又是多种多样的，兹从出版发行尤其是译述的角度，就上述各思潮在国内的传播情况略作介绍，以见当代西方思潮在中国传播之一斑。

国内对当代存在主义的介绍，主要集中于萨特和海德格尔。萨特是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其著作在 50 年代开始传入我国，但影响甚微。1980 年萨特在巴黎去世，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萨特热”，我国的“萨特热”也相应兴起，国内报刊纷纷发表关于萨特著作、文章、生平、活动的评介文章，国内研究萨特的几部专著或专集也很快出版。在译作方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

版了美国 A·丹图的《萨特》，萨特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还出现两个译本（北京三联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存在主义即人道主义》和自传《词语》也有译名各异的两种译本，其他如《自我的超越性》、《想象》等都有中译本；文学作品方面，翻译出版的《萨特戏剧集》几乎包括了他的全部戏剧作品，其小说也多有译作面世。随着译作的大量出现，学术界评介和研究萨特及其思想的论著也空前增多，并在理论界引发了一场关于萨特存在主义价值观的大讨论，使其思想不但在学术界同时在社会公众中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90年代，萨特思想仍受重视，1998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萨特文集》，内收此前没有翻译的萨特后期重要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上下卷。90年代，学术界对存在主义的关注从萨特转向“存在主义的祖师爷”海德格尔。80年代海氏及有关海氏的著作已多有译述，英人乔治·斯坦纳的《海德格尔》还由湖南人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出版，海氏的巨著《存在与时间》也有两个译本（北京三联、上海译文），90年代除重印以前的译本外，又增出了不少译作如《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尤其是孙周兴选编的两巨册《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洋洋百万余言，为“海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文本。与此同时，国内研究“海学”的论著也开始越来越多。

当代西方的科技思潮和未来主义思潮主要是在80年代中期得到广泛传播的。这一时期，西方70年代以来的科技理论、科学哲学的代表作纷纷被翻译出版，如：普利高津等人的《从无序到有序》，里夫金等人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均上海译文出版社），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证明与反驳》（均上海译文出版社）、《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合著，华夏出版社），波普尔的《客观知识》、《猜想与反驳》（均上海译文出版社）、《科学知识进化论》（北京三联书店），库恩·贝拉的《科学的革命结构》（北京三联书店）等均风行一时，其中《熵：一种新的世

界观》第一版就发行 10 万册，为“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之冠，可见影响之大。上述译作基本都于 1987 年前后出版。科技思潮本为未来思潮的重要理论基础，但未来思潮译作在国内的面世似乎要早一些，从 1983 年起，就开始了出版未来思潮著作的热潮。如罗马俱乐部的核心报告《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回答未来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世界的未来》（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1985 年）、反罗马俱乐部观点的《没有极限的增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甘哈曼的《第四次浪潮》（信息汇编杂志社 1985 年）、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等未来思潮的代表作纷纷出现，其中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与《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和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著作十分流行，很快重版，在读者中反响甚大。80 年代中期，国内研究西方未来思潮的著作也陆续问世，如《全球问题与“人类困境”》（徐崇温）、《走向二十一世纪》（陆象淦）等，两书（均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分别对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全球问题与“人类困境”》于 1986 年 3 月出版，到 1987 年 3 月即在一年时间内已是第三次印刷，深受欢迎。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未来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备受关注的情况。

弗洛伊德的学说，我国早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就已引进，并形成热潮。80 年代弗氏学说在国内重新引起广泛关注。弗氏本人的许多重要著作如《精神分析引论》、《梦的解析》、《性学三论》、《文明及其缺憾》、《弗洛伊德著作选》、《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弗洛伊德自传》、《少女杜拉的故事》等分别由商务、上海译文、作家、民间文艺等多家出版社陆续出版。《弗洛伊德》（湖南人民出版社）、《弗洛伊德传》（作家出版社）等中外专门介绍弗氏生平、学说的著作也面世不少。80 年代，国内陆续出版的一些西方学者的心理学史名著如《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心理学的体系与理论》（均商务印书馆版）、《现代心理学史》等对弗

氏学说都有详细介绍。中国学者撰写的《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杨清)、《西方心理学史大纲》(唐钺主编)等心理学史著作都对弗氏学说做了比较具体的介绍。80年代以来,国内评介现当代西方各种思潮的著作也都将弗氏学说作为重要内容。如《现代西方时代精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冲击与思考》(湖北人民出版社)、《当代西方文化思潮》(辽宁人民出版社)、《当代西方思潮评介》(北京大学出版社)、《现代西方文化思潮鉴评》(当代中国出版社)等均专章重点评介弗氏学说。可以说,弗氏学说成了谈论当代西方思潮研究离不开的话题。在80年代后期,“弗洛伊德的书以及评介他的书一出版,很快抢购一空”。^①90年代以来,弗氏著作多有重印。1997年,江西百花州文艺出版社集中新版了《精神分析引论》、《梦的解析》等弗氏几部重要的精神分析著作。尤其1998年,长春出版社出版了由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洋洋五大册,共280多万字,由数十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完成,内中收集了弗氏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当代西方新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在国内也很受欢迎,特别是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著作出版较多。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都有两个以上的译本,如后者就有上海译文、湖南人民(译为《单面人》)、重庆出版社三个译本。弗洛姆的著作同样为多家出版社青睐,其中《逃避自由》(或译《对自由的恐惧》)、《为自己的人》(或译《自为的人》)等也出现了两种译本。

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学理,在80年代中期开始被引进国内学术界。1986年,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1985年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杰姆逊在北大的学术讲演《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年后再版),198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境》。此时,在知识界的专业圈中,后现代主义有较大

^① 李步楼主编:《冲击与思考——西方思潮在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影响。1989年后，后现代主义开始成为知识界普遍关注的热点。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原著被大量翻译出版，如福科的《性史》（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至1992年已是第五次印刷）、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利奥塔尔的《后现代状态》（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福科的《知识考古学》（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詹明信（即杰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格里芬编的《后现代科学》、《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1997年版）等。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套对后现代主义代表德里达、福科等人的访谈录丛书。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版《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与此同时，国内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专著也陆续出现，如王一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996年重印）、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王治河的《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等。报刊讨论后现代主义一直是热闹非常，加上文学界余华、苏童、王朔等一批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都被视作后现代文学，后现代主义在90年代便成为一股传播广泛的热潮。

知识经济思潮的传播。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思潮，于9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兴起后，迅速波及中国，在国内出现了一股谈论知识经济的热潮。先是编译的有关“知识金童”比尔·盖茨的书籍甚为畅销，然后是各种直接论述知识经济的书大量出现，如《漫谈知识经济》、《知识经济讲座》、《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挑战》等，其中吴季松著的《知识经济——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自1998年6月面世以来，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98年10月始，由黄顺基任主编的“知识经济时代丛书”陆续出版，这是国内第一套全面论述知识经济的

丛书，包括《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思想的将来与发展》、《知识经济的测度理论与方法》、《知识经济的支柱——信息产业》等四种。国外著作被翻译出版的主要是珠海出版社的“知识经济汉译经典丛书”，亦有四种：《知识经济》、《第五代管理》、《知识的进化》、《知识管理与组织设计》。这四部著作自1996—1998年陆续在西方出版，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了西方知识经济的研究和发展水平。中译本自1998年10月面世后，很快成为畅销书。其中达尔·尼夫主编的《知识经济》和查尔斯·M·萨维奇所著《第五代管理》尤受欢迎。1998年国内出版的有关知识经济的书籍总计有数十种之多。可以想见，在今后的年代里，知识经济将进一步引起人们的兴趣。

以上所述乃就知识界的普遍热点而言，还有许多思潮虽未形成普遍性热点，但在专业领域内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如新制度经济学，从80年代中期被介绍到中国来以后，在经济学界颇受欢迎，尤其是创始人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国内更是获得广泛关注，运用这一理论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分析是理论文献越来越多，乃至“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份量，比在它的发源地美国更重”。^①

此外，有些思潮虽然没有形成传播热点，但传播工作却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从而使该思潮的传播扎实深入。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80年代以来，国内各出版社时有翻译或专著问世，其中由徐崇温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尤为系统，该丛书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已出版了27部译著、6部专著，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各代表人物的著作和西方的研究成就。

总的来看，近二十年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在国内得到了较为

^① 盛洪：“科斯教授与新制度经济学”，《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广泛、迅速、全面的传播，这固然体现了改革开放对西方文化的迫切需求，同时与新时期出版事业的繁荣发达、传播队伍的发展壮大、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等因素也是分不开的。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1987年，在全国467家出版社中，有80%的出版社参与了国外思想文化著作的出版。80年代，仅各出版社出版的国外文化丛书就高达69种，传播了大量的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此外，这一时期各类专业性、综合性报刊也大量出现，它们纷纷评介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并及时传递了西方文化思想的新动态。如《读书》杂志就紧跟国际学术界的最新文化思想动态，几乎每期都有当代西方新思想的介绍文章，《天津社会科学》还辟有“国外新思潮评介”专栏，《教学与研究》也辟有“当代西方思潮评介”等。凡此种种，都为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新时期教育事业空前发达，人们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使得积极从事、参与传播西方文化的队伍也日益扩大。特别是许许多多改革开放以来走出国门的留学生（包括已回国和未回国的），更是积极加入了传播西方文化的行列，由于他们洞悉西方文化思潮来龙去脉，了解西方文化思潮的最新动态，从而为准确、及时、全面传播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传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愈益密切，不但国内每年有大量的访问学者走出国门，而且还有诸多的西方学者被请来中国作各种短期或长期的讲演或讲学，这也或为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渠道。如1985年，杰姆逊在北大讲演的后现代主义就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5.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当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体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人们对文化的迫切需求，也使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

出现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在对当代西方文化精华和糟粕的“全面”吸收中，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明显效果，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从积极方面来看，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在政府层面上，对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有益成分的吸收和借鉴，有力地推动着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社会改革措施的发展。例如：在经济上，我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最终到市场经济的大转变，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局面，相应加快加大了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革的进度和力度；同时，出现了企业法、公司法、破产法等一系列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经济法规；在政治上，倡导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提高人民的民主参政意识，提高政治透明度，切实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在教育、科技文化上，国家提出“科教兴国”口号，对中小学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对高等教育实行了收费并轨制，努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对高科技发展和人才问题高度重视，制订了如“863”计划、百千万工程等系列高科技发展计划和人才培养计划；此外，对环境、生态问题也切实重视，等等。这些固然是改革开放的直接推动、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不应否认，当代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未来等系列文化思潮的理论、观点、趋向为我们当前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重要的启示。

在个人层面上，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引进，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活跃了人们的思想，促成了一系列合乎时代需求的新观念、新思想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一是对中西文明的理性态度。有对比才有鉴别，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大量接触，人们比较充分地认识到西方文化纷繁复杂，其中大量有益的成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宝贵财富，是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值得我们加以认真借鉴和吸收，这也是后起国家加速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同时，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局限性也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总之，人们普遍认为，中西文化互有优

劣，应平行互补，相互参照吸收，再也不能采取盲目排外或民族自大主义的态度；抽象谈论中西文化的高低没有任何意义，中国的新文化只有在对中西文化进行“综合创新”中才能产生，或者说，只有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参照下，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才是中国文化的重建之路。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文化热”的高潮中，国内曾重现了30年代曾出现过的“全盘西化”论。90年代在一片“国学热”中，又出现过“东方文化时代”的呼声。但这两种论调都受到了知识界、学术界广泛的、严厉的批驳，从而影响甚微。这充分反映了人们对中西文化的清醒认识和理性态度，这种理性态度是我们进行文化重建的基础和可靠保证。

二是个人主体意识的提高。与以往一切服从领导、服从集体的“服从主义”和一切随大流的“满足主义”不同，在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充分认识到主体创造性、个体能动性在集体、群体生活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及所体现的生活意义，切实加强了现实生活中的主体参与意识、积极态度。注意根据自身的特点去寻找能够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各种机会，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同时，大多数人也正确意识到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必须以集体主义精神为前提，摆正了自我人格、自我价值、自我理想在集体主义中的适当位置，充分肯定了主体奉献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三是民主、法制观念增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切实加强了民主法制建设，人们的民主、法制观念也相应地大大增强。人们认识到，国家只有走上民主法制的轨道才是理性、健康的发展途径。而民主法制建设又与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提高密切相关。故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方面注意处处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一方面为法制的健全大力呼吁，以体现社会的公正。人们还认识到，民主与法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政治和日常社会生活中，注意用民主程序、按民主方式处理问题，依法

办事，而对“一言堂”、“家长制”的专制作风深恶痛绝，对民主法制的推崇正式开始取代对“权威”的迷信。

四是全球和未来意识的兴起。未来思潮关注整个人类的兴衰存亡，六七十年代自西方兴起以来，一直成为西方思潮的热点。这一思潮传入中国后，曾引起人们思想的巨大震动。全球的发展和未来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并相应形成了许多新思维和新观念，诸如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时代，世界经济技术的整体化，世界政治新秩序，世界生态、环境、人口、资源问题的全球性质，增长不等于世界发展的观点，人类共有一个地球的观点，人类共有一个未来的观点，世界相互竞争和相互依赖的观点，发展超前思维重视文化战略的观点等。今天，这些已成为人们的常识。毫无疑问，这种广泛的全球和未来意识不但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且对全球未来的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丰富多样的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对当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积极影响自然远非上述简单的几个方面，这里只是列举几种以见其大概。需要说明的是，形成上述合乎时代需求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现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只是其中一个重要而非惟一的因素。

当代西方文化思想是瑕瑜互见的，它对当代中国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往往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同时，在“一窝蜂”似的输入中，当代西方文化许多消极的思想、消极的观念也涌进国内，加上我们对西方文化还存在一些片面乃至错误的理解，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当代西方文化思潮也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流行

随着人们主体意识提高而来的是个人主义思想的膨胀，个体能动性被发展到极端，自我中心成为一些人行为的出发点，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实现成为其人生的惟一目标。相反，对集体主义思想则敬而远之，甚至不以为然。1988年，某大学的问

卷调查表明，学生信奉个人主义者占41%，为其他各类人生价值观选择之冠，而对集体主义的选择却只占9%。尽管各人对个人主义的理解不同，但以个人利益为核心则是一致的。^① 与个人主义相伴随的是实用主义的流行，实用主义被庸俗理解为是否实惠、是否对自己有利、有用，实用原则成了主要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80年代后期，曾流行绿道（出国办绿卡）是少数，红道（从政做官）有出路，黄道（经商捞钱）最实惠，黑道（求学戴博士帽）无前途的说法，内中透露的正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思想。80年代、90年代的国内各路学子拼命考G（GRE）、考托（托福），数十万学子纷纷涌出国门，形成了中国留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出国热潮。这固然是难得的好事，然而也毋庸讳言，对许多公费留学生和大多数自费留学生而言，出国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日后能过上优裕的生活，求知只是迫不得已的手段而已，实用倾向十分明显。在高等教育中，金融、会计等要求相对较低短线热门专业令学子们趋之若鹜，热闹非凡；大批对学生素质要求较高的基础理论等长线专业则因不“实惠”而冷冷清清。这种严重反常现象引起了教育家们对未来科技发展的深切忧虑。在实用主义支配下，大学生中一度出现辍学经商的情况，90年代中期，还出现过北京某著名高校一中文系研究生中途退学返乡做一银行职员极端事例，为的只是目前待遇恐非日后研究生毕业所能找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风气之所在。在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原则的支配下，真、善、美的观念日渐淡化，惟我、利益、有用的思想则日趋流行。

（2）追求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

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本是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大提高，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在中国也迅速滋

^① 参见《当代西方文化思潮鉴评》，第367页。

长，并成为一些人的理想追求。这当中不无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今美国的价值观是一种无休止的追求物欲的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具有全球性的影响。美国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文化引起了其他国家人们的羡慕与追求，使他们腐化堕落。^① 80年代以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已经不在于这个人实际水平的高低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是他手中财富的多少。“有钱就是老大”，财富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一切向钱看”、讲待遇、讲报酬成了一些人社会生活中的行动准则。为了获取财富，许多人绞尽脑汁，不择手段，不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金钱面前，一些人早已寡廉鲜耻。尤其严重的是，这种拜金主义思想已渗入政府部门，一些人信奉“权力就是金钱”，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多快好省”地捞取大笔财富，因此，政府官员中贪污受贿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对财富、金钱的追求就是为了及时行乐。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表明：与强调后代和未来的幸福、快乐的人数相比，有更多的城市青年表示，人生的奋斗目标是现实个人的幸福与满足，有超过半数的青年对“人应当及时行乐”的说法予以肯定。^② 其实不光青年，整个社会都有追求一时的感官快乐、优裕的物质享受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讲排场、摆阔气、攀比风等铺张浪费的现象人们已屡见不鲜。前些年，中国的超前消费已引起了有关人士的深深忧虑。在享乐倾向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性观念的变化。在当代西方的泛性说和各种色情文化的影响下，一些人性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开放、随便。未婚同居、试婚、养情人等性自由现象日渐泛滥；色情书刊、色情影视也大有市场；尤其严重的是色情行业的泛起，等等。凡此种种，都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家庭和社会

① 李慎之：“二十一世纪的忧思”，《读书》1996年第4期。

② 张殿国：“试析享乐主义价值观”，《光明日报》1993年10月10日。

问题。

总之，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一些人心目中，惟“西”是尚，凡“西”皆好。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消极影响的出现，既有西方思潮的因素，也有时代变化的固有因素，还有封建思想复苏的影响在内。可以说，是时代、西方思潮和封建思想三者结合的产物。

6. 批判地吸收与吸收中的扬弃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是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反映。一方面，它推动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进程，在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均留下了丰富的前沿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它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消极颓废、糜烂堕落的东西，体现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限制着西方社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向。面对着这种优劣互见的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在全球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今天，任何非西方国家都是无法回避也是不能回避的。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不能因西方文化具有诸多消极面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只有尽力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文化，才能更快地缩小同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加速本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也不例外。杜绝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关起门来搞建设”，已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沉痛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速度举世瞩目，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对当代西方先进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在今天，因民族自大或因噎废食面形成的文化封闭心态已成历史陈迹。扩大对外交流，努力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已是人人皆知的社会常识。不过，如上所述，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也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所以，问题是如何吸收、引进西方文化，以更好地取其精华、去其精粕，尽量减少其消极影响（一般来说，对异质文化吸收产生

消极影响是难以避免的)。

“全盘西化”论显然是错误的。在理论上，它是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将西方文化作为惟一正确、完美的理想文化，而无视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道路而强求一律，否认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专制、文化霸权思想，自然为人们所不取。80年代中后期，在学习西方文化的高潮中，有人重提“全盘西化”论，却应者寥寥。即便在当代西方，“全盘西化”论也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抛弃。这都足以说明“全盘西化”是不得人心的。面对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正确的态度只能是：批判地吸收和吸收中的扬弃。

首先，当代西方文化思潮不管其流派如何多样，思想如何丰富，理论如何完美，但其根本出发点，都是相信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即在不触动西方根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最终能建成理性完美的社会。如：西方经济思潮期望通过“混合经济”、制度经济等理论和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虽然深刻揭露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但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经济基础、阶级结构等方面已发生变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总体革命的方式最终能走向所谓理想的社会主义，而宣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已经过时；西方科技思潮不管是悲观派，还是乐观派，都把科学技术当成资本主义社会能否良性健康发展的惟一决定性的力量。所有这些，其立论基点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是我们难以认可的。

其次，一种文化思潮、文化理论本身都是较为复杂的，往往好坏优劣交织在一起，具有两面性，并非一好百好、一坏百坏那样简单明了。这就需要在批判地吸收后，对具体的文化思潮或文化理论还要进行吸收中的扬弃工作，即根据我们的具体国情，“扬”其精华，“弃”其糟粕。比如萨特的“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奋斗”的观点，我们一方面要否定这种选择和设计的“绝对自由”性，另一方面又须充分肯定其强调个体主观能

动性的一面，这种个体主动性如能与社会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必将更完美地发挥个体的社会作用，从而也更好地体现其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又如西方科技思潮，那种认为惟有科技进步才能创造美好未来的乐观论调或抑制科技发展回归自然的悲观论调都是根本错误的，但它们对现代科技正反两方面的深刻认识却是宝贵的财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西方科技思潮的种种深刻认识才能找到理想的归宿，科技事业才能得到真正理性的发展。

再次，我们在引进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时，除必须考虑中国文化自身的民族性外，还必须注意中西社会毕竟仍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时代要求或时代趋向，因此，对西方的种种“新”思潮，我们决不能惟“新”是尚，不加分析地在国内大力推广和宣传，片面地强求“与国际接轨”，而必须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做冷静客观的分析。如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思潮的热门话题，是西方社会在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对现代性的反叛，而中国正处于现代性的发展阶段，现代性尚不完备，亟需发展，如也跟在人家后面大声呼唤后现代主义，反抗种种现代性，这不但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对国家的发展也甚为不利。当然，这并不否认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提出的诸多问题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但这与宣传提倡就是两回事了。

批判地吸收和吸收中的扬弃，不但是我们对待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原则，也是我们对待一切外来文化的原则，它还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立足本国，融会中西，“综合创造”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全新文化。

第四章 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一、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发展

1. 当代世界科技浪潮的挑战

20世纪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黄金盛世。这一时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远超越了19世纪。而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也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尤其是发端于20世纪中期，以微电子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包括生物工程、激光通讯、空间技术、海洋开发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等一系列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更引起了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因此被专家们称为新技术革命。

回顾历史，如果说在此之前，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技术革命，在19世纪中期以后把农业的中世纪转为过去200年工业文明的模式，那么20世纪的新技术革命所形成的洪流则又荡涤掉工业文明的陈旧原则。它将人类带进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科学文明的时代，具有以往技术革命所没有的全新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科学技术发展呈指数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第二，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周期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的周期越来越短，知识不断更新。第三，科技发展的综合化趋势日益加强，各个领域的科技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第四，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日益发

展。第五，科技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①

新技术革命的上述特点，使科技发展在 20 世纪成为对全球影响最显著、最深远的要素，它以生产力、威慑力、影响力、推动力等不同的表现形式，作用于经济、军事、政治乃至整个社会发展领域，从而改变了全世界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格局。

就经济领域而言，科技进步的成果运用于生产，通过采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提高生产效率，改变产业结构，提高经济系统的结构效益等途径，加速了经济增长，提高了经济效益，大大增加了社会财富的总量。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进步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据 S. Kuznets 测算，1889—1929 年，美国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的作用份额只有 33.5%，在 1929—1967 年，科技进步的作用份额达到 78%。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由于重视和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奠定了其世界科技大国和经济盟主的地位。90 年代中后期，美国克林顿政府通过对科技政策的调整，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已明显增强，有效地带动了美国出口和经济的增长。新技术革命期间，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呈高速增长趋势。最突出的例子是日本，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在 1959 年至 1980 年的短短 30 年间，增加了 20 倍之多。其关键原因就在于科技进步与战后技术转移的成功。这一时期，日本从欧美各国广泛引进了几乎全世界近半个世纪开发出来的技术，加以迅速有效地运用，到 60 年代末，日本就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后初期科技落后的被动局面，到了 80 年代，日本的科技经济综合竞争力居世界前列，成为欧美高科技竞争的主要对手。亚洲“四小龙”经济迅速发展，也与其大力引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消化创新息息相关。目前，在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份额大都超过了 50%，且呈递增趋势，而资本与劳动力的作

^① 《把握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推进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科技日报》1996 年 10 月 9 日。

用正在递减。^①正是由于技术的进步，1994年，发达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则达3%，美国达3.5%，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则达7%以上。从科技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实为科技差距。有关研究显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本质上是知识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口虽占世界的大多数，但世界上90%以上的科技投入、科技人员和科技活动却集中在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投入还赶不上发达国家的一家企业。几乎没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不得不依附发达国家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被动地位。

军事领域从来都是各国高科技开发应用的重点。以高科技为背景的现代化战争，在战略上采取以信息技术为先导、海陆空为一体的系统与系统的对抗，战术上通过电子干扰手段进行“软杀伤”，武器方面则与高科技紧密结合，大大提高其命中率、杀伤力。在此，先进的科技无疑会使一国的军事占尽主动。

新技术革命在20世纪还加剧了世界格局的不平衡发展。发达国家掌握世界80%以上的科研活动，他们抢占科技制高点，使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目前，在发达国家之间，独联体国家的科技力量虽有严重削弱，但优势尚存；美国总体上处于领先；日本、欧洲亦不甘落后，他们奋起直追，在许多领域超过美国，从而形成“一超多强”的世界新格局。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呈两极分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科技迅速发展，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人才的缺乏、科技的落后，逐步丧失了发展的机会。高科技对社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它大大促进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利用高科技研制的各种控制污染的高效技术和装备，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提供了有

^① 参见谢科范：《论科技进步与世界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合作》，1995年第5期。

利手段；利用卫星观测系统和大型计算机高速通讯网，可对自然灾害进行比较准确的预测和有效的预防；利用高科技开发的优质、高效和副作用小的药物，可以维护人们的健康；高科技还带给人们舒适、方便的生活环境，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丰富了生活的内容。现代化的电视教育系统，还扩大了教育的规模，拓展了人才培养的渠道。据美国东西方中心文化研究所报道，电化教育已使一些处于原始社会的太平洋岛国迅速进入了现代社会。

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各国之间都展开了以科技为支撑，以经济为主体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竞争实际以科技竞争为主体，经济战本质上已经演化成科技战。90年代世界科技竞争形成了美、日、西欧三足鼎立的格局，相应地，这也成了世界经济竞争的主体格局。世界银行发布的1998年全球经济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在全球经济实力排名中，国民生产总值列前六位的分别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①这一情况充分说明了科技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种竞争在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知识经济时代的初现端倪而更加激烈。所谓“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简称。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说法，知识经济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这是一种以创新的速度、方向决定成败的经济。在知识经济中，科学技术起着真正的核心和关键作用，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变动都源于科技的推动。为了迎战即将来临的知识经济时代，强国欲继续称雄，弱国想乘机赶上。世界各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争先抢占科技、

^① 《新华月报》1998年第6期、第177页。

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从而取得未来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制高点和战略主动权。各国政府纷纷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科技政策。在发展战略方面，科技已被置于首要位置并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都成立了由总统或首相亲自挂帅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或科技政策协调委员会、科学技术创新委员会，以加强科学技术的宏观管理与协调。此外，鉴于科技已成为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主导性条件，各国都对其科技体系作出相应改变。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上台伊始就提出“技术为美国经济增长服务，加强经济实力”的新方针。德国政府通过了“关于保障德国未来经济环境的报告”。英国政府于1993年5月发表了题为《认识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战略》的白皮书。日本重新提出了“技术立国”的口号。法国、韩国、新加坡、巴西、印度等国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将提高经济竞争力作为科技发展的主要目标。以这种务实的科技政策为指导，美国在90年代放弃了“星球大战”和超导对撞机计划，并于1993年2月颇具远见地在全球率先推出“信息高速公路”（亦称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预计将投入4000亿美元，用20年时间来实现在该计划，并期望以此为基础，带动新学科的发展，促进美国经济腾飞，增强国际竞争力。美国总统顾问布罗姆利认为，信息高速公路是使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变得更具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一出台，立刻引起了世界的巨大反响。欧洲、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纷纷采取类似的措施。之后不久，美国副总统戈尔发表了题为《全球信息系统将促进发展》一文，提出把各国的信息基础设施连接起来，以构成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方案。“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便以不可抗拒之势席卷全球，震撼全球。继“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提出后，又出现“知识经济”口号热，1998年美国副总统戈尔又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可以说是日新月异。

在当代科技浪潮冲击下，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重新组合以及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科技经济政策的调整，同样也影响到中国。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把握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认准世界科技进步潮流中的坐标，发展科学技术，是中国在 21 世纪能否富国强民、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新技术革命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科技浪潮的挑战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因为在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中，军备竞赛已经主要转向科技与经济竞争，西方大国多急于在中国寻找市场，我们可以在争取更多投资的同时，加强与国际间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充分利用全人类的科技成果，加快发展自己，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战后日本、亚洲四小龙已提供了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增强国力而赶上先进国家的成功范例。

中国的科学技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植之下已形成了独立完整的体系，科技实力也得到了不断增长。特别是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以来，科研实力显著增强。90 年代后，我国每年共取得三万多项重大科研成果。据科技界有关人士估测，目前我国的基础研究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领域约占 5%。高能物理、生物科学、计算科学和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等领域已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① 我国高温超导研究、证明定理的数学机械化方面、水稻基因组物理图谱、澄江动物化石群发现、 τ -轻子的质量测定等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充分肯定；一批新兴学科如生命科学、表面科学、纳米科学、非线性科学、认识科学以及地球系统科学迅速发展，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就整体而言，我们的科技水平还较低，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相当的距离。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把握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推进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科技日报》1995 年 10 月 9 日。

管理学院关于国际竞争力的报告，中国在基础设施、国民素质和科技实力等几个指标方面有着严重不足。而科技竞争力更是成为中国国际竞争力8项指标中惟一连续滑坡的一项，其排名从1994年的23位下滑到1996年的28位。^①此外，就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份额而言，中国在改革开放后（1979—1990年）也只达到30.3%。^②而同一时期的欧洲为50%—70%，不少国家甚至达到60%—80%。^③至于在应用研究和高技术及其产业化方面、在科技人才的利用方面，差距则更为明显。

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国只有奋起直追才能赶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对此，党和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提出“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早在80年代后期，邓小平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④江泽民也在1989年就提出，要将发展科学技术“从总体上逐步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努力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⑤中共十五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了迎接高科技的挑战，1997年8月，江泽民主席在对科技工作

① 蒲淳、方新：《中国面临挑战》，《科技潮》1998年6月。

② 李京文：《当代科技发展趋势与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③ 刘国光：《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第2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 江泽民：《推动科技进步是全党、全民的历史性任务——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9年12月20日。

的批示中再次明确指出：“要面向 21 世纪，选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些高新技术项目，集中必要的人力、财力、物力，建立重点基地，组织精干队伍，加强统一领导，齐心协力攻关。”基于这些清醒的认识，中国政府将全国科技工作部署为面向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发展高科技及其产业、加强基础性研究三个层次。其中，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是科技工作的主战场，发展高新科技及其产业和加强基础性研究是主战场的“两翼”。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部署，国家先后制定了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攀登计划、重大项目攻关计划、重点成果推广计划等六大计划，形成了新时期中国科技工作的新格局，以期早日进入世界先进科技之国的行列。到 20 世纪末，一些高科技计划已初见成效，如 1996 年 4 月在北京举行的“‘863’计划 10 周年成果汇报展”统计显示：10 年来，“863”计划共取得研究成果 1398 项，其中达到国际水平的有 550 项，有 659 项成果获国家或部委级奖励，获国内外专利 255 项。一批重大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使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大为缩小。统计还表明，“863”计划 10% 的实验成果已经形成商品，有的进入中试阶段，38% 的成果正在国民经济领域中获得应用，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① 这一初步检验的成果充分展示了我国在当今世界科技浪潮竞争中的朝气和活力。在对外科技交流方面，我们交流的地域和领域越来越广，步子也越来越快，成果也越来越多。

^① 许珑：《中国高技术发展的丰碑——“863”计划十周年巡礼》，《神州学人》1996 年第 6 期。“863”计划即“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1986 年 3 月 3 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四位著名科学家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了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科技的建议。建议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经过广泛、全面的调查研究和极为严格的科学技术论证，当年就批准了《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并开始正式实施这一高科技发展计划。为了纪念当初联名写信建议的日子，这一计划又称“863”计划。

2. 中外科技界的友好往来

对于中国来说，当代科技浪潮的拍岸强音，既是严峻的挑战，又是难得的机遇。为了摆脱落后，以科技为动力带动经济的真正起飞，党和政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其中，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开展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一直被当做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得到了大力的推行。

中外科学界的往来与合作，在建国之初，主要是进行于中苏之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外交上同苏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种政治上的“一边倒”也深刻地体现于新中国的科技发展之中。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的科学技术界也从此开始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包括聘请苏联的科技专家做顾问、同苏联的科技界开展人员交流与合作研究、选派留学生赴苏联留学等。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定以后，苏联加强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在运行大批机器设备的同时，派遣了一批有专门技能的苏联专家、顾问参加修复铁路、建设水利、勘察地矿、设计工厂等工作。据统计，仅1952年，就有近一千名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①1953年到1954年，苏联专家决定对中国“一五”计划中的核心项目给予援助，并承诺援建156项工程。之后，又派了三千余名专家前来中国。

在苏联援华的专家中，土壤学家柯夫达和邮电业专家扎连柯等曾先后担任过中科院的总顾问，物探专家诺维柯夫、原子能专家萨宁等将最先进的科技知识传授给中国的科技人员。苏联专家严谨的科学态度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他们在援助工作中表现出的热情，更令中国同行久久难忘。许多专家说：“你们不能把我当做客人……建设这个大家庭是我们大家的事。”^②

^① 鲍里索夫：《苏中关系1945—1980》，第35—50页，上海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② 参见中苏友好协：《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中华书局1954年版。

在将苏联专家“请进来”的同时，中国科学界也积极走出国门，选派技术人员和留学生到苏联学习。1951年8月，首批派出375名。随后几年每年派往人数少则二百多人，多时达2000人。这些技术人员和留学生在学成归国后，很多都成为中国科技界的骨干。其中包括前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物理学家郝柏林、控制工程专家宋健以及导弹专家孙家栋、电机专家商德景、光学专家徐叙瑑、半导体专家沈天慧等。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家赴苏进行学术访问也被提上日程。1953年3月，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中国科学院组成了以钱三强为团长的访苏代表团。代表团的任務主要在于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意见。代表们历时三个多月，参观了苏联98个各种类型的研究机构，11所大学和许多工矿、农庄、博物馆，听取了苏联科学院的7个全面性报告。代表团回国后就访问情况做了专门报告。这次访问，对中国学习苏联科学技术以及科研工作的组织领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后不久，中科院仿照苏联设立了学术秘书处，开展学部的设计工作。

1954年10月，李富春和阿·伊·米高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北京签定《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决定在互相提供科学资料、聘请技术专家、接受实习生、留学生以及接待技术考察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此后，中国又陆续同东欧一些国家签定了类似的协定。《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进一步推进了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1955年4月，以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为团长的苏联科学院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们向中科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同年12月，苏联科学访华团来访。1956年3月26日，中苏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缔结了《关于成立核研究所的协定》。1958年1月，中苏两国政府又签定了《中苏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协定》，即《122项协定》。该协定丰富了中国与苏联科技合作的内容，合作的方式也

从主要提供资料样品、互派考察专家扩大为两国相应的科学机构建立直接联系，共同进行研究实验，派遣研究专家等多种方式。

中苏科学界在 50 年代的这种友好往来，使这一时期成为新中国科技史上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岁月。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人第一次拥有了自己设计的“炼钢厂、机床制造厂、炼焦炉、高炉、平炉等，设计工作效率一般提高 20%—30%；加强了一些薄弱的基础工业的建设”；^①同时，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填补了很多科技的空白。新中国的科技、工业，也是从那时起奠定了起飞的基础。

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中国还与亚非国家开展了科学技术的交流活动，主要是交换科技情报资料、苗木种子等。中国与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柬埔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摩洛哥等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

进入 60 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和两国政府关系的恶化，中苏两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也暂时中断。1960 年 7 月，苏联撤走了在中国工作的全部专家，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及科学院签定的所有议定书，废止了正在进行的 257 个科技合作项目。苏联的这一举动，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科技事业来说，无疑是严重的打击。为适应国际形势的这一变化，国家科委于当年 8 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外事会议。会议确定了中国新的对外科技合作方针，即在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的基础上，坚持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合作，积极学习外国的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切对中国有用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科技交往有所增强，同越南、印尼、柬埔寨、阿尔及利亚、古巴、埃及等国签定了政府间的双边科技合作协定。同时，与日本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也开始建立民间科技往来。1962—1965 年，中国有 800 多名科技人员到这些国家参加国际学术会

^① 彭明：《中苏友谊史》，第 288 页，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议，进行技术考察，接待了470多人来华访问，搜集了世界各国大量的技术资料、期刊文献、产品标准、专利技术、产品样本等，其中很多都有应用价值。中国从1956年开始通过对外贸易部向越南提供技术援助。到1960年的5年间共向越南派遣700多名技术援助专家，接待越南来华考察专家370名，接受各种实习生1900名，提供技术资料1570项。越南向中国提供资料等70余项。1960年中越两国政府签定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对中越双方的合作项目作了规定。1965年中国同印尼签定了《科学技术合作协议》，之后，两国互派代表团，就两国科学技术年度计划进行商谈。从1963年到1965年，中国接待了18位印尼的科技人员来考察建筑工程、医学、医疗器械、原子能和平利用等项目，向印尼提供了人工心肺机等。印尼接待了中国21名科技人员考察橡胶、锡矿、建筑工程和气象等项目，向中国提供了若干橡胶和热带作物优良品种，双方的合作取得初步成效。中国与柬埔寨的合作从1961年开始，中国先后派出了筑路、茶叶种植、葡萄种植3个专家组去柬埔寨帮助工作，接待柬埔寨科技代表团5人来华考察，派遣瓷器、磷矿、柴油机等方面技术专家6人、考察专家17人、橡胶实习生4人，向柬埔寨提供了黄豆、芝麻、番薯、小麦、茶等作物种子。柬埔寨向中国提供了香蕉芽条等。1964年，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签定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根据协定，中国曾派遣4项18位科技人员赴阿尔及利亚考察石油开采、建筑、输油及输气管道技术。

遗憾的是，这种往来只维持了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使科技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十年间，除了与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还有少数几个合作项目勉强维持外，中国科技界几乎停止了所有的对外交流活动，整个科技事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为标志，宣告了十年浩劫的结束。

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科技

界敞开胸怀，以自信和自尊的全新形象开始了同世界的重新接触，并很快得到了各国科技界的积极回应。到70年代末，中国科技对外交流工作成绩显著。中国已向美国、西德、法国、英国等30多个国家签定了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定，并已与有关国家签定了分科对口协议等40多个，几乎包括了所有主要学科。中外科技界之间迎来送往，互派专家、学者、留学生，组织学术讨论会，交流非常密切。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79年，来中国进行科技交流的外籍专家人数就达4200人，交流活动达800多次。其中包括华裔的美籍学者李政道、丁肇中、沈元攘、林慰施，英国皇家学会教授波特、莱曼等。李政道教授应邀来中国科学院研究院讲学。他只用了七周时间就讲完了平常在美国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授完的课程，讲课备受欢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同年，中国还接受来华留学生1200多人。在输出方面，同年中国派出留学生1700多人，专家学者7300多人。其中，去英、美、法、意、西德等国讲学、短期工作或进行合作研究的知名学者如华罗庚、吴文俊、黄昆、葛庭燧、何怡贞、蒲蜚龙、卢鹤、谷超豪、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人，在国外的的工作受到了所在国科技界的一致称赞。此外，中国科协所属的80多个学会中有20个学会参加了国际性学术团体，成为正式会员，并同20多个国家近百个学术团体建立了交往。各地方科协的对外交流活动也很活跃。

80年代以后，中外科技界之间的友好往来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中国科技界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受到重视。1982年9月，在英国剑桥举行的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第19届全体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同意恢复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该理事会中断了三十多年的席位。就政府间的科技合作而言，中国同西欧、北美和亚太地区等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继续发展，在农业、工业、地学、生命科学、技术科学、能源、信息、航空等科学技术的诸多领域都制定了合作规划。到1984年底，中国已与101个国家建立了科技交流关系，其中与51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科学

技术合作协定或工业经济技术协定。中国加入的国际科技组织已达到 80 多个。众多中国科学家的水平也得到国际公认并受到尊重，到 1985 年，中国已有 200 余名科技工作者被选入国际各科技组织并担任重要职务，其中有 4 人任主席，19 人任副主席，34 人担任执委和理事。

90 年代以来，中外科技合作、交流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内容和方式上也有新的变化。据 1992 年统计，该年全国对外签订技术引进合同共 504 项，金额为 65.9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4.4% 和 90.5%。1991—1992 年，两年内共聘请各类外国专家 8 万多名，同期中国还选派了 5.3 万多名技术和管理人员到国外实习培训。在外国专家的指导和参与下，已建成 100 多个新学科、新专业和 60 多个实验室，合作开发项目 1000 多项。这一年中国又同 15 个国家新签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使得与中国官方有协定的国家增至 75 个，同中国有科技交往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 128 个。在同国外开展科技合作的领域上，突出了高技术研究开发合作和对发展中国经济有直接作用的先进技术方面的合作，合作方式也更重视建立联合研究开发组织机构。到 1994 年底，与我国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 134 个，与我国缔结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和经济合作协定的国家也增加到 83 个，我国在联合国系统 30 多个科研机构中取得合法席位。

就具体与各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交往与合作而言：

中国与西北欧国家的科技合作开始较早，尤其中英之间的科技合作与交流由来已久，早在 1978 年，两国政府就签订了两国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最高双边协定，从此科技领域的合作日益频繁，双方的态度都十分积极。据英国科技大臣塞恩斯伯里在 1998 年声称，英国政府用于支持英中科学技术合作的经费每年超过 60 万英镑（不包括英国各研究委员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支持超过任何其他国家。1998 年中英双方重新修订并签署了 1978 年关于科技合作最高双边协定的新草约。现在正在执行中

的双边协定包括环境保护、化学工业、有效利用能源、公共卫生、建筑、气象科技及汽车工业等领域。据1998年初步调查显示,在399个中国机构之间至少有738个科技双边合作项目运行;就双方合作的组织机构来看,工业商业企业间的合作占13%,专业研究机构间的合作占30%,大学间的合作占57%。中德科技合作也是中国与西北欧科技合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与德国最大的科学研究资助机构——德国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的合作而言,1988年3月,双方签订科技合作协议后,DFG每年资助中德两国科学基金专家的合作项目交流额达到每月一百多人。为了继续鼓励和促进这一渠道范围内中德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交流,1998年5月26日,双方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共同建设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的协议”和“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章程”,当日下午,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大楼与基金会业务楼同时举行了奠基典礼。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的建立不但标志着中德两国科学交流关系的不断深入,学术交流水平的日益提高,同时也开创了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一种新模式。就中国与整个西北欧国家而言,大致从80年代初就开始了合作,从1987年起就展开了系统的合作与研究,并不断得到深入。到199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与15个西北欧国家的18个科学基金组织或研究理事会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同年,中国政府与欧盟组织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这项为期五年的协定是中欧首个独立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该协定确立了合作方式、合作活动的协调、经费、合作领域和知识产权的分配等原则。它的签署无疑为“双方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合作研究奠定基础”,“预示着中欧科技合作的规模与水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截至1998年底,中欧双方在能源、信息、通信、环保、卫生、农业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开展了二

百三十多个项目的合作与交流。^①

规模最大的对外科技合作是中美之间的科技合作与交流。中美双方通过多个议定书、谅解备忘录,已开展了数千个科技合作项目,人员交流达数万人。合作方式包括从专家互访、图书资料互换、科学家讲学、技术咨询、举办学术会议到合作研究、联合调查、共同观测、合作开发等众多形式,中美双方均成为各自对外科技合作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的伙伴。在多年的合作经验中,双方形成了一种共识的合作模式,即通过互访寻找共同感兴趣的领域,首先做一两个项目,相互“磨合”后,再逐步做一些大项目。这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合作方式,随着双方合作领域的扩大和合作项目的增多,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定、深入、持久的双边科技合作与交流机制。双方交流的组织机构除了政府间外,两国半官方及民间科技合作交流也有较大的规模,两国省市和州之间、高等院校之间、研究所和实验室之间,以及公司企业之间已经建立了多层次、多类型、多形式的科技合作和交流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大量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为科技合作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北京吉普、上海麦道飞机、中国运载火箭发射美制卫星等。中美两国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始于1979年。是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该协定此后一般每五年续签一次。根据这一协定,截至1998年,两国政府的对口部门在33个领域签署了合作协议书和谅解备忘录。这些领域包括教育、农业、高能物理、空间、工业管理、计量和标准、大气、海洋渔业、科技情报、医药卫生、地学、地震、环境保护、基础研究、建筑与城市规划、核安全、地表水、核物理与磁约束核聚变、航空、交通、统计、测绘、化石能、水资源、电信、自然保护、铁路、有色金属、土地管理、矿山安全、矿产管理、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等。在实施

^① 《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4日。

中，双方的合作大量集中在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物理等研究领域。为规划并协调中美政府间的科技合作，中美双方还于1980年建立了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每届联委会双方均有12名左右的委员，其中包括4—5名副部级成员。双方还各设一名执行秘书，负责协调和处理联委会的日常事务。大致每隔两年联委会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一次会议。1996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七次联委会会议就农业、林业、卫生、环境以及能源、减灾等为优先合作领域展开了积极的讨论，签署了中美关于延长测绘、环保、高能物理等七个议定书的换函，以及中美关于风能、能源效率管理、可再生能源产业合作的三个附件等文件。同时宣布，中美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定将延长至2001年，这使得该协定成为一个跨世纪的合作宣言。1997年10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会谈中，双方共同肯定了中美科技合作的成果，同时指出“中美科学技术联合委员会将继续指导双边科技合作项目，并将进一步推动运用科学技术来解决国家和全球问题”^①。1997年11月，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了中美科技合作第八次联委会，双方讨论了面向21世纪的中美科技合作战略，深入探讨了能源环保、空间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并签署了工业技术和科技信息合作等方面的协议书。1998年，继江泽民主席访美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克林顿的访华进一步促进加深了美中科技就能源与环保合作、大气变化问题的对话，扩大再生能源、医学研究维护生物多样性、海洋技术以及利用卫星对地观测等领域的合作。至此，中美两国的科技合作翻开了新的篇章。

中国还一向注重同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与合作。80年代，邓小平同志曾多次谈到南南合作和我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开放的重要性。在这一方针的引导下，从1979年到1984年的六年

^① 《科技日报》1997年11月19日。

时间中，中国接待了这些国家的专家、学者近 1100 人，派出专家、留学生 910 名，执行了 600 多个合作项目。同时，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培养了各方面的技术人才。从 1987 年起，中国每年提供一笔专款，称做“中国科学院南南合作基金”，主要用于资助第三世界国家科学家来华进行中长期技术培训和短期专项技术培训，来华参加国际会议和进行短期专业考察以及专题合作研究。为了增加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我国技术的力度，1997 年国家科委又专门为发展中国家举办了 19 个专业技术培训班，来自 36 个国家的 287 名学员接受了培训。通过培训，不仅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了解，增进了友谊，还为扩大我国成熟技术和设备的输出奠定了基础。90 年代，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更趋活跃，并常常与经贸合作融为一体而形成更多的南南合作形式和渠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参与和推动与周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多边合作，二是以科技合作为先导而与经贸合作相结合的合作项目迅速增加。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中国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做出了一些科技含量比较高的贡献。例如：援助朝鲜建立计算机培训中心，援助肯尼亚建立疟疾防治中心，援助埃及修建巴拉克科学园，向喀麦隆政府捐赠一台曙光 1000 型大规模并行计算机，向科特迪瓦和摩洛哥两国各捐赠 30 台联想计算机以及为津巴布韦建立太阳能和生物能技术示范项目等，这些项目受到了发展中国家欢迎。中国的钢铁工业先进技术已经出口到了印度，获得近三千万美元的技术转让费，并签订了数亿美元的技术及设备出口合同。程控交换机的出口于 1996 年取得突破性进展，04 程控交换机在同西方强手的竞争中进入独联体和中东欧市场的同时，在古巴也签署了在其中一个岛屿安装一万线的协议。此外，中国钾肥、小型农机和橡胶等的生产技术在第三世界国家受到广泛的好评和欢迎。中国“星火”计划走向世界，也是南南合作的一个新的有效的形式。1994 年，在杭州举办“中国‘星火’计划国际研讨会暨‘星火’计划

和产品展示会”，亚非拉 18 个国家的代表团与会，进一步肯定了中国“星火”计划对发展中国家有普遍借鉴意义，并表示希望与“星火”计划进行合作与交流。

80 年代初，中国还恢复了冰封近三十年之久的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科技合作。1984 年 12 月，中苏重新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1986 年 3 月，中国科技代表团赴苏，参加中苏科技合作分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双方安排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合作项目。同年，国务委员宋健率团访问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四国，这是建国以来中国科技界领导人带团对东欧国家最高层次的访问，访问期间，同上述四国分别签署了长期合作纲要。这一年，东欧国家代表团也纷纷来华，2 月，波兰科技代表团来访。10 月，波兰政府科技代表团来华参加中波科技合作委员会第 19 届会议。11 月，中国与罗马尼亚科技合作委员会第 26 届会议在北京举行，中苏以及中国与东欧之间的科技交流从此日益密切。1988 年至 1989 年，中国科技交流中心圆满完成了承办中苏、中波科技日活动的任务。这是此前 30 年来中国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举行的影响最深远、规模最宏大的科技交流活动。在前苏联、东欧国家举办的“中国科技日”活动还为开辟中国与该地区技术贸易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到 1998 年 9 月，独联体、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 27 个国家除波黑外都同我国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占与我国签订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总数的 26%；在政府协定框架下签订的政府部门间专业对口协议数量更多，其中与俄罗斯签订的就有 17 个；同时，与 11 个国家的科技主管部门建立了副部长级的政府间科技合作委员会，共召开了 22 届政府间科技合作委员会会议，执行了大约六百多个项目。在政府间的科技合作推动下，我国同独联体及东欧国家的行业间的国际合作也日趋活跃，成为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航空航天、核能、造船、电子领域，邀请独联体和中东欧国家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和大批专家来华洽谈合作项目、进

行讲学等交流活动。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苏（俄）签订合同、协议三百余项。合作大体分为重点工程合作、关键技术合作项目、预先研究课题、民用飞机合作等几部分。随着这些科技合作交流活动的展开，独联体及东欧国家对中国科技和整个经济发展都有了相当的了解，从而增加了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向这些国家的出口。其中，唐山煤炭设计院以建立合资企业形式把不锈钢筛网技术转让给俄方，成为中国对外出口高新技术的第一个成功例子。在国际电信市场，中国的巨龙公司和华为公司积极开拓独联体和东欧国际市场，努力推出他们生产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04和08大型程控数字交换机。随后又与罗马尼亚就共同组建一条微电脑装配线和智能生产线，以及合作进行CD-ROM项目的开发、出版和生产等问题，与罗方进行谈判，具体合作事宜正在落实之中。此外，中国核动力设计院的钴-60远距离治疗机、铍-192r探伤机等设备也已出口到独联体及东欧国家。1997年，中俄两国领导人商定建立中俄两国总理定期会晤制，提出了总理定期会晤的构想，成立了直属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的科技合作分委会。此举为建立21世纪的科技合作战略伙伴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近邻日本等亚太国家的科技合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1980年，中国与日本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议，从此在环保、地球科学、防灾、信息通讯、能源、农业、海洋等重要领域展开了大量的科技合作。在1997年5月召开的第八次日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中日双方在一百多个项目上达成了协议，有的项目还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重视。在与韩国的科技合作中，值得一提的是“中韩基础科学联委会”。1995年10月，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与韩国科学与工程基金会（KOSEF）在北京签署双方共同建立“中韩基础科学联委会”协议，从此双方进入全面合作阶段。该联委会共12名成员，中韩双方各6名，联委会每年开会一次，选择双方合作领域，确定当

年度 NSFC 与 KOSEF 合作研究项目及双方共同组织召开的双边学术研讨会，创意举办区域性的多边国际学术会议，以及其他形式的合作与交流，双方已举行的数届联委会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但每年都确定了大约十项学术研讨会，还都确定了约五项合作研究项目。作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一名成员，中国历来主张经济技术合作是亚太经济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积极推动科技合作的进展。早在 1992 年，中国就在 APEC 提出科技合作动议，建议成立科技工作组。经过各方努力，APEC 的产业科技工作组于 1994 年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科技部长会议，规定了 APEC 开展科技合作的四个重点主题：科技信息交流；促进研究人员的交往及人力资源开发；增进政策透明度；开展合作研究项目。1996 年 11 月在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针对 APEC 对经济技术合作重视不够的状况，深刻地指出，“没有卓有成效的经济技术合作，贸易投资自由化也不会有大的进展”，而经济技术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科技领域的合作，本世纪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是创办科技工业园区。他倡议成立 APEC 科技工业园区网络，以进一步推动科技与经济融合的势头。随后，我国政府又选定北京、苏州、合肥和西安四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第一批向 APEC 成员开放的科技工业园区。

在联合国的相关机构，频繁的中外科技交流扩大了中国科学界在世界的影响。80 年代起，中国先后在联合国发展委员会、科技促进发展中心、科技资金系统及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大学、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等三十多个有关科技机构中获得席位，并积极参加联合国系统有关科技机构举办的重大活动，同它们进行密切的科技合作与交流，例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核安全与人才开发培训、核技术及应用方面的合作，与联合国发展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委员会就新能源项目计划的制定等。

在发展政府间科技合作的同时，民间的对外交流活动也在积极展开。1982年，中国科技交流中心正式成立，并与加拿大、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几十个民间科技组织建立了联系。同年，中国科协及其所属的159个学会已分别加入了191个国际民间科技组织，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科技团体签署了双边、多边合作协议。此外，中国参加国际科技学术组织280多个，已有包括张维、王大衍、谈家桢、唐有祺等人在内的200多名科学家在国际科技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仅1988年一年，中国民间对外科技交流的活动量，就超过了1950年到1978年28年的总和。中国科技界的蓬勃朝气吸引了无数的合作伙伴。1995年，美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美国科学促进会认识到中国在未来亚太地区和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设立了旨在加强对华交流的环太平洋计划。1996年4月，中国与这个协会共同发起了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地区科技界最高层人士会议，11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层专家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科技合作、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最高的科研机构，一直是对外科技交流的重点单位。到80年代末，它已和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科研机构、大学及有关国际组织签署了七十多项协议。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中科院与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的合作。第三世界科学院是一个非政治、非政府和非营利的国际科学组织。从它1983年组建之日起，中国科学院就积极参加它的全部活动。1986年中科院成为该院的北京办事处之后，两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加密切。迄今该院在全世界74个国家和地区共有院士48名，其中中国院士50名（不含已故的），仅次于印度，居第二位。1988年，TWAS成立了自己的科技组织网络（TWNISO），目前已有发展中国家的150多个成员，他们分别来自73个国家的36个科技部门，中国科技部和中科院均为其成员。90年代后期，TWAS在发展中国家评选了80多个研究单位为其

优秀科学中心和高级研究中心，其中我国有 14 个研究单位（包括台湾地区 1 个）被选为优秀中心，一个研究所被选为高级研究中心。90 年代，中科院在对外科技交流方面取得了更大的进展。1990 年，中科院开始实施与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的实验物理博士计划，1991 年，同美、日科学院恢复了在 1989 年曾一度中断的合作，先后接待了美国农业、草原、生态系统、全球变化等专家组的访问，并与美方在高能合作方面取得成效。同年，中科院代表团还访问了英国皇家协会，与蒙古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等签署了合作、交流协议。不仅如此，中科院与公司或企业的合作也在不断的发展扩大之中。目前，美国杜邦公司、孟山都公司、惠普公司、西方石油公司、微软公司、数字设备公司、国际商用电器公司等都与中科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了合作项目，促进了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中国科学院开发的一些高技术产品，如偏硼酸视非线性光学晶体、酸铋晶体、大尺寸钛酸钡晶体、计算机联想汉卡系统等，也进入了国际市场，并受到日本、美国及西欧许多国家的欢迎。三环公司与美国一家公司成立了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出口钹铁硼产品，1997 年年产量达 300 吨。1998 年，联想集团与美国微软公司签订了在其产品全部预装 MSWindows95 软件的合同，两家著名厂商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已形成。

此外，中国高等院校也是科研人员的荟萃之地，尤其像北大、清华等全国著名高校，科研实力雄厚，中外联系密切，是中外科技合作与交流中不可忽视的一支生力军。全国有一千多所各类高等院校，应该说，总体科研人数之多是其他群体无法比拟的，因此，大学实为我国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关键性力量。这一点我们可从前述中英科技合作中大学间的合作占 57% 的最高比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以上情况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外科技界的友好往来以官方、民间、多边、双边的形式广泛展开，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崭新格局。到

1997年，中国已同世界上13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或经贸科技合作协定，官方科技合作交流项目每年达1万项之多。此外，我国科技界已加入了75个国际学术组织，283家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获得了外贸经营权，国际技术贸易保持稳定高速增长，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1997年已达294亿元。这种日益密切的交流与合作，有力地促进了经济贸易合作和中国技术及技术产品的出口。例如，中国已通过科技合作将红外传感器等新技术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提高了中国空间科学水平。中美合作研制的核磁共振成像扫描机，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

通过广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中国的科技水平、科研潜力、中国科技人员的素质已日益引起国际同行的瞩目。也正是由于有这种广泛的科技合作与交流，使我国科技人员开阔了眼界，及时了解和把握了世界科技的前沿信息，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科技水平，缩短了我国同发达国家科技水平的差距。广泛的科研合作与交流，不但巩固和扩大了我国对外经济往来和合作，同时也加快了科技产业化的进程，这一切，都大大推进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使得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诸环节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此外，通过科技交流和合作这个窗口，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消除了许多不必要的隔膜与误解，从而密切了我们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加深了同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感情，这无疑有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总之，由于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和我国当前经济持续发展的乐观趋势，以及当前世界科技国际化的必然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有一个更为美好灿烂的未来。

3. 科学技术的国际化趋势和中外科技交流的广阔前景

如前所述，中外科技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日趋密切，范围也愈益广泛。这种发展趋势，不仅表现为合

作伙伴在地域上的扩展，同时也表现为合作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延伸。近年来，中外科技交流更是进入到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究其原因，既是20世纪末科技发展的国际化大趋势所致，也与中国科技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

科学技术在20世纪尤其是后半期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不断扩大。科技的国际化趋势，开始于80年代，90年代则形成一股潮流，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科学技术与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科技产业化的快速发展，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经费和人力的巨大投入，这在任何一国都难以单独承受，因此必须寻求国际间的联合投入与研究。

第二，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朝高级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近十年来，科研课题呈广博性、多结构性以及综合性等典型特点，跨国间的科技合作则因学科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能力互补而成为研究开发的必然方式。

第三，科学技术的急剧变化，使知识密集型产业中的产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市场的不确定性又增大了技术开发风险，同时保持所在工业领域的技术领先，只能进行跨国合作。

第四，大科学时代的到来，为人类提出了许多超越国家范畴的重大课题。如天文、气候、海洋、环境、生态、食物、疾病、宇航等方面的课题都必须求助于国际合作。

第五，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并加紧制定全球战略，开发世界市场，其经济活动使生产的专业化与协作化扩展到国际范围，从而促进了高科技工业国际化的重新组合。

第六，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世界各地不同角落的科研机构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跨越空间的国际化合作步伐大为加快。

80年代以后出现的科技国际化趋势，正是由于以上各种因

素而终成大潮。在这一浪潮之下，国际科技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并逐步渗透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的各个领域。同时，技术开发的分工与协作也从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品发展到单机生产、零部件生产乃至整个工序上。国际技术转移范围不断扩大，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流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技术流动，皆有发生。国际科技合作从合作对象到合作领域的全面展开，为中外科技交流向广度与深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中国自身的许多有利条件也推动着中外科技的交流与合作，并使其逐步扩展到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

首先，在基础研究方面，中国有着十分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可以凭此优势通过国际合作方式，瞄准世界一流水平，培养高水平的基础研究队伍，成立开放性的基础研究机构，从而将基础研究向全世界开放。

其次，作为当前科技的重要研究力量，跨国公司掌握着当今世界 80% 以上的新技术、新工艺，经营着 70% 的技术转让。^① 中国广阔的并且有待开发的国内市场吸引着来自全球的各大跨国公司。它们对技术“研究与发展”的巨额投资，使得中国科技在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领域亦与世界紧密相连。

再次，中国制定的科技发展战略明确规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博采各国之长，这就决定了中外科技交流必将渗透到科技国际协作与分工的全部领域。

正是在科技国际化潮流的推动及国内政策的支持下，中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的领域不断扩大。目前已经涉及的领域包括：教育、农业、高能物理、工业管理、计量和标准、大气、海洋渔业、科技情报、医药、卫生、地学、地震、环境保护、基础研

① 李惠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国际化趋势》，《哲学研究》1994年第8期。

究、建筑与城市规划、核安全、核物理、磁约束核聚变、航空、交通、水资源、电信，等等。而伴随着世界科技新领域的开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更广阔的天空将被打开。

二、中外重大科技项目的合作及其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科技交流，主要是通过互派专家、专业考察、联合举办学术会议、联合建立培训中心、联合调查、合作研究等多种方式进行的，其中与国外同行建立的诸多合作项目都已取得成果，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收益。

50年代，中苏科学界往来密切，中国的许多科技项目都是在苏联的支持下，与苏联专家共同完成的。“一五”期间，苏联在军事、航空、电子、兵器、航天、船舶、冶金、化学、机械、能源、轻工业、医药等领域的156个项目建设中给予中国大力帮助。1954年10月，《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正式签订。1958年1月，双方又签订了《中苏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协定》，协议中规定，中苏两国在1958—1962年五年间，共同进行122项对中国有重大意义的科学技术项目的研究工作。

在中苏共同进行的科研项目中，核武器的研制尤其引人注目。从1955年中国决定研制原子弹起到1958年，中苏两国就核科学技术签订了六个协定。包括两国合作在中国进行的铀矿普查勘探的协定（1955年1月20日）；苏联援助中国建造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协定（1955年4月17日）；苏联在中国铀矿普查勘探方面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1956年8月17日）；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能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协定（1957年10月

15日);关于1956年8月17日协定的补充协定(1958年9月29日)。^①

以上协定所规定的合作项目,除了反应堆和加速器以外,其余都随中苏关系的恶化而中止。重水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全面完成于1958年。其中,重水性反应堆的热功率为7000—100000瓦,技术水平达到了世界最先进水平;回旋加速器则能产生25000万电子伏。它们的建成,使中国能够制造自己的同位素,标志着中国原子能时代的到来。^②它为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全面铺开,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50年代,中苏两国科学家还在地质考察、资源利用方面取得重大成果。1956年8月,中苏签订共同调查并综合利用黑龙江流域自然资源的协定。根据协定,中苏两国将共同调查和研究两国交界的黑龙江流域自然资源和生产发展远景。1959年12月,该项考察工作圆满结束。参加考察的一百七十余名中国科学家和一百三十余名苏联科学家对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完达山、张广才岭等地区进行了水利水能、地质、交通运输、自然条件和经济五个方面的考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为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上游的综合利用规划提供了参考。^③

1959年7月,中国地质人员和苏联专家共同对南岭地区进行的地质测量,经过三年的努力也基本完成。中苏专家在已经填好的1:20万的地质图、矿产图、地层剖面图上,完整地标出了矿产、地层、大地构造、火成岩、地貌、水文等丰富资料。这些资料为南岭地区提供了矿产普查的线索,并且使电力、水利、铁

① 王鸿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与技术》,第5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② 赵国良:《中国科技成果报道选编1949—1989年》,第40、46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 同②,第67页。

道的建设有了详尽的依据。^①在当时来说，对中国的工业建设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中苏科学界之间的合作到60年代初全部中止。此后，中国的科技事业又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在这种情况下，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中外科技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才开始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科技工作者摆脱了过去封闭的局面，大力发展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实行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开始大幅度增长，并以显著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80年代，中外科学界首先在中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考察、勘探及综合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1980年，中国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与澳大利亚科技南极局开始实行南极考察合作研究计划。在这一年，双方科学家第一次登上了南极大陆，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1981年，中法双方开始了喜马拉雅山地质构造和地壳上地幔的形成与演化的合作项目。这次考察持续了三年之久，它的圆满完成，进一步确定了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又一条缝合带，使得板块学说有了突破性进展。1981年，中澳两国商定在“盐湖、风成沉积”、“海岸线”、“古人类”、“全新世”四个领域开展南北半球的研究，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柴达木湖的考察于1984年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中澳两国科学家在察尔汗湖、小柴旦湖、昆持依湖发现了古湖岸线。在小柴旦湖东南隅的湖岸阶地上，发现了人类遗迹——古石器。这些新发现，不仅在学术上对第四纪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恢复柴达木古环境提供了重要依据。1987年，中美长江口外东海沉积动力学联合调查取得重大进展。与此同时，中美还开始进行热带西太平洋海大气相互作用的合作项目。两国科学家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四个航次的海洋综合调查。他们通过现场辐射观测

^① 《光明日报》1959年7月30日。

和诊断分析，获得了大量的海洋环境资料，促进了科学探索厄尔尼诺现象的进展。“这不仅对中美两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对热带海洋的全球大气研究计划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外科学界在自然资源及环境考察方面的重大合作项目还有：中日鄂尔多斯油气普查项目；中德在湖南稀有元素矿产勘察项目；中荷黄河三角洲的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开发项目以及中日三江平原综合治理开发项目。这些合作项目的进行，使大量重要的自然资源得以查明，从而有效地促进了资源的利用及地质环境的综合治理。

除了资源和环境的专业考察外，中外科技交流还以合作研究、联合实验、联合建立培训中心等诸多形式广泛进行。其中很多项目都已取得一定的成果。1981年，中日双方签订并执行了铁路现代化、中日友好医院专项工程、含铌生铁冶炼等合作项目；1982年，又开始了农用抗生素、医用抗生素、聚丙烯高分子三项共同研究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视听设备、企业现代化技术改造、企业管理干部培训中心专项工程等项目的科技合作。其中，铁水提铌的合作研究已于1984年取得重大成果，所开发的铁水分段氧化连续脱硅提铌新工艺，受到国际科学界的瞩目。^①同年，中日友好医院建成并开放，开发农药抗生素和医用抗生素的合作研究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983年，中国与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继地球固体潮和金属腐蚀机理的合作之后，又进行了土壤改良、地震观察等六个合作项目，确定了一批新的合作项目；与瑞典进行了航空、科技规划和管理等领域的11个合作项目；与联邦德国在企业技术改造和新技术等领域开展了联合研究，在勘探方法、工厂现代化管理、开发太阳能和煤液化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成果；同日本就黑龙江三江平原综合治理等重要工程进行了可行性调查。

^① 黄兴：《中美科技合作的重要成果》，《人民日报》1991年3月26日。

1984年，中国与西欧工业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有了很大发展。中法双方在1984年执行了包括农业、工业、地学、生命科学、技术科学、能源资源的近百个合作项目；中国与联邦德国则签署了民用空间科技合作议定书，双方商定在广播电视卫星系统、通信卫星系统、气象卫星系统和其他科学实验卫星技术领域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方面，以及在发展和制造有关设备、元件和系统合作方面进行合作；与意大利就生物工程、农业食品、新能源、信息学等方面的课题进行合作。

1986年，中美合作建成第一个遥感卫星地面站。这个地面站全部采用国际上的最新技术，有卫星跟踪、数据接收、计算机数据处理、照相机处理等系统。地面站的全部设备均由中国科学院根据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从美国引进。它的建成，填补了中国高技术领域的一项空白。

1987年，中国与欧洲共同体签署了双方最大的一个科技合作项目——浙江大陈岛互补能源系统项目，对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潮汐能进行开发实验。此外，中国已与欧洲共同体联合举办了核安全监测、能源管理等九个培训中心，还达成了在中国建立生物技术中心的协议。在与西欧国家的合作中，引人瞩目的成果有从联邦德国引进的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系统、瑞典奶制品加工培训中心。中国非常重视同西欧各国的科技合作，并希望这种合作继续向高技术的发展方向发展。在这方面，中国将参加联邦德国一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

1987年11月，中美合作在中国建成数字化地震台网。这个台网由分布在北京、兰州、乌鲁木齐、海拉尔、牡丹江、恩施、昆明、琼中、上海的19个地震台组成，它们相对均匀地分布在中国大陆上，有利于控制重点地区的地震活动。该台网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在地震预报、研究地震构造和减轻地震灾害等方面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1988年，中外科技合作项目取得两项重大成果，即北京重

水反应堆冷中子源装置和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重水反应堆冷中子源装置，是在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与原法国原子能总署基础研究部主任捷·霍洛维茨教授的共同倡导下，由中科院和法国原子能署合作共同完成的。它的建成，使中国成为国际上少数几个拥有冷中子源装置的国家之一。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中国科学院与美国五个国家实验室及一些著名大学合作的结晶，被视为中美科技合作的典范，至今仍被认为是世界一流的对撞机。美国十几所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的专家经常来华，长期在该对撞机上从事物理实验工作，1992年，中美科学家还利用它测得了 τ 轻子的精确质量，这是对撞机谱仪合作的首项成果，被国际物理学界评为当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作为中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对撞机为中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研究开辟了广阔前景。

80—90年代，中美双方在卫生科技方面的合作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双方先后进行了预防神经管畸形、恶性肿瘤的行为干预、慢性病、蠕虫病、心血管疾病等流行病学的合作研究项目，获得了医疗卫生方面的重要统计数据 and 资料。特别是双方合作进行的中国河南省等地的2.4亿人次的癌症分布调查以及根据发病率、死亡率和地区分布汇编的“中国癌症分布图谱”，对双方进行癌症防治与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1990年4月，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堵丁柱和美国的黄光明博士合作，在世界上首次从理论上证明了数学“最短线路”问题：即证明在有三个或更多个点组成的网络中，通过增加另外的点所能得到的最短线路，最多能比原来缩短13.4%。这项成果被美国离散数学界和理论计算机界列为1989—1990年度的两项重大成果之一。

1996年中国科技大学朱清时院士与俄罗斯托木斯克大学奥勒尼科夫教授共同分析了 AsH_3 (600)、(310)态， H_2Se (60)态等高激发态的复杂光谱，分析了一系列局域模振动态的振转光谱，发现了诸多新的现象，在该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1997年我国自行研制、当时运载能力最大的新型捆绑式运载火箭“长征三号乙”成功地将美国劳拉空间系统为菲律宾制造的马部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航天跨国技术合作的成功范例，这项成绩被评为当年中国科技的十大成就之一。同年底，我国自行研制的“长二丙”改进型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也首次成功将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制造的两颗铱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承揽铱星发射合同（1993年同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签订）的首次发射，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9次发射。90年代以来，我国的航空航天技术在对外技术合作中成绩迭出，日益引起国际同行的瞩目。

总之，进入90年代，由于科技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科研项目。几乎都离不开广泛的国际合作。合肥HT-7托卡马克装置是与前苏联合作的产物，遥感卫星地面站接受了美国LAND4等外国资源数据。在国家科委拟订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纲要中，拟继续进行和开展的重大科技项目也需要国际科学界的支持与参与。如：现在正处于运行和研究阶段的重离子核物理合作研究、合肥同步辐射应用研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遥感卫星地面站、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NMOST、水稻基因图谱研究、人类基因图谱研究、全球变化研究，等等。这些科研项目在未来通过国际合作的完成，不仅会扩大中国科技在世界上的影响，同时，还将揭开科学技术的新篇章。

三、享誉海外的华侨和华裔科学家

20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人求学西方的脚步，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华侨和华裔科学家逐渐成长。他们凭着自己的勤奋与智慧，在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成为推动世界科技发展的中坚力量。自1957年以来，先后有6位华人科学家

获得诺贝尔奖。据不完全统计，在美国今日的 3000 所大学中，担任教授、研究员以及高级主管的华人，就超过万人。著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更是满怀信心地预言：“10 至 20 年以后，即将来的科技领袖相当大多数是华人。”^①

同为炎黄子孙，华侨和华裔科学家的成就凝聚成所有中国人的骄傲。而与此同时，他们也深深以中国为念。在获得事业的巨大成功之后，他们往往想要给祖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以实际的帮助，甘做中外科技交流的桥梁。

1. 数学界的俊杰

在海外华裔数学家中，至少有四位数学家已进入世界著名数学家的行列，他们是陈省身、周炜良、樊壤和丘成桐。^②

陈省身（1911— ），国际公认的 20 世纪后半叶杰出的几何学家，尤其在微分几何学及拓扑学方面做出了非常杰出的重要贡献。他生于浙江嘉兴，1930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1934—1936 年留学德国，获德国汉堡大学博士学位，1936—1937 年在巴黎随微分几何大师嘉当工作一年，1943—1945 年工作于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1949 年被聘为芝加哥大学教授，1960 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直到 1979 年退休。陈省身在 40 年代就已蜚声国际数学界。他一生最重要的科研成果主要是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期间做出的。他给了高斯—邦尼公式一个新的内蕴证明，提出了“大域微分几何”的概念，并进而发现了“陈示性类”原则，这为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际几何大师 H·霍普夫在评价陈省身的这些贡献时说：“推广高斯—邦尼公式是微分几何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问题，纤维丛的微分几何和示类性理论……更将数学带人一个新纪元。”陈省身的数学兴趣很广泛，在古典的及近代的几何

① 罗涛：《海外华人成功启示录》，第 94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参见吴文俊：《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下），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学诸多领域上均有重要贡献。鉴于他的突出成就，瑞士、印度、以色列、英国等国许多著名大学均曾授予陈省身荣誉博士学位；1961年，他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75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1983年获沃尔夫奖（该奖是1978年由以色列沃尔夫基金设立，颁给在世界科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他还是英国皇家学会、意大利国家科学院、法国科学院及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1981年担任美国国家伯克利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陈省身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科学教育家。他在加州大学将数学系办成了世界著名的几何中心，可以说世界各地的几何学家都受过他的影响。陈省身怀有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一直希望中国数学能跻身世界数学领导地位，80年代以来，他通过各种途径为提高中国数学水平不懈努力，1984年，他将沃尔夫奖的十万美金全数捐给南开大学创办南开数学研究所，并担任了首任所长。他说：“我的最后事业也在中国”，“我要为中国数学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87年，在南开大学举办的陈省身执教50周年的庆祝会上，前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贺词中称陈省身为“中国数学的总教练”。

周炜良（1911— ），^① 20世纪代数几何学领域的主要人物之一。生于上海，1924年赴美留学。1933年留学德国，1936年在著名代数几何学家范·德·瓦尔登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任中央大学数学教授。后因生活所迫改行从事经济工作。1946年重回数学领域。1947年赴美，任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次年任正教授。1955—1966年任霍普金斯大学数学系系主任。1959年当选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1977年退休，成为霍普金斯大学的荣誉教授。周炜良毕生精力从事于代数几何学的研究，成就突出。以周炜良名字命名的数学

^① 参见吴文俊：《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下），第1679—1685页，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名词仅在日本《岩波数学词典》里就收有七个。如：周炜良坐标，即配型的坐标，已成为代数几何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工具；关于解析簇的周炜良定理，在代数几何著作中广受重视，在许多论文里，常常把它作为新理论的出发点；在射影簇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周炜良环，成为代数几何研究的一项重要工具；在证明各种黎曼—罗赫定理时，常用周炜良环去导出陈省身类；丰富和发展了韦伊等开创的阿贝尔簇的研究，有关成果被称为周炜良定理。由于周炜良在代数几何领域的研究涉及很广，成果众多，国际影响较大，70年代，P·拉克斯在其著作中将周炜良列为移居美国的数学家之一。

樊畿的数学成就也具有广泛的国际声誉。^①樊畿，191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36年毕业留校任教。1939年以庚子赔款留法生的身份留法，师从泛函分析的先驱学者弗雷歇。1941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法国国家研究中心工作。二战结束后去美国，供职于多个单位。1965年应聘为加州大学巴巴拉分校数学教授，直至1985年在该校退休。樊畿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从线性分析到非线性分析、从有限维空间到无限维空间、从纯粹数学到应用数学，都取得了出色的成果。以樊畿的名字命名的定理、引理、等式和不等式，常见于各种数学文献。他在非线性分析、不动点理论、凸分析、集值分析、数理经济学、对策论、线性算子理论及矩阵论等方面的贡献，已成为许多当代论著的出发点和一些分支的基石。特别是由于他的工作多半涉及一些数学学科的基础核心，所以常被列为基本文献写入教科书，有的已成经典性成果。樊畿于1964年被推选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多所大学访问教授，一生还担任过多种学术职务。鉴于他在数学领域

^① 参见吴文俊：《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下），第1744—1753页，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的出色成就，1985年退休时，数学界还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学术活动，加州大学巴巴拉分校还宣布成立樊熾助理教授职位。1989年樊熾首次回到祖国，在国内多所研究机构和大学进行演讲、讲学。出于对祖国和母校的深厚感情，他将四十余年收藏的数学书籍和杂志，除少量自己常用外，全部捐给母校北京大学。

丘成桐（1949— ），世界微分几何的新一代领导人物。他生于广东汕头，在香港先后就读于沙田中学、培正中学。1966年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1969年留美，师从国际微分几何权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陈省身，1971年获博士学位。丘成桐毕业后任教于美国多所大学，取得了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永久教授”职位。现身兼哈佛大学数学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并与杨振宁共同领导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科研工作。丘成桐的数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微分几何、非线性椭圆微分方程、低维流型拓扑、广义相对论、复流型解释几何等方面均取得世界一流成果。例如，他解决了著名的沃尔夫猜想，解决了广义相对论中的正质量猜测，与华裔数学家萧荫堂合力解决了“伍鸿熙猜想”，给予了“弗兰克猜想”充分的证明，尤其以解决“卡拉比猜想”而轰动国际数学界。“卡拉比猜想”是由著名几何学家卡拉比1954年在国际数学大会提出的有关高度空间曲线的几何论假设。卡拉比本人无法证实，此后十多年间也一直无人解决。1976年底，丘成桐用强有力的偏微分方程估计解决了这一问题，所得基础性结果都是经典几何代数方法所无能为力的。当时，他才27岁。由于丘成桐的杰出工作，1983年，世界数学学会授予他菲尔兹奖章。该奖是用来表彰在数学上有卓越贡献且年龄在40岁以下的数学家的，由于诺贝尔奖无数学一项，该奖成为世界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丘成桐是该奖设立以来迄今为止的第一位华裔获奖者。此前，他还当选为1979年度加利福尼亚州最优秀的科学家；1981年获世界微分几何界中的最高奖之一——美国数学会的维布伦奖。1987年又获美国科学界最高

奖——美国国家科学奖。丘成桐对中国数学问题一直十分关心，多次回国讲学。从1984年起，先后招收了数十名中国博士研究生，精心为中国培养微分几何人才。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2. 物理学界的巨子

应该说，物理学界是海外华裔科学家取得科学成就最杰出的领域，先后有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朱棣文、崔琦等五人荣获诺贝尔物理奖。此外，还有世界“物理女王”吴健雄、著名教育家和国际传热界大家田长霖、获美国“国家科学奖”并在世界材料科学领域成就卓越的朱经武等一批著名科学家。

杨振宁（1922— ），生于安徽合肥。其父为清华大学教授、我国早期著名数学家杨武之。1944年，杨振宁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获理学硕士学位。第二年赴美深造，入芝加哥大学，师从世界“氢弹之父”著名物理学家泰勒，1948年获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后历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研究员，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爱因斯坦物理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近代理论物理在某些领域的发展，与杨振宁的名字是分不开的。1948年，他提出了“杨氏角分布定理”；1949年，同费米教授一起提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模型，用以解释介子的性质，被称为费米—杨模型，为以后板田模型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提出规范场理论和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更是杨振宁对物理学的最卓越的贡献。1954年他与助手密耳合作，从量子动力学的基础和质子中子间的固有对称性出发，提出非阿贝尔场规范理论，即后来人称的杨·密耳规范理论。这个被誉为20世纪内除了相对论以外最重要的物理理论，解决了爱因斯坦后期30年没有解决的难题。物理学界一致认为，就凭这一成果，他也应获诺贝尔奖。宇称不守恒定理是他与李政道合作的成果。宇称守恒本是量子力学的金科玉律，但科学家在研究基本粒子

时，却发现这一定律与实验现象并不一致，这就是著名的“ $\tau-\theta$ 之谜”。对此，50年代中期，杨振宁与李政道在合作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举世闻名的“李—杨假说”，即大胆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也许是不守恒的”。他们从宇称守恒的实验依据入手，发现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并无实验依据。同时通过系列难度极大的实验证明，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守恒的。终于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由此使物理学步入了一个新纪元，导致了基本粒子物理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因这一卓越的贡献，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先后共同获得爱因斯坦物理学奖、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时刻关注着祖国科技的发展，为中美科技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1971年夏，他作为美籍华裔学者首次回到中国，拉开了中美学者重新交往的序幕，在中美科技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他又多次回国访问、讲学，积极为祖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建设性意见。受聘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国内高校的名誉教授。并为帮助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美国从事科研和学习、为促进中美学术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李政道（1926— ），生于上海市。1944—1946年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1946年公费留美，入芝加哥大学，师从世界“原子弹之父”费米教授，从事物理学研究，1950年获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研究，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等处研究和任教，1963年，重回哥伦比亚大学，荣任该校费米讲座物理学教授。李政道对近代物理学特别是粒子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从50年代到70年代，他一直活跃在弱相互作用领域，许多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工作，如二分量中微子理论、弱相互作用的普遍性、中间玻色子理论以及如何从中K介子衰变发现CP破坏等的研究工作，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他最出色的成就便是与杨振宁合作，提出“李—杨假说”，发现了宇称不守恒定理（见

前)。为此与杨振宁一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时，李政道年仅31岁，是历次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第二位最年轻的。他在极化子和非拓扑性孤子强子的孤子模型的可能星体结构方面的研究工作，具有经典意义。量子场论中的“李模型”对以后的场论和整和化研究有很大影响。“KLM定理”的提出，成为分析夸克—胶子相互作用的基本工具之一。“反常核态”概念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真空的认识，推动了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李政道故国情深，为“让高科技在中国生根”，可谓呕心沥血。他早在1972年就参与了商讨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问题，为发展中国高能物理和建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9年积极倡议并努力促成了中美联合招考研究生项目；1985年向邓小平倡议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这就是国内博士后流动站的由来；1986年，争取到意大利的经费，在中科院的支持下，创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并担任主任，每年回国亲自主持各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①他还在浙江大学建立了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在复旦大学建立了李政道实验物理中心。1994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吴健雄（1912—1995），江苏太仓人。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1936年留美，师从物理权威劳伦斯，1946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物理学）博士。二战期间，曾应美国政府之邀从事原子核研究。1944年，她以资深科学家的头衔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直至1980年在该校退休。吴健雄在国际物理界享有“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当代核子物理女王”、“最出色的女实验物理学家”、“中国的居里夫人”等美誉。在40年的科学生涯中，吴健雄对物理科学的卓越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1946年到50年代中期，在 β 衰变方面进行的精密实验，使这方面的理论

^① 参见李希光：《“这是我莫大的荣誉”——李政道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后一席谈》，《科技潮》1994年第8期。

奠定了坚实的实验依据，也使她成为研究 β 衰变的世界权威。二是钴60的实验证实了李政道、杨振宁所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革命性假设。因为她的验证，李、杨二人获1957年诺贝尔奖，大科学家奥本海默认为宇称不守恒定律这一成就有三人贡献最大，即李、杨和吴健雄。三是她领导的实验组，证实了在原子核 β 衰变中向量流守恒的理论。^①这些实验均举世闻名。由于她的卓越成就，她先后荣获了世界各国的荣誉及学位四十多次（项），创造了美国妇女史上的一个又一个辉煌。1972年，她先后当选为美国自然科学协会第一任女性副主席及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女主席，1975年荣获美国授予科学家的最高荣誉——美国国家科学勋章。她执教的哥伦比亚大学为表彰她的贡献，将物理学院研究中心的一部分实验室命名为“吴健雄物理实验室”。吴健雄密切关注着祖国科技和青少年的成长，多次回国讲学，并积极向家乡捐资兴学。

丁肇中（1936— ），是炎黄子孙的第三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祖籍山东，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在祖国大陆和台湾接受了中小学教育后，入美国密执安大学。196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62年获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从1969年至今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1982年至今在欧洲核子研究中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上领导L3实验。丁肇中主要从事实验粒子物理、电子和 u 介子对的物理学、量子电动力学、类光子粒子的产生与衰变以及衰变为电子或 u 介子对的新粒子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他是发现高能物理领域的“J粒子”而闻名世界的。“J粒子”是一种新的、不带电的、比以往发现的新粒子寿命更长的重粒子，他于1974年8月发现，经反复确证，于同年11月正式公布。成为当时物理学界轰动一时的巨大事件，“这一

^① 见广农：《科学的美丽——“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吴健雄》（下），《科技潮》1998年第11期。

发现，使一度沉寂的国际高能物理学界重新活跃起来……给高能物理学的研究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前景，由‘J粒子’提供的线索线路，物理学家们又接连发现了许多类似的新粒子，使人类对物质微观结构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①以至现今许多物理学家常用“J粒子之前”和“J粒子之后”来作为年代的分界。1976年，丁肇中因“J粒子”的发现而登上了诺贝尔物理奖的领奖台。十分难得的是，强烈的华夏情怀使得丁肇中在受奖仪式的即席演讲中打破惯例，坚持用中文致辞，对发展中国的科技发展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丁肇中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支持与帮助可以追溯到1977年，当时，他和中国科学院经过商讨，实现了中美在科技史上的首次大规模合作——由中国科学院选派最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物理学家赴美参加丁肇中领导的高能物理研究工作。此后，他多次回国访问、讲学。

田长霖（1935— ），祖籍湖北黄坡县，成长于战乱时期的武汉与上海。留美后，他克服了种种生活和学习的压力，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曾以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攻下了号称“相对论之父”摇篮的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61年，他年仅26岁就成了美国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最年轻的“杰出教授奖”得主。之后，他又专攻“热物理”，成就斐然。他曾在热辐射、低温技术、反应堆传热和太阳能利用等领域取得许多重大研究成果，为此获得三十多项重要奖励。1975年，他40岁时，便当选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除了突出的科研成就外，田长霖还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1991年，他在258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亚裔大学校长，轰动全美。原本声誉卓著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他的主持下，励精图治，迅猛发展，声望更隆。1998年，当他辞去校长职务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向他亲笔致函致意，称他为教育品质目标中

^① 顾迈南：《炎黄之光》，第108页，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的一名领袖，“对加大和社区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您的成就是美国的珍贵资源，您的名声将在离职后仍流芳百世”。在中美科技交流史上，田长霖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一直非常关注祖国的科技进步，早在“文革”期间，他就克服了重重困难，多次到中国进行学术报告和讲学。1979年，他与其他美籍华裔科学家一起促成开放后首批中国访美学者赴美学习，并亲自写信给每一位中国学者，帮助他们熟悉美国的科研状况和生活环境。此后更是经常回国讲学、主持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他先后被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武汉大学聘为名誉教授。他曾以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百人会总监的身份每年向美国政府提出有关中美科技合作方面的建议。他协调促成了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和中科院共同资助的世界权威科技杂志——美国的《科学》周刊中国服务器在北京大学开通。他还是中国设立工程科学院的积极倡议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田长霖也已经开始与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单位共同研究在传热学领域进行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1994年，田长霖荣获中国工程院首批外籍院士的称号。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对其事业进行了高度评价，指出田长霖是对中国科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国际舞台上享有盛誉的外籍学者，认为田长霖的当选有利于促进中国科学的国际化进程。

朱棣文，1948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1976年获伯克利加州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在斯坦福大学获教授职称。在斯坦福大学供职期间，朱棣文勤于钻研，终于发展了用激光冷却捕获原子的技术。1997年，朱棣文因此项成就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克洛德柯恩·塔努方教授、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威廉·菲利普博士一起，被授予该年度诺贝尔物理奖。激光冷却捕获原子的方法，对于增进对辐射与物质相互作用的了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开启了对气体在低温下的量子物

理进行更深入了解的大门”。^①

崔琦，获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1939年生于河南，1958年赴美深造，196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13年，1982年入普林斯顿大学任物理学教授至今，崔琦的研究方向为薄膜电子特征、半导体微观结构和固体物理学等等。1982年，崔琦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时，和另一科学家施特墨在实验中，发现电子在强磁场、超低温条件下相互作用，能形成具有某种特异性质的量子流体。1983年，美国科学家劳克林对这一发现做出了理论解释。电子量子流体现象的发现是量子物理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它为现代物理学分支中新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许多人体现象的研究也开辟了一条新路。上述三人因此获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3. 化学界的奇才

在国际科学界的化学领域，李远哲是当之无愧的华人代表。

李远哲（1936— ），台湾省新竹市人。1959年6月毕业于台湾大学，并获理学学士学位。1961年获台湾清华大学化学硕士学位。1962年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1965年6月获博士学位。1965—1968年在伯克利劳伦斯实验室和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1968—1974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从1974年至今，一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任教授和系主任。李远哲对待科学研究认真严谨、锲而不舍。他不仅是早熟的天才，而且在实验中有一双精确的手。他在芝加哥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指导老师达霍利·赫希巴赫教授称赞他为“物理化学中的莫扎特”。

一生从事化学研究，李远哲取得了无数骄人的成绩，他曾在

^① 《科技日报》，1997年11月13日。

多原子的红外多光子解离、小分子紫外单光子激光光解碎片动力学、范德华多聚体研究、电子激发态钠原子的反应动力学等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李远哲的主要贡献在分子动力学领域。他曾用量子散射理论证实了在 $F + H(D, HD) \rightarrow HF(DF) + H(D)$ 反应中存在着动力学共振现象。该项研究称得上分子反应动力学领域中理论与实验完美结合的典范，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此外，早在 60 年代，李远哲就注意到了交叉分子束实验中存在的问题，并与导师赫希巴赫教授一起进行开创性的交叉分子束实验。由于他的出色表现，1979 年，李远哲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6 年 3 月，他荣获美国总统授予的国家科学技术奖；4 月，获美国化学会所颁赠的彼得·德拜物理化学奖；10 月，由于在交叉分子束实验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李远哲与其导师、哈佛大学的赫希巴赫教授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波拉尼教授一起获当年的诺贝尔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说，赫希巴赫研究出了一种交叉的分子线束方法，由于采用了这一方法，有了详细研究化学反应的可能。李远哲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把它应用于研究一般反应，特别是研究大分子的反应。波拉尼研究出了红外线化学发光方法，可测定和分析从一个新形成的分子发生的极弱的红外光。他们的研究对化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反应动力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使人们得以详细地了解化学反应是怎样发生的。^①

李远哲热爱科学事业，更“希望在一切可能的地方，为国内的科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② 他多次来国内访问，曾帮助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建立了大型束源转动式分子束激光裂解产物谱仪，为中国微观动力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手段。1986 年，他还指

^① 参见张汉如、吴练达：《李远哲——诺贝尔奖坛上的华裔科学家》，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方文英、方积根：《著名海外华人创业记》，第 96 页，海洋出版社 1990 年版。

导大连生物研究所和北京化学研究所建立了一套分子束实验装置。此外，李远哲对国内人才的培养工作亦关心备至。他时常回国内讲学，并与学生亲切交谈，鼓励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上，为科学献身”。

4. 医学界的杰出代表

在国际医学界，澳大利亚的胸外科专家张任谦和美国的解剖学专家李景昀无疑是海外华人的杰出代表。

张任谦是当今世界的心脏手术权威之一，澳大利亚第一所心脏移植中心的主持者。由于他和他领导的心脏移植小组的杰出成就，英国女王在澳大利亚举行授勋仪式，授予张任谦“爵士”这一当地最高头衔的称号。张任谦 1937 年出生于上海，1952 年随父母定居澳大利亚，1955 年入悉尼大学学医科，先后去英国深造，去美国做研究工作。自 1972 年起，入悉尼圣文特森医院，任心脏外科主治医师。他领导的医疗小组，仅在 80 年代中期，就先后为五十多位严重心脏病患者做了心脏移植手术，使四十多人重新获得了生命。他每年主持的大手术约为 500 例，至 1986 年上半年为止，他先后为 7500 多位心脏病病人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成功率为 99%。由于他的卓越医疗水平，东南亚各国远道前去澳大利亚向他求医的，为数甚多。如 1983 年，由他主持的心脏大手术中，有 112 名病人来自东南亚国家。因张任谦本人高超的医疗水平及他为澳大利亚心脏移植事业发展所做的艰辛努力。澳大利亚已成为当今世界心脏手术一流的国家。作为炎黄子孙，他十分关心中国胸外科手术的发展。1977 年，他正式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出任中国心脏手术发展咨询顾问，每年两次赴中国主持心脏手术医生训练及研讨会，中国心脏手术的飞速发展张任谦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李景昀出生于福建安溪县。1947 年毕业于岭南大学，后留学加拿大，入萨斯喀切温大学医学院，1961 年及 1962 年先后获

哲学博士及医学博士学位。他被美国医学界公认为著名的解剖学专家，神经系统超微解构学的权威。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出色成就，他曾数度被选为全美最佳教授、杰出教授；还担任过纽约布法罗医学史学会主席、美国与加拿大解剖学会主席等重要社会职务并获得了俄克拉荷马大学医学院解剖学终身教授的职业。

5. 建筑工程学界的佼佼者

若论国际建筑工程学界的华人代表，贝聿铭和林同炎是当然的首选。

贝聿铭（1917— ），出生于广州。1935年赴美麻省理工学院进修。1944年到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贝聿铭的建筑理论强调实际和实用，主张建筑艺术美与自然美相结合，传统美与现代美相结合。他一生主持设计无数，杰作累出：华盛顿国家艺术博物馆、肯尼迪图书馆、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等，都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不朽之作。鉴于贝聿铭的杰出贡献，美国建筑学界还将肯尼迪图书馆落成的当年（1979年）称为“贝聿铭年”，并授予他该年度美国建筑学院金质奖。1983年，贝聿铭又获“普利茨卡建筑奖”，从而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个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身在他乡，情系祖国。自1973年第一次故园重游之后，便经常穿梭于中美之间，希望能为祖国的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努力。1983年，他将所得的十万美元“普利茨卡建筑奖”奖金设为中国留学生的讲学基金。他为北京香山饭庄、香港中国银行新厦等“象征中国形象”的设计费尽心血。1984年5月，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演讲时特别提到贝聿铭，他说：“贝聿铭先生的设计为美国城市添了光彩。”

林同炎（1911— ），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25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30年代初赴美深造，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毕业论文《力距分配法》一鸣惊人，被命名为“林式法”，当时林同炎年仅20岁。1946年，林同炎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任教，

从此定居美国。林同炎一生，殊荣不断。1956年，林同炎完成成名作《预应力混凝土》，从此脱颖而出，被美国土木工程学界称为“预应力先生”、“美国预应力的功勋人”。1974年，国际联合预应力协会颁给他“福森尼特”奖章和“弗里叶西聂夫”奖，这是国际工程学界的最高奖，林同炎亦成为欧洲以外获该奖的第一人。1976年，林同炎被授予加州大学“终身荣誉教授”。1979年，又因设计了横跨加利福尼亚美洲河上世界第一座弧形弯桥，被美国科学研究院合办的房屋科学委员会授予“四分之一世纪成就奖”。同年，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将预应力奖改为“林同炎奖”。1986年3月，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授予林同炎国家科学技术奖章。1987年，又获美国顾问工程学会所颁的“1987年度杰出成就奖”。林同炎生于中国，十分眷念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哺育。美国加州大学的“林同炎教授纪念堂”里所挂的林同炎肖像油画，在他本人建议下，将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加州大学的钟塔作为背景，以示中美文化的交融。作为一代建筑大师，林同炎关心中国的发展，时常回国讲学，先后被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多所学校聘为名誉教授。

6. 称雄海外的电脑大王

在美国实业界，王安的名字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位以“电脑大王”之称而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实业家以一己之身创办王安电脑公司，在美国称雄一时。1984年9月的第一期《福布斯》杂志，发表了接连第三年的“美国400名最富有的人物”名单，王安排名第八。这以后，王安的名字便常出现于美国最大富翁排行榜上，虽然名次或有先后，但王安的成就却早已为世人瞩目。美国舆论界甚至惊叹，一个“电脑王国”已经崛起。

王安祖籍江苏昆山，1920年出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4年受资源委员会选派赴美深造，入哈佛大学攻读应用物理学，并获博士学位。1951年王安走出象牙塔，以

拓荒者的精神，独立经营个人实验室，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电脑事业。他凭着自己的才气与努力，很快在同行中脱颖而出。到1986年，王安的电脑公司已跻身于美国电脑业十强之列，营业额达21.5亿美元，拥有3万员工，在全世界103个国家设立了540个办事处，产品遍及美国2000家最大公司中的80%。王安公司不断创新，推出多项高科技产品，从而推动了美国电脑业的发展。王安在事业上的杰出成就为他赢得多项荣誉。1985年，王安获美国电子协会颁发的最高成功奖。1986年7月4日纽约自由女神100周年纪念仪式中，王安被选为全美最杰出的12位移民之一，接受了里根总统颁发的“自由奖章”。1988年，王安因发明磁线记忆圈而获选美国国家发明家名人堂。

事业的巨大成功并未能使王安忘怀故土的一切。几十年来，为祖国的发展尽力始终是王安最大的心愿，他为此也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王安公司研制了世界第一套硬软件齐备的中文电脑，为中国数百个电脑单位提供了电脑技术服务，并投资在大陆创建电脑公司。王安还从捐给哈佛大学的400万美元中，专门拿出100万美元资助该校东亚研究中心研究现代中国的学生。为了表彰他对中美人民友谊及中美科技文化交流的卓越贡献，1984年11月27日，纽约华美协进社向王安颁发了科技企业“青云奖”。

第五章 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留学事业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发展历程。五六十年代，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我国主要是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苏联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这些留学生为新中国科技文化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十年“文革”期间，留学事业中断六年之久，收效甚微。改革开放后，留学事业终于走上正轨，大批公费和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足迹所至，遍及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从1978年至1998年改革开放的20年中，出国留学人数近三十万，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留学热潮。他们广泛吸收了当代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先进科技等优秀文化成果，其中的归国留学生群体已成为跟踪当代国际学术前沿、缩短中西差距、从事跨世纪伟大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接受来华留学生，是当代中国留学教育的明显特点，其历程和出国留学教育一样，“文革”前，主要是接受人民民主国家或亚非拉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文革”中一度停顿。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大量接纳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来华留学生，从1978年至1998年，来华留学生已有25万之多，学习科目也从语言扩及中国历史、哲学、文艺、医学等众多学科。相应地，中国文化也通过这支庞大的来华留学生队伍而在海外得到广泛的传播。总之，由于当代留学生（出国留学学生、来华留学生）队伍的日益壮大，中外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进程大大加快。

一、求学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1. 走出国门

自晚清开创留学教育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主要是向美、英、法、德、日等国家派出留学生，学习其先进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留学局面截然改观。20世纪中叶，众所周知，国际上意识形态领域对垒尖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采取了种种封锁和遏制措施，企图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同时还想方设法截留我国在海外的专家学者和留学生，极力阻挠他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可能再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中国留学西方国家的大门被迫关上。出国留学教育的目光只能投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新中国很快做出了向苏联学习，向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派遣留学生的抉择。

1950年9月6日，新中国第一批25名留学生启程。不过，他们不是被派往苏联学习科技，而是赴波、捷、罗、匈、保等五国学习语言、史地。同年12月，又有10名留学生被派往波、捷两国学习工程。^①直到1951年我国才拉开建国后留苏的序幕，这年8月19日，首批375名留苏生启程，其中有研究生136名。^②从此，留苏成为50年代出国留学的主流，形成了50年代的“留苏热”。如1953年，赴苏联及东欧各国的留学生共675名，其中留苏生583名。至1960年，我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每年少时200多人，多时达2000多人，约占10年中全部派出留学生总数

^① 中央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26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同^①，第45页。

的90%。^① 1959年4月，国家科委、外交部、教育部在北京联合召开的留学生工作会议认为，建国以来留学生的派遣工作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至1953年，“执行严格选拔、宁少勿滥”的方针；1954年至1956年，执行“严格审查、争取多派”和“以理工科为重点兼顾全面需要”的方针；1957年至1958年执行“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学生”的方针。9年共派留学生19000余名，其中91%派往苏联，8%派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生中2/3学工科。^② 这一看法，正确地概括了建国以来留学教育的大致情况。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苏关系破裂，留苏教育也随之走向低谷。自1961年至1965年，每年派往苏联的留学生骤减为几十人乃至几人。^③ 整个留学教育的规模急剧缩小，“二五”计划期间（1958—1962年）我国共派出留学生1670人，国民经济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年）又降为1166人。

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自1957年起，我国也开始向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瑞典、挪威、丹麦等西方国家派出留学生，至1965年初，共派出200名。他们绝大多数学习外语，其中学自然科学者仅21名。^④ 特殊的时代背景不可能使留学教育正常发展。至1966年4月，我国在国外的留学生共1221人，分布在36个国家和地区，学习34种语言和科学技术。^⑤

1966年“文革”开始，是年6月30日，高教部发出通知：因文化大革命运动，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自这

① 中央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45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同①，第244页。

③ 同①，第45页。

④ 同①，第376页。

⑤ 同①，第402页。

一年至 1971 年我国停止选派留学生达六年之久。然而这一时期，正是西方国家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时期，我国却热中于无限夸大的“阶级斗争”，将知识摧残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中西之间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越拉越大。

1972 年，我国恢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首批向英法派遣 36 名，主要是去国外学习语言，其中 16 名留英生学习英语。此后截至 1977 年，我国先后向法国、英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瑞士、比利时等 32 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留学人员 1548 人。其中 93.7% 学习和研究外国语言，6.3% 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① 这些年尽管留学人数远不如“文革”前，在选派和管理上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但留学区域较以往已有所扩大。

1978 年，我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真正迎来了留学事业的春天。1978 年 6 月 23 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这段讲话对新时期的出国留学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出国留学界称为“小平同志关于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② 同年 8 月，教育部根据中央指示发出通知指出，1978 年出国留学生的名额增至 3000 以上，主要学习理、工科（包括农、医）的有关专业。这一年我国共向 28 个国家派出了 480 多名留学人员。^③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1978 年 12 月 26 日，就在中美建交前夕，我国从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选拔出来的 52 名科技骨干启程赴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等中央领导

① 许志怀、关键：《四十年出国留学工作的回顾与思考》，《神州学人》1989 年第 6 期。

② 韦钰：《出国留学工作二十年》，《神州学人》1998 年第 7 期。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 512 页。

人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为他们送行。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首次派出的留美学者，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它充分显示了改革开放的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坚定信心。此后，出国留学人数迅速上升。国人的“留学意识”也大大提高。自费留学生开始出现，而这在以前却是难以想象的。据《中国百科年鉴》1980年卷统计，该年就有3000—4000名自费留学生。自费留学，拓宽了出国留学的渠道，并逐渐取代公派出国留学的主流地位。

由于出国渠道多种多样，自1978年以来出国留学人数的准确数字难以统计，不同的来源有不同的数据。钱宁将1978—1988年十年间出国人数的数字根据不同的来源列表如下：^①

	各类报刊	中国百科年鉴	中国教育年鉴
1978年	480 (公派)	……	……
1979年11月	2230 (公派)		
12月	2700 (公派)	2700—3400 (公派累计)	1750 (公派)
1980年	5192 (公派)	2124 (公派) 3000—4000 (自费)	2124 (公派)
1981年		3416 (公派) 4000—5000 (自费累计)	2922 (公派)
1982年3月	6000 (自费累计)		
6月	12000 (公派累计)		
12月		3410 (公派) 900 (自费)	2326 (公派)
1983年	18500	2001 (公派)	2633 (公派)

^① 钱宁：《留学美国》，第78—7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公派累计)		
	7000		
	(自费累计)		
	25500		
	(总计)		
1984年6月	26000		
	(公派累计)		
	7000		
	(自费累计)		
12月		2938 (公派)	3073 (公派)
1985年7月	29000		
	(公派累计)		
	7800		
	(自费累计)		
12月	38000	4888 (公派)	4888 (公派)
	(总计)		
1986年	6380 (公派)		
	41000		
	(总计)		
	10000		
	(自费累计)		
1987年6月	40000		
	(公费累计)		
	10000		
	(自费累计)		
12月	3000	4703	
	(国家公派)	(国家公派)	
	5000	6569	
	(单位公派)	(单位公派)	
1988年	64000		12527 (公派)
	(公派累计)		
	10000		
	(自费累计)		

可以肯定的是，留学总人数一直在逐年直线上升。1989年更是人数猛增，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到1989年，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人数已达16万多人。^①此后1991年累计数字为17万，1992年为19万，1993年为21万，1995年初为22万。^②

1996年初国家教委公布的权威数字为25万，其中已回来8万多人。在外的16万人中，美国约11万，日本约1.6万，加拿大和德国各约1万，英国约8000人，法、澳、新各约4000人。16万人中，公派约4万，自费约12万。^③

1998年上半年，教育部副部长韦钰撰文称：近二十年来，我国出国人员近30万人，其中国家公派4.7万人，单位公派9万多人，自费出国15万多人。^④

这是一股规模空前的留学大潮，自晚清开创留学教育以来，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踏步地走出国门。改革开放使中国出国留学的规模和强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留学区域上，留学人员广泛分布在世界10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留美最多，留日其次，此外便是加、澳、英、法、德、

① 转见王焕现：《从小溪到洪流》，《神州学人》1998年第6期。

② 数据来源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刊，参见《留学美国》第81页。其中1993年的数据见《雨后初霁话留学——访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神州学人》1994年第1期。同样是国内官方公布的数据，各处却略有差异，如据1993年初国家教委召开的出国留学工作会议称：从1978—1992年14年间，我国共向8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各类留学人员17万多人，其中国家公派3万多人，单位公派7万多人，自费生约7万人。（见《神州学人》1993年第2期《1993年国家教委出国留学计划选派工作会议在天津召开》一文。）据《神州学人》上的数据，则1993年一年间净增留学人员4万余人，这似乎不太可能。待证。

③ 牛人：《留学政策日趋成熟——访国家教委外事司副司长曹国兴》，《神州学人》1996年第1期。

④ 韦钰：《出国留学工作二十年》，《神州学人》1998年第7期。

俄等国。所以有人说：今天，如果你在马尔代夫或伯利兹有幸遇到中国留学生，千万用不着大惊小怪。

在留学科目上，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学科，如理工科的通讯、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材料科学、航天航空等；农林医学科的农学、畜牧、渔业、林学、医学等；文科的文学、艺术、法学、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管理学科的经济学、商业管理和工程管理等。

在留学生层次上，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访问学者、进修学者、交流学者乃至部分中学生，等等。

在经费来源上，有国家公派、单位公派、个人自费、申请奖学金、国外赞助等多种途径。

20年前，“出国留学”尤其去西方国家留学在一般国民心中还是一件难以想象的遥远事情。如今，随着一批批学子如潮水般地涌出国门，“出国留学”已深入千家万户，大街小巷，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出国留学”始终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热门话题，更是莘莘学子们奋力拼搏、梦寐以求的理想和目标。中国人似乎还从来没有因出国呈现出这么大的热情和激情。这从经久不衰、愈考愈烈的“TOEFL（托福）”热和“GRE”热中可见一斑。托福和GRE是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处主办的两门英语考试，其考试成绩是北美两千多所高校衡量是否接受外国考生入学的重要依据。是中国学子尤其自费生欲求学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进门“钥匙”。美国从1981年开始在中国举办托福考试，短短几年报考人数就飞速上升。以北京为例，1981年的首次考试，考生是285人，1985年即为8000人，1986年达18000人。1989年，全国参加托福和GRE考试的人数达4万多人，比1988年同期超出1万多人。由于报考人数激增，从1988年开始，考试的报名成了大问题，为了能拿到一个报名号，人们甚至需要夜间排队。尽管如此，也难以保证如愿。于是又出现了种种跨地报名的奇特现象。如90年代在天

津考区的托福、GRE 考试报名点上,不少北京考生连夜赶来通宵排队的情况已经让人习以为常了。同样,由于考试人数的增多,使考试题目之难已超出了考试本身的范围。尽管如此,考生们的考试分数却越来越高,成绩之高令外国人瞠目结舌。

在改革开放 20 年的留学工作中,我国的留学方针、政策也在反复摸索,认真总结实践的经验教训中稳步前进,日趋完善。

1980 年召开的出国留学人员工作会议强调,要贯彻执行“保证质量,力争多派”的方针,规定了出国留学的大致方向。1986 年,国务院批转了原国家教委《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若干暂时规定》,指出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利用多种形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提出“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选派方针。并首次明确提出公派留学人员要签订《出国留学协议书》,这标志着我国的出国留学政策开始走向成熟。1992 年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需要出发,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进一步理顺了国家为留学提供方便和留学人员为国服务的关系,鼓励和支持在外留学人员“以适当的方式为祖国服务”。这就是在留学界广受欢迎的“十二字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出国留学工作已走向成熟”。^① 1996 年,国家公费留学的选派管理政策又迈出了一大步。从这一年起,对国家公费出国留学实行了“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新办法。取代了过去层层计划分配名额的做法,录取工作实行公开化和平等竞争的原则,派出前录取人员需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出国留学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按规定交纳出国留学保证金。留学人员违约

^① 韦钰:《出国留学工作二十年》,《神州学人》1998 年第 7 期。

者须按协议规定偿还全部资助费用并交纳违约金。新方法实施后深受欢迎，效果明显。国家公费留学人员数量增加，质量也得到了提高。从申报情况来看，1996年为2400人，1997年3500人，1998年达4000人，竞争越来越激烈。截至1998年5月底，公派留学人员按期学成回归率约90%，履约率为100%。^①这一新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公费出国留学工作已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迈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舞台。

自费出国留学作为我国留学生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为国家所关注。国家分别在1980年、1982年、1984年、1986年、1990年和1993年多次发布有关规定，均提出“自费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为了贯彻“十二字方针”，原国家教委于1993年7月发布了《关于自费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大专以上的公费在校生成和公费培养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包括归国华侨等直系或非直系眷属）在国内服务一定年限或偿还高等教育培养费后均可申请自费出国留学。这一规定，结束了以往自费留学政策在紧与松、放与收的怪圈中循环的局面，“标志着自费出国留学已敞开大门，自费出国留学的渠道已彻底放开”。^②

随着留学政策的日趋成熟与完善，加上各种留学机会日益增多，在全世界呼吁和平与发展 and 国内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可以想见，将会有更多的学子们走出国门，拥抱世界，学习先进，开阔视野，从而增添我国改革开放的活力，并有力回应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

2. 留学生涯

出国留学是为了学习外国先进的科技和人文社科文化，这意味着差距，也意味着要想在异国取得理想的成绩，就必须付出更

^① 邵云雁、山水：《何不公费留学去》，《中国教育报》1998年9月15日。

^② 陈可鑫：《留学工作二十年》，《神州学人》1998年第6期。

多的心血和汗水。

五六十年代公费出国的留学生们热情高涨，学好本领建设祖国的心情迫切，在学习体现了忘我的拼搏精神，因而留学生健康问题一度较为严重。1955年，高教部为此专门发出了《关于改善国外留学生健康情况的指示》，批评在外留学生忽视健康的倾向，要求留学生注意营养，加强锻炼，增强体质。^①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留学生刻苦学习的情况。

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去的留学生，似乎还存在着诸多特别的困难：不少留学人员出去时已步入中年，学习的黄金岁月已经过去，加上家庭子女等方面的拖累，很难全身心投入学习中；作为基本交流、学习工具的外语水平普遍不高，亟待尽快补课；由于近三十年的中西隔绝，西方发达国家自由选择、自主学习、专题讨论的学习方式与我们格格不入，难以适应；同样的原因，中西文化（特别是科技文化）差距悬殊，陡然要适应人家的发达水平，去拿人家的学位，困难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而对留学生来说，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中华民族新飞跃的神圣使命感时时激励着他们，使他们深感责任重大；另一方面，十年“文革”所夺去的青春岁月使他们尤感学习机会之不易，学习时间之宝贵。所以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尤其公费生）学习普遍是十分刻苦的。

首批52名留美生之一的陈俊亮教授回忆当年留美生的学习情况时说：“同学们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每天晚上不到12点不回住处，周末也很少出去，而是埋头学习。他们给外国人留下了一个普遍的印象：中国人很勤奋。”^②

从群体到个体，许多留学生为了尽快适应学业，完成学业，留下了一幕幕感人的故事。如：80年代初留学日本新潟大学学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132—133页。

^② 王琪：《首批留美学者忆当年》，《神州学人》1998年第6期。

医的马军，在日两年，每个节假日，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为了不因吃饭耽误更多的时间，快餐面成了他的主食；为了寻找一个分裂细胞，他用嘴对着微细胶管吸，连续八九天，嘴巴吸肿了、出血了，痛得无法说话……回国时，三位送行的日本指导教授在机场上不无感慨地说：“你在日本两年，该吃的没吃到，该玩的没玩到，太遗憾了。”然而，正因如此，马军在学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的论文《慢粒白血病造血干细胞基因重排的研究》，向世人宣告他在国际上首次发现慢粒多功能干细胞存在着白血病的基因重排。这使他开始成为国际血液研究引人注目的人物。^①

80年代初，由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派出的王公慰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他长时间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几乎支撑不住，常常一坐到实验台边就站不起来，回寓所的路上眼冒金星，两腿一软就坐在地上了，还有几次竟昏倒在实验室里。经过如此顽强的拼搏，两年半后，他成为日本北海道地区第一个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②

1986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研究作物生理的谢从华，为了能在规定时段内观测数据和进行操作，曾在田间从早上五点一直干到晚上九点，上厕所的时间就是休息时间；他曾在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八个小时，没有离开一步，导致眼睛严重散光，视力下降；他常在半夜背着设备往植物生长室跑……留学三年，“我没旅游过一次，没进过一次舞场、酒吧，说是‘舞盲’至今还没人相信。连大年三十、正月初一的中国留学生团聚，我也是独自一人在实验室度过”。1989年，他的博士论文受到了主考官们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对包括环境和植物生理等诸方面在内的马铃薯

① 白瑜：《没有文凭的医学专家》，《神州学人》1991年第5期。

② 黄新宪主编：《中国留学教育问题》，第130—13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生理学的一项特殊贡献”，主考官们一致建议授予他博士学位。^①

随着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强，相对来说，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出去的留学生，总体文化素质要比此前出国的留学生明显高一些，年龄也要小一些，他们在异国的学习生活也相对要轻松些。尽管如此，勤奋学习、成绩优良依然是中国留学生明显的群体特征。1992年，驻日本教育参赞巴得年介绍说：“在日本的留学生努力学习，并且在各所大学中反映都是良好的。一位日本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的致词中号召全校师生向中国留学生学习，‘像中国留学生那样勤奋学习，成绩优异’。”“东京大学是日本最著名的大学，1991年博士生的半数以上是中国留学生。”驻澳大利亚参赞谢锡迎说：“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佼佼者，有些实验室几乎都是中国留学生、博士生。”^②不少外国教授对中国留学生刻苦学习的精神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洛杉矶大学一位教授认为，30%的中国留学生非常优秀，60%的中国留学生优秀，仅10%的较差。^③这些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留学生勤学海外的总体风貌。

自费生的学习生活更为艰难，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一面学习，一面还要进行各种形式的打工才能维持学业。80年代初留学日本的女自费生小草在其《留学日本一千天》中描述道，又上学又打工，每天连星期天也在内，除了吃饭和睡觉时间外，再找不出一分钟的空闲。打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十几万自费留学生留学生的一个主要方面。自费生多是倾其积蓄、依靠亲友资助或到处借贷凑到一笔为数不小的资金才得以走出国门的，因此在国外打工挣钱以还债和维持学业便成为自费生打工的两大目标。许多自费

① 谢从华：《上山的路》，《神州学人》1996年第4期。

② 《为有源头活水来——部分驻外教育参赞谈海外留学人员》，《神州学人》1992年第6期。

③ 转见《中国留学教育问题》，第131页。

生尽管有奖学金，但或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或是奖学金中断，也迫使他们不得不走上打工之路。或者边学习边打工，或者利用假期集中打工。还有的自费生因囊中空空只好中断学业，等专门打工挣到一笔钱后再继续求学。有些自费生夫妇常常用轮换打工的方式才得以双双完成学业，即一方先打工供另一方上学，然后再由完成学业的一方挣钱供前此打工的一方上学。更有甚者，个别自费留学生就在这种求生存的打工生活中沉沦下去了，打工谋生成为其生活中惟一的大事，出国前的种种梦想与追求荡然无存。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之所以成为自费生较多的国家，打工赚钱的机会较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留学史上不乏打工求学的先例，但历史上的留学生打工从来没有像今天的留学生那样，打工的地域那么广阔（几乎遍布全世界），种类那么繁多。为了尽快奠定留学的经济基础，再苦、再脏、再累的活，留学生们也愿意去做。“中国留学生所谓的‘打工’，从做家务、看孩子，到收垃圾、抬死人，几乎无所不包。不过，最常见的是在中国餐馆里工作”。在美国，“走进任何一家中餐馆，几乎都能碰到大陆来的男女服务员。一问，不外乎来自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这现象和一些统计数字都表明，这三大城市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留学人员的主要来源地”。^① 由于打工和学习的冲突，80年代一位自费留美生在给国内老师的信中感叹：“使我最头痛的是不能专心读书……暑假里别人休息，我却要全力以赴地去挣钱。在美国，我做过满街跑的送货员、餐馆里的汽车司机和跑堂，做过倒垃圾工、花匠、油漆工、信差、推销员，差一点去擦皮鞋……为了找工作，我经常饿肚子。”^② 这位自费生的打工经历颇有代表性，比较形象地体现了当今许多出国留学学生打工求学的艰辛之路。

① 钱宁：《留学美国》，第177、178页。

② 李小平：《一个留美自费生的叹苦经》，《青年一代》1985年第1期。

由于出国留学在学习上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劳，绝大多数自费生还得为生计到处奔波，加上国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冲突，留学生活并不轻松。因此，当国内民众普遍认为出国留学是去镀金享福时，许多留学人员却不无苦涩地将留学生活戏称为“洋插队”，即比之为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甚至认为“洋插队”比“土插队”还要苦得多。

不过，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当代中国留学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留学这一形式本身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大批留学生走出国门，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文化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传播中华文化，为当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外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众所周知，此前，由于多种原因，西方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是十分片面和有限的，尤其对中国现状的了解还停留在对改革开放前一知半解的认识上。当代中国留学生的文化传播加深了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增添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当代中国留学生在海外传播华夏文化上有如下特点：

一是主动性强，目的明确。如留英学子在1992年的全英中国留学生学联会年会上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作用，做增进友谊的搭桥人，做排忧解难的热心人，做学术交流的带头人，做中华文化的传播人。”^①又如，1989年留日生成立的“中国留学生民族歌舞团”的重要目的就是促进中日文化艺术的交流和中华文化的传播。每年由世界各地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节”、“中国文化日”、“中国文化夜”、“今日中国”等活动也都以弘扬华夏文化为重要目的。

二是传播地域广阔。从东方的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等到西

^① 《为有源头活水来》，《神州学人》1992年第6期。

方的美、加、英、法、德、意、芬兰、挪威等国，都留下了中国留学生集体传播中华文化的足迹。可以说，凡有中国留学生的地方，就有中国留学生传播中国文化的情况。

三是传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举凡中国的书画、戏曲、舞蹈、民歌、工艺、医学、饮食等带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新中国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的成就都有介绍。如1987年8月由美国Syracuse地区留美学学生会在纽约州大交易会上举办的“中国展”内容包括：赠送或出售介绍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书刊和杂志；“Progress in China”照片展出，反映中国新时期以来各个领域的发展和成就、中国人民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播放介绍中国各地风光的录像和民乐演奏；介绍中国中医、针灸和太极拳等传统文化；出售各种小工艺品；为美国朋友起中国名字等。^①又如1992年4月，在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举办的为期一天的“中国文化展览”上，展品有工艺品、中国名菜以及图片、画册、书籍等，并播放了有关录像。^②

四是传播次数较多。《神州学人》杂志曾介绍1993年留英学子在曼彻斯特地区举办的“中国学生文化节”，在阿伯丁全英中国学联合会举办的首次“中华文化节”；1994年英国利兹大学的“中国文化周”，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国际日”上的中国文化活动，日本的“中国文化之日”；1995年奥地利维也纳学联合会组织的“中国文化节”，美国俄勒冈大学留学生主办的“中国文化夜”，美国芝加哥地区留学人员弘扬中国文化的系列活动等。

当代中国留学生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普遍受到所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如1992年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的“中国文化展览”得到了巴基斯坦朋友和该校四十多个

① 章鑫明：《中国学生办“中国展”》，《神州学人》1988年第1期。

② 见《神州学人》1992年第4期封四。

国家留学生的普遍称赞。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被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吸引。诚然，中国留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吸收域外新知，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进行专门的文化传播工作。但毫无疑问，作为中外兼通的强大群体，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传播中国文化的优势，而他们在海外的业绩，也足以证明他们已是当代中国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3. 文化交流中的科学研究

在50年代的“留苏热”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留学大潮中，绝大部分都是理工农医科留学生。许多留学生一旦适应国外的学习环境或完成必修课程后，很快就投入具体的科学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如控制论科学家宋健，50年代留苏期间发表了多篇论文，首次解决了三维空间中的最优控制设计，证明并且实现了他激直流电机的双参数最优控制，建立了双参数最优控制理论。这些论文被他的导师费列德包姆教授收在《最优控制系统理论》一书中。后来，苏联科学院一院士和美国一教授也相继将这些成果写入他们的专著中。宋健所建立的最优控制的等时场理论，使他成为当时国际上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几位学者之一。^① 尽管当时他还不到30岁。

如果说，像宋健这样在留学期间就取得优异的科研成就在“文革”前的留学生中还是少数的话，那么，开放以来的留学生在在学习期间就取得重大的科研成就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在公费留学生中。

材料科学家姚熹教授，1979年留美，其博士学位论文《铌酸锂双晶与多晶陶瓷的介电、压电性质》，出色地“解决了双晶的制备技术，提出了双晶界面上的势垒结构及其原子模型，首次发现了铁电陶瓷中晶粒压电共振现象的明确证据”，成功地证实

^① 顾迈南：《杰出的控制论科学家宋健》，《神州学人》1988年第2期。

了西方科学家三十多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关于铁电陶瓷中的晶粒压电共振效应的设想。从而对高介电系数陶瓷在现代电子系统中的广泛应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意义。该文被选为1982年整个宾州系统材料科学方面的最佳学位论文。并获得被认为是“最崇高”的XESOX研究奖。在此后的博士后研究中，他又取得了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如论文《晶粒压电共振对铌酸锂陶瓷介电频谱的影响》发表后，立刻在国际电子陶瓷学界引起不小的震动。该文使他在1985年荣获美国陶瓷学会罗斯·科芬·珀迪奖，该奖是对世界在陶瓷科技文献方面做出卓越贡献学者的最高奖励。^①

核能专家王大中，1980—1982年赴联邦德国进修期间，选择了“模块式”中小型高温气冷堆的设计和课题。经过一百多个方案的计算、分析、比较，他提出了一种新型堆芯的概念，使反应堆的单堆设计功率提高了一倍。这项设计发明获得联邦德国专利局批准的专利权，并且分别向美、日、苏等国家专利局进行了登记。^②

白春礼，在1985—1987年留美做博士后研究期间，用STM新技术研究二硫化钼的表面结构，获得了二硫化钼表面垂直方向0.1埃和水平方向1埃的高分辨率结构图像。在1987年第二届STM国际会议上，其论文被列为大会报告之一。第二届STM国际会议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白尔德斯楚维勒博士高度评价了白春礼的研究工作，认为他不仅在实验仪器的研制上，而且对计算机控制的仪器操作，数据采集、结果分析等软件编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③

还有众多的中国学于在留学期间创造了世界科技研究的“首

① 张光强：《责任与使命——记材料科学家姚熹教授》，《神州学人》1990年第2期。

② 马树泉：《核能专家王大中》，《神州学人》1990年第3期。

③ 《神州学人》1988年第3期。

次”或“第一”的优异成绩。如1983—1987年留美的陈章良，1985年首次宣布采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将大豆蛋白基因成功地转移到矮牵牛（茄科植物）上，并使大豆蛋白基因在矮牵牛种子中得到表达，受到国际生物学界的广泛注意。^①1987年，他发现并证明调控植物胚胎发育的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存在及其功能，这一成果被国际同行誉为“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中的里程碑”。^②又如旭日干，在1982—1984年留日进修期间，专攻家畜繁殖生物学的研究，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山羊、绵羊卵子体外受精”研究，把12个山羊体外受精卵分别移植到五只母山羊体内，结果有一只母山羊受胎成功，并于1984年3月9日顺利产羔，实验成功世界上第一胎“试管山羊”。^③

还有中国学子在留学期间因其优秀的科研成果而获得世界性大奖。如1986年公派留学比利时的许崇育，在比期间，荣获了世界气象组织第45届执委会组织的1993年度“世界气象组织青年科学家奖”。当时竞争此奖的有一百余人，许独领桂冠，“成为获此殊荣的首位华人”。其参赛论文《水量平衡模型及其在不同气候区的应用》提出的“水量平衡模型”，经比利时、缅甸、中国等许多河流流域的实践检验，证明该模型结构简单、概念清楚、精确度高、应用方便，对研究区域水资源及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有重要的价值。其导师范德威勒说：“许的高水平的论文是他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晶，受此奖励，他当之无愧。”^④

有些中国学子在留学期间就以杰出的科研成就而跻身国际学术领头人或创始人的行列。如中科院遥感所研究员李小文，1985年留美期间，在《IEEE 地球科学与遥感汇刊》上发表《针叶林

① 《神州学人》1988年第1期。

② 杨亚南：《爱我所爱，无怨无悔》，《神州学人》1992年第2期。

③ 《神州学人》1992年第2期。

④ 同③。

冠层的几何光学模型》一文，指出了重要的四分量模型，找到了比辐射传输模型对遥感观测中的“热点效应”更圆满的物理解释，为创建植被遥感模型研究的几何光学学派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一成果也标志着当前国际遥感基础研究三大学派中“李—Strahler 几何光学学派”（李小文为主要创始人）的诞生。^①中国科学院系统所研究员郭雷出国前，其成就即已引人瞩目，1987年被派往国际控制研究中心之一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系统工程系，做博士后研究。两年间，他刻苦钻研，连续攻克一系列国际难题，发表了数十篇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被国际科技界誉为“在随机适应控制领域，是国际上六个学术领路人之一，而且比其他五个人毫不逊色”、“郭的工作绝对是世界级的”、“无论在当今世界何处，郭博士都是有才华和创造力的年轻学者”。^②南开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永川，1987年留学麻省理工学院，留学期间，他在美国最高级别的刊物《美国科学院通讯》上发表了题为《树的指数》一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反响甚大。树的结构在计算机科学中经常出现，而计数问题一直是组合数学中的中心问题之一。许多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乃至生物学家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陈的方法使以前能写成一本书的内容可以在二三百页以内表达清楚。他的导师、世界著名数学大师罗塔（Rota）教授认为，“此文统一了许多已知结果，并使一些难题迎刃而解。这一算法已引起广泛重视，被认为是一项权威性的工作”。由于陈在留学期间的突出成就，毕业时，他被认为已跻身“在科学研究中具有杰出领导作用”的青年科学家行列。^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子在留学期间取得了多少科研成果，

① 参见《神州学人》1997年第1期。

② 柏林：《于无声处听惊雷——记中国科学院系统研究所研究员郭雷》，《神州学人》1993年第11期。

③ 姜金花：《青年数学家陈永川学成归国》，《神州学人》1994年第6期。

似乎还没有一个大致的统计数据。但毫无疑问，他们所取得的大量的、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是中国留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这除了新时期留学队伍规模宏大之外，还有其内在的原因：

80年代初期，中国派出的留学人员大多以中年访问学者为主。如首批赴美的52名留学人员中，不少人是副研究员、讲师、工程师和主治医师，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49岁，平均年龄41岁。据美国人境签证的统计，1979—1982年，在中国派到美国的5593名访问学者中，年龄在40到49之间的，占60%—66%；50岁以上的，除1979年外，另占20%左右。他们大都是国内各大学和科技研究机构的骨干，其中有些在此前就有留学苏联、东欧等国的经历，打下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可以说“这些访问学者中聚集着中国中年一代的精华”。^①他们经验丰富，具有扎实的科研基础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在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下，获得成功的概率自然很高。尽管这一时期攻读学位的人数远少于访问学者的人数，事实上，有不少访问学者后来都转成了攻读学位的留学生，延长了留学年限，增加了做出科研成果的机会。如韦钰、姚熹等即属于这种情况。此后，虽然公派留学生的年龄要年轻得多，但随着国内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年轻留学生的自身素质大为提高，远非昔日同龄人可比，同样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

在留学政策上，“保证质量”一直是公派留学的派出方针，留学人员的总体素质越来越高。1978—1983年出国留学的具体政策为：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保证质量，力争多派。派出人员以进修生为主，其间也派出一定数量的大学生。1983—1986年，着重增加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并加快派出速度，同时开始中外合作培养博士和试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制度。1986—1989年，出国留学

^① 参见《留学美国》，第143、147页。

方针是：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着重派出进修人员、访问学者，一般不派大学生，访问学者比例提高。自1991年起，采用“限额申报，专家评议，择优录取”的办法，国家公费出国留学以选派访问学者和高级访问学者为主。1996年，开始实行“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国家公派留学选派新办法，给更多有真才实学的学子们以公平竞争的机会，从而使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文化素质进一步提高。如1996年国家选派的1399人中，高级访问学者占28%，访问学者占72%，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占67%，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占68%。1997年选派的1818人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者约占60%，具有硕士学位以上学历者约占72%。^①1998年国家公派1709人，其中高级访问学者占26%，访问学者占74%；具有副高以上职称人员占66%，具有硕士学位以上学历者占76%。这当中，有部分人是第二次走出国门。单位公派留学人员素质也越来越高，竞争也越来越公平。

进入90年代，自费留学人员的数量增长加快，高层次人员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据统计，北京地区具有大专以上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人员，以年均20%的增幅逐年递增，其中，硕士以上学历申请人数年均增长率为20.5%，博士学历人数平均增长率约为78.3%，同时，出国做博士后研究的申请人员也在以较快速度增加。90年代后期，一些国家还开始重点吸引中国名牌大学的优秀本科毕业生到其国家进行较长时间的再培养，并把这当成争夺一流科技人才的战略性措施。^②

留学人员质量的提高，在国外优越的学术环境中，自然能产生更多的科研成果。许许多多的归国留学生正是因为是在留学期间，利用国外良好的科研条件，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取得了一定

① 参见陈可森：《留学工作二十年》，《神州学人》1998年第6期。

② 王焕现：《面向未来的留学》，《神州学人》1998年第9期。

的科研成果，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故而得以在归国后为国内的科技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并成为所在单位的重要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

4. 赤子之心

爱国主义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结，是中华民族也是中国留学生的优良传统。在曲折坎坷的近现代留学史上，每当祖国受到侵略，面临危机时，海外留学生总会掀起归国御侮或利用各种形式在海外间接报国的高潮。如今，时代不同了，当代中国日益强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早已不再任人欺凌。在这种情况下，也许留学生的爱国情怀体现得并不像早年那么明显，但爱国主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身处海外，关注祖国，心向祖国依然是当代绝大多数海外留学生的共同特点。正如1993年在日留学人员致全世界中国留学人员的倡议书中所说的那样，“离开了母亲，方感悟母亲的养育深恩；身处异国，方更珍惜家乡的圆月清辉。乡音乡情，是我们海外学子的共同思绪；爱国爱乡，是我们海外学子的共同心声。每当祖国取得成绩时，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之欢欣鼓舞；每当祖国遇到困难时，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之焦虑揪心”。^① 深情的话语准确地表述了当代中国留学生共同的赤子之心、华夏情怀。一旦祖国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海外中国学子便会毫不犹豫地奉献出一片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留学生炽热爱国的整体风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次遭受水、旱等自然灾害的袭击。每次当国内发生自然灾害时，“倾囊中所有，尽微薄之力。援助受灾人，是义不容辞”便成了海外留学生的一致心声。如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发生后，“从大洋彼岸到莱茵河畔，从罗

^① 《让中国走向世界 把世界带进中国——在日留学人员致全世界中国留学人员的倡议书》，《神州学人》1993年第1期。

马到堪培拉，分布在世界各地和各地区的中国留学人员，无不关注着大兴安岭的灾情，他们个个募捐救灾，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加拿大留学人员在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中写道：“烈火无情，儿女有情。火烧在祖国东北大地，却深深灼痛着海外学子之心。”当时正在加拿大访问的国家领导人杨尚昆接过慰问信及捐款时，深情地说：“这番心意很重啊！”^① 1991年夏，安徽、江苏等地遭受特大洪水灾害的消息传到国外后，七八月间，海外学子的一笔笔赈灾款、一封封慰问电源源不断地从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寄到国内。在法国，在全法学联的倡导下，短短两周内，就捐出了106242.70法郎。在加拿大，还有不少大学的校联会将国内灾情材料向加拿大朋友广泛散发，吁请他们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为中国灾区灾民捐款。所捐款项，有的是学子们省吃俭用挤出来的，有的是自费生辛苦打工挣来的，有的是种种义演、义卖、募捐得来的。在荷兰，一位留学生写了一个募捐牌子，利用星期六休息时间，一个人到教堂周围转了一天，向游人募得190.8荷兰盾，然后加上自己的钱，凑足300荷兰盾后，交到使馆教育处。在捐款信后，他只写了“中国留学生”五个字。^② 1998年夏，祖国的南方、北方同时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引起世界各地留学人员的深切关注，他们纷纷尽己所能献上自己的一片赤子之心，以支援祖国抗洪救灾。在日本，9月10日，京都地区留学人员的第一批捐款40万日元汇往国内，神户地区留学生的30万日元寄往国内。日本其他各地留学生的捐款也非常踊跃，如截至9月10日，大阪管区共收到留学人员捐款1874342日元。在朝鲜，截至9月10日，中国留学生共捐款折合

① 王俞：《祖国，高于一切，大于一切——记我海外学子为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募捐救灾活动》，《神州学人》1987年第3期。

② 参见《拳拳赤子心 悠悠爱国情——记海外学子赈灾捐款活动》，《神州学人》1991年第5期。

人民币2万余元。在法国，截至9月8日，各方留学人员共捐款96784.45法郎。在英国，截至9月3日，留英学子共捐款15000英镑。在意大利，全体留学人员共捐款613万里拉。在荷兰，留荷学子及其家属为灾区的孩子们捐款27200荷兰盾。在丹麦，截至9月3日，共捐1万丹麦克郎。在美国，许多留学人员及家属在通过不同渠道向灾区捐款后，又一次为灾区的孩子们的学业积极捐款。在瑞士、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①

国内的“希望工程”也同样得到海外学子们的大力支持，为“希望工程”捐款，在海外学子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留日学子表现得尤为突出。自从“希望工程”活动开展以来，留日学子纷纷行动起来献上自己的一片爱心。1993年，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向全体留日学子发出了开展“献东瀛学子之爱心，筑希望工程之未来——百县助百校”希望工程奉献活动的倡议；名古屋工业大学学友会为支持“希望工程”，成立了学友会“希望工程”活动委员会并在日本率先提出“为孩子们打一天工”的口号，在倡议书上，他们深情地写道：“为孩子们打一天工，也许这一天的劳动非常辛苦、劳累而又枯燥，但无论这一天的收入多少，能帮助一名或两名失学儿童，不都是尽了我们一份力量吗？只要一想到这一天的劳动可以使一个孩子重返课堂，也可能从此改变他们的人生，难道这不是有意义的一天吗？挽救一个流生就是挽救一个未来；保住一个在校生，就是保住一个希望。”到1994年，他们已筹集25万日元支持宁夏的“希望工程”事业；在东京地区的中国留学生学友会成立了“希望工程”指导小组，并以“为了美好的明天，共筑希望工程”为题，号召东京地区的留日学子为“希望工程”奉献爱心。^②1996年，是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一百周年的纪念年，有人发起用募捐的方式在中国的贫

① 王焕现：《重洋难隔赤子心》，《神州学人》1998年第10期。

② 《神州学人》1995年第2期。

困地区建一所“留日百年纪念小学”，这一倡议得到了留日学子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最终募集到的数目高达500万日元。1997年3月11日，这所“留日百年纪念小学”在河南省登封市君召乡君召村正式诞生。该校占地十余亩，能容纳250名儿童入学。据统计，自“希望工程”开展以来截至1997年，仅在日本的中国留学人员已在我国河北、河南、陕西、青海等地捐资建起了数所希望小学。^①

在海外进行的各类国际体育大赛中，也总会看到众多当地中国留学生积极为中国健儿摇旗呐喊、辛勤服务的举动。如为迎接1996年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第26届奥运会，当地的中国留学人员成立了以留学生为主体、有数千人参加的“96奥运中国后援会”。奥运会期间，后援会负责人、留学人员杨学峰、洪曙光、曹平、刘刚等身先士卒，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在他们的带动下，近5000名后援会会员凭着一份赤子情、一颗中国心，忘我地辛勤工作。在短短的17天中，后援会举办了600多人参加的“欢迎中国体育代表团招待会”、700多人参加的大型“联欢文艺晚会”，组织了180人的义务车队，出动了4000人次为运动员助威呐喊，发放国旗4000余面、T恤衫3000多件，为运动员和记者提供车辆百余次、输送食品100多盒（袋），设立两部热线电话，提供导游、购物、信息服务，等等。为中国奥运健儿赛出好成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体委和中国奥委会在给后援会的感谢电中，高度评价了后援会的辛勤工作，认为“代表团取得的成绩，也融进了你们的心意和汗水”。^②

许多留学生在留学生涯中，都既深切感受到中外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但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祖国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要，

^① 邵云雁：《留日学子捐建“留日百年希望小学”》，《神州学人》1997年第5期。

^② 谭欣：《赤子情、中国心》，《神州学人》1996年第10期。

祖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成为激励他们刻苦学习的强大动力，祖国的落后也更加激起了他们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一片深情。这种深情曾明确地写进了许多学子的学位论文中：留学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学院的陈克彰在他的博士论文《气流纺纱的最优化设计》（1984年）的扉页上，印上了一行滚烫的大字“献给我亲爱的祖国”；留学巴黎第五大学药学院的林瑞超同样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药用植物深绿卷柏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扉页上，印着“献给我的祖国”六个醒目的大字；^①留学荷兰原子分子物理研究所的王忠烈，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设计了一个含义深远的封面——在淡蓝色的封面上印着象征中华民族的万里长城的照片，扉页上又分别用中文、荷兰文和英文端正地写着“献给祖国”四个大字。^②

学成回国是中国留学生的传统，也曾经是衡量出国留学人员是否爱国的一个重要标准。在当代中国留学教育中，五六十年代出国留学人员的回归率是相当高的，在向苏联派遣的八千多名留学生中，回归率达95%以上。这与国家公派留学特别注重留学人员的政治思想素质不无关系。留学人员经过层层推选，优中择优，派出人员都有一种光荣感和历史责任感，报效祖国的愿望十分强烈。

改革开放以来20年间，留学生的回归率则要复杂些。大致说来，前十年比后十年的回归率要高一些，公费生比自费生的回归率要高得多。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88年底，我国共派出74000名留学人员（其中公派61000，自费10000），而1978年以后的回国人数为32600人，排除1978年以前派出人员的回归数（不会超过1000），则前十年的回归率在40%以上。事实

^① 分别见《神州学人》1988年第1期第42页、1990年第11期第7页。

^② 梁建中、蔡小江编：《当代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第93、94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

上，还应排除尚未完成学业的留学人员。如果以1986年累计留学人员51000人来算的话，回归率当在50%以上。到1997年底，我国20年间派出总数近30万，而总计回国人员只有96000人，显而易见，后十年的回归率要低得多。在前十年中，多数留学生都是从“文革”中走过的一代，年龄较大，政治上相对成熟，尤其对公派留学生来说，国家在当时经济还较为困难的条件下，拿出大笔资金派出留学人员很不容易，留学机会尤为难得，学子们的责任感强烈，学成回国在学子们心中多是一件无须思索的自然事情。正如首批留美生之一陈俊亮所说的那样，在美留学期间，他从未有过留在美国不回的念头，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回国为祖国做贡献，而且这想法十分强烈。这种朴实的爱国之情在前十年的留学人员中是较为常见的。

1988年自费生累计才10000人，远少于公费生。而到1997年则已高达15.4万人，超过了12万公费生的总数。在回国的96000人中，公费回国者9万人，自费生回国者才6000人。显然，大批自费生学成不归是后十年的回归率大为降低的主要原因。毋庸讳言，国外的高薪收入、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又是导致大部分留学人员学成不归的关键原因。

由于国内发展的前景美好、科研条件和创业环境的改善、国家对归国人员的高度重视等原因，1993年以来，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不断增加，每年以13%以上的比率上升。据有关部门统计，1995年全国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超过5000人，1996年有增无减，其中获博士学位的归来者明显增加，在专业领域科研中获突出成就的明显增加，放弃国外永久居住权的明显增加。^①1996年，留美学子颜光美率八名海外学子团体回国的举动，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外学子放弃国外优越生活、扎根国内的新趋向。颜光美原系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教师，作为荣誉性奖学金福格地国际

^① 《神州学人》1997年第1期。

奖学金的学者来到美国，在美五六年，确立了其在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地位。当母校希望他回国效力，并尽量给他提供用武之地时，颜光美怀着建设祖国的强烈责任感和祖国既是成长之地也必是用武之地的坚定信念，最终决定回国，并设想邀集一批海外学子赴母校共创事业。他的设想很快得到了一批学子的积极响应，先后有来自北美各地甚至欧洲的二十多位海外学子表示愿意加入他的行列，他的最先支持者顾军意气风发地说：“我历来认为，要做事，只有回到中国去！”颜光美最后挑选了顾军（北京大学博士，留美七年，在美国国立卫生院做到副研究员职位）、陈发凯（中山医科大学博士，美国俄亥俄大学高级科学家）、曾益新（中山医科大学博士，曾留日两年，后任美国宾州大学副研究员）等八人。1996年，颜光美回国团体先后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安家落户。^①

必须指出的是，对许多留学生来说，学成不归有其特殊的原因：如所学专业在国内属于冷门，不受重视或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所从事前沿课题国内无法提供相应科研设施，无法获得必要科研信息；国内一些地方论资排辈的现象严重；职称、住房、分居两地、子女就读等问题难以解决；甚至还有在国内求职无门的情况，等等。在这里，经济原因并非惟一原因乃至重要原因。对于绝大多数海外学子来说，身在海外，心系华夏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希望祖国的繁荣富强更是他们的共同心声。这不只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结，也在于海外学子们十分清楚“在世界的沧海里搏风击浪，我们更深知，只有祖国的强大，才有我们个人的前途和自尊”。尽管一批学子学成不归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学成不归并不意味着海外学子不爱祖国，在他们内心深处，都是希望能为祖国多做一些事情的。变“回国服务”为利用

^① 见杨亚南：《共踏归途——颜光美回国团体纪事》，《神州学人》1997年第2期。

各种形式的“为国服务”，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成未归的海外留学生热爱祖国的明显体现和趋势。

海外学子具有信息、技术、资金、关系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是国家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和可贵资源。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各部门和单位就纷纷制定了种种政策，采取了许多措施，为海外学子“为国服务”提供便利条件。1997 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适当的方式为祖国服务。“为国服务”这一爱国方式，得到了许多海外学子们的热烈响应。通过这一方式，许多在外留学人员为国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为国内建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不少人短期回国进行了成功的合作，开发高科技产业及拓展国际市场；有的则在为国内科研人员出国留学、联合培养留学生方面做出了重要努力，等等。据统计，留学人员“为国服务”的形式现已达十几种，皆为祖国建设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如 1997 年留法学者支持祖国西部建设的活动，就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社会反响甚好。这年七八月，18 位在法工作的留法博士和 7 位已回国的留法博士会聚一起，分为农业、医药、生物化学和基础研究与高新技术 4 个小组，深入到甘肃省的七十多个部门和单位及定西、榆中等贫困地区，围绕干旱农业、品种改良、沙漠地质、石油化工、生物医药、核能应用研究等方面，对甘肃科技、经济有影响的公关项目进行了对口交流，开展咨询服务，洽谈合作，共拟定 56 份合作研究与开发项目和 2 项重要建议书。在这些项目中，既有我国西部地区十分重要的高科技项目，也有对当地农业发展、农民致富十分需要的项目。此外，留法学者还为近千人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报告会和专题讲座，与甘肃方面就合作培养研究生、回国讲学等达成合作意向。留法学者在这次活动中，几乎天天工作到深夜，许多人累病了仍坚持工作，整个活动期间没有安排一次观光活动，充分体现了一种踏踏实实为祖国办实事的高尚情怀。正如巴黎第七大学副教授范波涛博士

所说：“经过这些天的工作，我们有一种共同的感受，人来心也来，人走心不走……更重要的是为这里的人民做了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①

“哑铃”模式或“两个基地”模式，是90年代以来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的重要方式。“哑铃”模式即国外为一端，国内为一端，中外学者穿插其间的合作模式。这一模式，由已在美国西方储备大学肿瘤研究中心取得世界公认成就的郭亚军博士（1989年赴美留学，后留在美国）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成功合作而著称。1994年5月，由双方合作的东方肝胆外科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由郭亚军任主任，双方联合研究“肝脏癌免疫治疗”，获重大突破，“开启了免疫系统防治癌症的大门”。此外，郭亚军还促成了中科院生化所与美国麻省总医院的合作研究，并在第二军医大学、第一军医大学和广西医科大学建立了基地。郭亚军所选择的适合中美双方的研究项目和方式——基础研究在美国，临床研究在我国——使得中美专家保持着经常、有效的来往与交流。他还先后从国内研究基地邀请数名学术骨干，带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课题到美国工作。这样，既出了成果又培养了高级人才。又如在世界银行研究部任研究员的邹恒甫博士，深感中国在金融管理方面的落后，决心为祖国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出力。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及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他于1994年在武汉大学创办了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并被聘为主任。他每年回国几个月，自编教材，亲自授课，讲学内容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九五”重大项目“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及金融管理”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90年代中后期以来，采用“哑铃”模式“为国服务”的海外学子越来越多，在信息、能源、交通、材料、环保、制造、农业和生物技术及经济、法律等领域，有力地推动

^① 见韦钰：《出国留学工作20年》及《神州学人》1997年第8期第12页。

了与国外的合作与交流，成就斐然。^①

尽管到目前为止，海外学子“为国服务”尚未形成一股有广泛实效的热潮，但“为国服务”的海外学子越来越多、“为国服务”的成绩越来越大的趋势却是显而易见的。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由于国内创业环境的日益改善和 21 世纪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等原因，直接“回国服务”的海外学子越来越多。许多工作在外的海外学人并没有居留海外的长期打算，出于种种考虑，只是暂时留在海外，等待回国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会毅然“回国服务”的。他们的赤子之心正如 1994 年“美国总统教授奖”获得者之一、美国密歇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研究中心主任倪军教授（1982 年赴美，1987 年获威斯康星大学博士）所说的那样：“我还是要回来的！不管我现在在哪个国家，持哪一国护照，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祖籍是中国。”^②

二、留学生与中国科学技术的璀璨

留学生是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骨干力量，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派出三十多万留学人员，学成回国者已达十几万，其中大多从事科技研究。他们在海外吸收了丰富的先进科技知识、前沿信息，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科研基础。他们回国后，立足国情，勤勤恳恳，艰苦创业，或献身教育，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填补了国内一些学科和专业的空白，创建了一些新学科、新专业；或献身科研，创造出大批优秀的科研成果，其中许多成果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先进

^① 参见方兴：《哑铃模式》，汤锡芳：《“两个基地”——海外学者为国服务的新模式》，王焕现：《无愧于时代的当代留学生》。分别见《神州学人》1996 年第 8 期、1997 年第 1 期、1998 年第 8 期。

^② 陈伟源：《旅美倪军手捧“美国总统教授奖”》，《国际人才交流》1998 年第 7 期。

水平，有的甚至超过了国际一流水平。毫不夸张地说，当代归国留学群体不但成就斐然而且已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中坚力量。

1990年，国家人事部的抽样调查表明：从1949年后首批留学人员于1953年学成回国至1988年底，我国回国留学人员共42000余人，从事科研工作的约33200人，其中21700多人获得了科技成果奖。他们之中，获国际奖的270人，获奖近500项；获国家级奖的3900人，获奖5000余项；获省部级奖的11500人，获奖20500余项；另有近6000人获其他成果奖33000余项；有1500余人获得过专利2200余项；有33800人在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4000多篇，并有16200余人出版专著、译著40300多部。^①

1990年11月，国家教委等单位举办了“首届全国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成果展览会”，展出了建国后派出的留学回国人员的科技成果，其整体水平堪称一流。在全部参展项目中，获国际奖的19项；获国家级奖的560多项，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奖的约130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近290项，获国家发明奖的100多项；此外，还有近1300项获省、部级奖。^②

1986年开始实施的“863”计划是中国的高科技发展计划，该计划的成就代表着当代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留学人员在“863”计划中的阵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在中国科技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早在“863”计划实施初期，就有许多优秀归国留学人员参与其中，不少人还承担着重要的领导工作。在首批“863”计划各领域的首席科学家、专家委员会成员、主题专家组成员中，有留苏博士侯云德，留苏、留美学者周炳琨，留德博士王大中，留美博士李国杰、陈章良、黄伯云，留英博士李未，留法博士马颂德，留丹麦博士严隽琪等一大批管理和技术骨干。

① 《全国留学回国人员状况及其成就》，《神州学人》1990年第4期。

② 肖扬：《全国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成果展巡礼》，《神州学人》1991年第1期。

“863”计划7个领域的首批8位首席科学家中，出国留学者5人，占62.5%；曾出国访问或进修1年以上者1人，占12.5%。7个领域的专家委员会共有55名成员，其中出国留学者13人，占23.6%；曾出国访问或进修1年以上者18人，占32.8%。在15个高技术主题专家组中，共有成员107名，其中出国留学者21人，占19.7%；曾出国访问或进修1年以上者53人，占49.5%。^①具体言之，1990年“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成员和专家组长共有14人，其中除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的一位专家外，从首席科学家侯云德到最年轻的陈章良，均有留学经历（或为留学博士，或为访问学者），在同年的自动化领域中，专家委员会成员和专家组长共9人，其中6人有留学经历（博士、访问学者或交流学者）。^②在“863”计划10周年成果汇报展期间，连任三届信息技术领域光电子主题专家组组长的周炳琨介绍道，光电子主题组前后参加者700多人，分布全国各地，大多数课题负责人或骨干是留学回国人员。一些重大的科研成果如DFB激光器、量子阱激光器等，其主要完成者几乎全部是留学回国人员。^③

有人统计，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中，开放后派出的回国留学人员已占较大比例，工程院尤其突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工程技术科学界的最高学术称号，在1995年的308名工程院院士中，有留学经历的144人，占46.8%，其中许多为五六十年代的出国留学生；到1998年，回国留学人员在工程院院士中的比例已上升到50%以上。^④

① 朱丽兰：《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实施顺利》，《神州学人》1989年第2期。

② 文中两领域专家具体情况参见《神州学人》1990年第6期第14页，1991年第1期第30页。

③ 许珑：《中国高技术发展的丰碑》，《神州学人》1996年第6期。

④ 参见许珑《历史·现实·未来——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光亚院士》，《神州学人》1996年第2期；韦钰《出国留学工作二十年》。

到1997年，改革开放以来出去的留学人员回国人数已达十余万，这是一支令人振奋的科技生力军。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当代中国留学生还只是我国科技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的话（那时，科技界的核心人物多为解放前出去的归国留学生），那么，今天当代归国留学生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科技发展的核心力量。正是由于有他们所起到的主体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发展迅速，成果辉煌，中外科技差距大大缩小，中国科技力量越来越引人瞩目。

由于留学生的科研成果众多，涉及领域广泛，这里不可能一一详述，下面仅对当代中国留学人员在科技发展中的成就，分几个领域，选几个代表做一简单勾勒，以见其科技成就之一斑。

1. 数 学

南开大学数学所的陈永川，1987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91年以优异成绩获博士学位。由于他被认为已进入“在科学研究中具有杰出领导作用”的青年科学家行列，因此一毕业就被研制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聘用，并被授予“奥本海默研究员”的称号，这是目前获此殊荣的惟一数学家。1994年，陈永川为实现自己“一定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组合数学基地”的愿望，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在国际著名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创办的南开数学所，专门从事组合数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几年来，在组合数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如代数组合、组合矩阵、图论、网络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陈永川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国际数学界的重视。1996年，他与世界最大的科技出版社——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合作，创办了国内第一份国际数学杂志《组合年刊》，并任执行编委，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7年，他主持建立了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并任中心主任，荟萃了国内外数学界的一批年轻的优秀人才，带起了一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队伍。该

中心与世界上主要的数学学术团体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Berkeley 数学研究所、麻省理工学院等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同世界科技前沿保持密切的接触。他还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进行技术开发。目前，陈永川已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1995年，他被国际数学杂志《图论与组合》聘为编委。1996年被美国应用数学权威杂志《应用数学进展》聘为编委。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著名学者詹姆斯·劳克（James Louck）曾这样概括了陈永川的三个特征：“在学术研究中的天赋，对科学进步的追求和投入，在国际学术活动中所显示出的颇具感染力的领导者的作用。”这些特征正是一个成熟的青年科学家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有所创新的必要素质。由于陈永川的杰出贡献，1994年他荣获首届中国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基金奖；同年，获美国李氏基金会学术成就奖；1996年，获得中国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7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中科院数学所的袁亚湘（1986年毕业于剑桥大学），是国内外知名的优化、规划学科学家。留学期间就先后有16篇具有世界水平的论文发表在国际数学杂志上。1986年，他在国际数值最优化及其应用会议上的报告“约束优化的一个算法”，引起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竞相邀请他去进行学术交流。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王诗晟（1988年毕业于加州大学数学系），在三维流形拓扑的研究中做出了出色的成就。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肖刚（留法博士）则是国内外公认的代数曲面专家，是国内代数几何学方面的学科带头人。

2. 物理学

清华大学的周炳琨（1960年留苏，1983年留美），是中国激光研究的第一人。他主持研制的“半导体激光列阵泵浦钇铝石榴石激光器”开创了固体激光器的一个新领域；“钇铝石固体激光器”成为80年代前期世界上效率最高、线宽最窄、频率最稳的

激光器；他主持和指导研制的窄线宽可调谐半导体外腔激光器、光纤高温传感器、光纤激光器和放大器以及超短脉冲半导体激光器等，均达国际先进水平。中科院物理所的赵忠贤（1974年留英），是国内超导体方面的权威之一。1986年12月，他领导的超导研究组获得了超导转变温度48.6K的铋镧铜氧化物和46.3K的钡镧铜氧化物，并观察到某些多相的钡镧铜氧化物样品在70K时的超导现象。这一突破性的研究使得国际上蛰伏半个多世纪的超导体研究异常活跃起来。1987年，他荣获第三世界科学物理奖。同年，他领导研究组获得了起始转变温度在100K以上的超导体；1988年，他们首先在TI系氧化物超导体上，又获得转变温度为120K的最高超导体。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的王大中（1980—1982年在联邦德国进修），1986年主持设计建成了我国第一座5兆瓦低温核供应实验反应堆。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投入运行的具有固有安全性的、一体化全功率自然循环壳式核供热堆，也是世界上第一座使用新型水力驱动控制棒的反应堆。5兆瓦堆的运行成功，使中国在低温核供热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的杨卫（1984年美国Brown大学博士），在宏微观断裂过程研究方面，最先得到了准三维裂纹尖端场的解析解及粘塑性材料3型扩展裂纹尖端场，他也因成就突出而担任了远东断裂组织的执委。1993年，国际上最著名的科技出版社——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其专著《细观塑性理论》。

3. 化 学

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赵玉芬（从台湾清华大学毕业的留美博士，1979年回大陆），1988年在第三届国际物理有机化学会上，提出“磷元素调控生物分子活性的功能，其作用类似飞机场的神经中枢——中央控制室”的观点，为人类进一步认识和研究生命本质的奥秘做出了新的贡献。她提出的磷是生命化学过程的调控中心的观点，第一次回答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特·海曼堆地球有

机化学界的挑战课题：大自然为什么要选择磷？她还提出“磷酰基参与反应是生命化学的关键”的学说，并证明之。这些解释生命化学奥秘的新成果目前已被美、日等国广泛运用。中科院化学所的白春礼（1985—1987年留美），在STM（扫描隧道显微镜）方面成就显著，主持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计算机STM原子粒显微镜、AFM—原子粒显微镜、激光检测AFM、低温STM、超高真空STM等仪器，这些仪器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率领的科研组用自己研制的STM在世界上首次观察到DNA（脱氧核糖核酸）三螺旋特殊结构，证实了生物学界的一个伟大推断，世界原子界为之轰动。中科院的朱清时（1979—1981年留美），用一种新的方案在锗烷分子的振动态中首次发现了理论预言的局域模振动态；他还证实了硅烷的一系列振动态，也都是长寿命局域模振动态。这一发现立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为选键化学领域的前途展示了美好的前景。朱清时以其一系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被国际同行公认为选键化学领域的权威，1995年荣获国际“汤姆逊纪念奖”。

4. 生物学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弥曼（196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198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哲学博士），长期从事比较形态学、古鱼类学、古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多。如她在陆生四足动物起源问题上的独到见解，在国际古生物学和动物系统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她对泥盆纪总鳍鱼类、肺鱼和陆生脊椎动物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对传统看法提出质疑，受到国际学术界重视；1985年，她的《云南东部早泥盆纪总鳍鱼类的研究》获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大学生物系的陈章良（1987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早在留学期间就崭露头角，回国后，在北大自己组建的实验室里，和同事们培育出了抗病毒的优质香料烟品种“PK—873”；利用工程烟草植株表达天花粉

蛋白；克服了黄瓜 X、Y 病毒、马铃薯 Y 病毒，以及一大堆严重危害我国重要经济作物的流行病毒等系列成果，均属国际首创，震动了国际生物工程界。1992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他“1991 年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奖”。美国著名的国际学术刊物《遗传》杂志聘他做编委，美国最大的私人研究机构 SCRIPP 请他做研究员，在 SCRIPP 专设“陈章良实验室”。内蒙古大学的旭日干（1984 年日本兽医畜产大学兽医学博士），在留学期间就培育出了世界首胎试管山羊。回国后，于 1989 年又培育出中国首胎试管绵羊及试管羊，此成果被列为当年“全国十大科技新闻”之一；1991 年，他再创世界纪录：首胎冷冻解冻后的绵羊试管胚胎移植产羔。北京农业大学的李赞东（留日生物学女博士），1990 年在北京农大实验成功了我国首例“鸡胚胎蛋壳外孵化成鸡”；1993 年，她实验成功世界首例“鸭胚胎蛋壳外孵化成鸭”。广西农学院的卢克焕（1987 年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博士），在开发牛的体外受精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1988 年获得了世界上首例完全体外化胚胎的双胎牛犊。四川农大的任正隆（1988 年瑞典哥廷根大学博士），在小麦育种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成功地提出了一种诱导染色体异源易位的新方法，解决了国际遗传学界“臂间异源易位系中遗传不平衡”这一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对解决异源易位系大多数不能在生产上利用的国际难题，他提出“小片段易位”的理论和方法及为此成功的诱导技术研究，填补了国际遗传育种界的一项空白。浙江省农科院的陈剑平，在 1989 年 11 月至 1990 年 11 月赴英国洛桑实验站合作研究的后期，解决了国际上三十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难题：小麦和性花叶病毒在禾谷多粘菌介体内的发现和增殖。该成果的设计思想和技术方法被国内外九个实验室多次应用，该成果还被评为 1992 年“全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湖北天池山农科所的谢从华（1989 年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回国后扎根天池山，默默耕耘，诸多成果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其中马铃薯块茎大小控制和预测的数学模型以

及试管块茎的生产与利用技术，在理论和应用上都有重大突破。

5. 医 学

上海市血液中心输血研究所的吴国光（1984—1985 年在美进修），回国后完成的“固相血小板免疫血清学实验的研究和应用”项目，解决了输血学和血液学上的迫切问题，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浙江省医科院的毛江森回国后，开展了甲肝减毒活疫苗的研制并获得成功，使我国的甲肝病源学和疫苗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京医科大学的吴秉铨回国后，在裸鼠内成功地建立了人类高转移癌系，该成果为在人体外系统研究人类恶性肿瘤的生物学特性，揭示人体肿瘤浸润、转移的发生机理，探讨临床治疗方法提供了新途径，系国内首创，在国际上亦属罕见。上海医科大学的曹世龙，回国后在国内首次成功地移植了一例裸鼠人体鼻咽癌。山东医科大学的张运在挪威进修期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利用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对心血管疾病进行定量诊断的新理论，受到国际心脏病学界的高度重视。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张华运，1985 年回国后，完成了甲肝病毒的分离鉴定、甲肝减毒活疫苗的鉴定、特异性抗体检测方法试剂的研制评价等工作，这些工作不仅填补了我国甲肝疫苗鉴定的空白，也为我国新生物制品的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① 留日博士巴得年在留学期间提出的关于高血压免疫学病理研究以及癌发生的免疫学预防的研究，为人类攻克这两大难题开辟了新途径，受到国际医学界的高度评价；回国后他采用的自制白细胞介素进行的癌生物疗法，不仅为国内首创，在国际上亦独树一帜，引起世界同行的重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陈竺（1989 年毕业于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 t（15；17）染色体易位的分子生

^① 参见白瑜：《全国卫生系统留学回国人员取得丰硕成果》，《神州学人》1991 年第 2 期。

物学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白血病基础理论研究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6. 天文、地理学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武向平（1990—1994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留法），出国前在国际天文学领域就已崭露头角，国外四年，更是成果迭出，令人瞩目：在关于星系团中物质分布的研究中，他在世界上首次完成了“星系团—光弧”引力透镜的理论统计工作。国际同行认为，他提出的星系团中心暗致密核的存在，对研究星系团动力学及星系团形成将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他在国际上第一个成功地预言了巨型射电光弧的存在；首次提出了“负成协”概念，从而成功地解释了国际上所有的观测事例；最先提出“星系—星系团”非物理成协理论，并证实了亮射电类星体与阿贝尔星系团之间这种引力透镜的成协存在。回国后，他利用引力光弧独立测得了星系团的引力质量，提出：星系团也许并未达到平衡状态，使用他得到的引力质量可以成功地解决星系团中的重子物质超出疑难。这一成果，被国际权威人士称为将对宇宙学的各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地震界知名科学家马瑾（1958年留苏），于1989—1993年主持完成了国家科委和国家地震局的重点项目“首都地震危害性、震害与对策”，首次把首都圈的地震地质、地球物理与地震危险性分析、震害预测与对策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了多学科的研究，这对于大城市防震减灾综合研究，有重要的科学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许志琴（1987年法国蒙波利埃大学博士），在整个80年代，以新构造观为主导，运用微观构造与宏观构造相结合的新方法，在国内开展了以韧性剪切带为主题的岩石圈变形构造动力学新领域的研究，成绩显著。1987年，她还与法国地质学家一起在中国大别山最早发现了世界第三处超高压的柯石英矿物。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穆穆（1992—1993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学

者), 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大气动力学方程(组)的适应性问题 and 大气动力学中的非线性不稳定性问题, 影响较大。

7. 工程技术学

杰出的控制论科学家宋健(50年代留苏), 是中国现代控制理论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60年代, 他和同伴们完成了中国第一代地对空导弹控制系统的总体设计。在此过程中, 他巧妙地也是最早把最优控制理论应用到了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中, 他还用最速控制理论解决了初制导的快速引入问题。70年代, 他与其他人合作, 建立起了独特的分布参数系统控制理论, 首先提出了飞行器自动驾驶仪的设计理论和设计方案以及其他系列有关的控制理论问题, 这些成果获得中外科学家一致高度的评价。感光材料专家邹竞也是50年代的留苏生, 70年代末, 她在中科院感光所的合作下, 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高温快速加工彩色电影负片和彩色胶卷; 1993年, 她又成功地研制出了接近80年代末国际先进水平的乐凯GBR100彩色胶卷, 完成了“八五”国家技术开发重点项目“ISO100高清晰度彩色胶卷技术开发”。浙江大学能源系的樊建人(1984年奥地利维也纳工业大学博士)和课题组在气固多相流动领域的研究成果, 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如他和岑可法共同建立了描述气固多相流动的脉动频谱随机数学模型; 他们共同提出了大型动力设备计算机辅助优化数值实验的新概念, 并于1992年完成了“计算机辅助优化数值计算实验(CAT)理论及在工程气固多相流动中的应用”这一课题, 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中科院系统所的郭雷(1987—1989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后研究), 在出国前就是国际随机适应控制领域的新星, 留学中更因成绩出色被国际科技界誉为国际随机适应控制领域的学术领路人之一。回国后不久, 就解决了最小乘自校正调节器的收敛速度这一数十年悬而未决的难题, 为享有工业大脑之称的自校正调节器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 他还为自

适应控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1993年,他因这一出色成就荣获国际自动控制界的“奥林匹克”单项世界冠军第12届国际自动控制大会“青年作者奖”。他还在回国的第二年即1990年,就被美国的《控制与优化》杂志聘为副主编。西南交通大学的郑南宁(1985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工学博士)回国后领导课题组出色完成了“863”计划智能机器人主题的“JZR—V精密装配机器人视觉系统”课题,该“视觉系统”的技术指标已达到和超过了美国ADEPT公司XGS—2视觉系统,实现了“863”计划的跟踪创新目标。中国水力水电科学研究所的匡尚富(1989年日本京都大学工学博士),在国家教委资助项目“泥石流汇流机制的研究”中,首次在水槽实验厅研究泥石流汇流现象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为预测灾害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天然坝溃坝机及其泥石流、洪水的预测”中,他首次提出了天然坝溃坝的三种模式,为预测灾害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在桥梁建设方面,张叔辉(1979—1983留英的土木工程博士)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他先后主持设计过重庆北碚嘉陵江朝阳大桥(国内第一座双链式组合箱梁吊桥)、四川云阳斜拉桥(国内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斜拉桥)、四川三台涪江斜拉桥(国内第一座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这些桥梁的建成,促进了我国大跨径桥梁建筑的发展,他开发成功的斜拉桥计算程序被应用于济南黄河公路斜拉桥的设计中,为此荣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斜拉桥技术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桥梁建设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天津大学的胡小唐(1988—1990年留美访问学者)回国后,立即从事“超微针加工技术及系统”这一世界最前沿的课题研究,仅用一年多时间,他和他的课题组便完成了这一课题,研究出了可控纵横比的超微针,其实现反馈控制针尖大小和纵横比的技术为国际独创。专家们认为,他们加工出的超微针已达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纳米技术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此外,他们进行的“亚自由程微观热像成像机理及其应用”也取得了重

大突破，可以用来解决生物工程等领域应用纳米技术问题。浙江大学的褚健（留日博士）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的应用基础性研究。他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非线性系统控制器的分步变换与分步设计理论，并提出了一种非线性观测器及相应的输出反馈控制器的分步设计方法；他还有效地解决了时变时滞或不确定时滞系统的鲁棒控制问题，提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串级回路控制器参数自动整定方法等。他不仅在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将理论成果成功地应用于实际工业系统。在计算机领域，东北大学刘积仁（1986—1987年赴美研修，中美联合培养博士）于1990年创立的“东北大学软件中心”可谓硕果累累。在几年时间内，他以计算机网络协议工程方法学及支撑环境、分布式多媒体技术和嵌入式实时软件开发环境为主要研究方向，承担了“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火炬计划等项目20多个，领导完成了12项重大科研项目，其中5项分别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993年，他领导的集教学、科研、产业于一身的东大软件中心，被国家科委批准为全国惟一的“计算机软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995年，国家科委又将它作为“国家火炬软件产业基地”。

三、跨世纪的科技人才

当今世界，人类已经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知识经济的特征就是知识不断创新，高新技术迅速产业化。而要加快知识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关键在人才。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和知识的创造者与传播者，是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为此，在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各国都需要大批跨世纪的科技人才。

对我国来说，对跨世纪科技人才的需求也许更为迫切。一方面，21世纪对我国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我国能否在经

济和科技方面赶上或超过世界发达国家，屹立于世界先进国家之林，关键就看能否抓住机遇，战胜挑战。而要为 21 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迫切需要造就一大批跨世纪的科技精英和学术带头人。另一方面，我国科技人才的现状却并不乐观，由于十年“文革”、出国潮、经商热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出现了“数量型科学人才断层”的现象。1992 年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高校 3700 名学科带头人中，年龄在 50 岁以下的仅占 5%；到世纪之交，现有副高职称以上科教人员的 80% 将退出教学第一线，90% 以上的学科带头人将退休。^① 因此，跨世纪科技人才亟需大量充实。

正是出于这种对跨世纪人才的迫切需要，90 年代以来，国家、各部委、各高校和科研机关先后推出并实施了一系列跨世纪人才工程，给予跨世纪人才种种支持和重点资助。至今，已遴选出了一批成就出众的跨世纪科技人才和学术带头人。从这些跨世纪科技人才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留学回国人员已成为这一人才群体的骨干力量。

1993 年，国家教委推出的以培养造就年轻学科带头人为主要目标的“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启动，在全国高校遴选了一批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学科点和博士点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并已有突出成果的 45 岁以下的优秀人才。1993 年 12 月，国家教委公布了首批人选的 42 名跨世纪优秀人才，获“跨世纪人才计划”专项基金资助。入选者在农业、能源、材料、生物技术、信息工程、交通运输、化学化工和医药卫生等 8 个领域已崭露头角。其中，陆祖宏、罗毅、白净、郑南宁、刘积仁、李卫华等 23 人有过出国留学、合作培养、出国进修、出国访问学者的经历，占人选总数的 52%。在出国

^① 参见杨卫：《中国需要一代跨世纪科学人才》，《神州学人》1994 年第 1 期。阿牛：《跨世纪人才：世纪末的话题》，《神州学人》1996 年第 2 期。

人员中，又以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者占绝对多数（其中14人为留学博士，4人为中外联合培养博士，3人为出国访问学者，2人在国外做过博士后）。^①1994年，国家教委又确定了76名“跨世纪人才计划”人选者，其中55人为归国留学人员，占人选者的72%。

发现、培养和提高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1992年设立“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的主要目的。1992年，首批14人获得资助，其中杨卫、张泽等11人为留学回国者。1993年，25名优秀人才获得资助，其中从国外获得博士学位者有马志明、赵新生、郭雷等12名（不包括出国进修、访问者）。1994年，有40名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获资助，其中国外获得博士学位者11名。1995年起，“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并轨。在3年里，“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共资助79名优秀科技人才，其中留学人员34名，占总数的41%，这个比例还不全包括出国交流学者和访问学者。^②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国家为促进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跨世纪优秀学术带头人而于1994年设立的。它是目前我国最高层次青年科研资助基金。1994年，首批49位青年学者入选，1995年，又有81人入选。总计在1994年、1995两年中，共有960人申请，而在130名人选者中，就有104人为留学归国人员，占总数的90.3%（其中在国外获博士学位者54人，占42%）。1996年，共有324人申请，84人入选，其中留学博士27

^① 详见牛人：《国家教委确定首批42名跨世纪优秀人才》，《神州学人》1994年第1期。

^② 资助情况参见《神州学人》1993年第7期第12页，1994年第1期第20页，1995年第2期第23页。

人，占 34.2%。

由团中央、全国青联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协办的“中国青年科学家奖”，是专门为中国科技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设立的奖项。它既是目前我国最高层次青年科学奖项，也是“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培养跨世纪青年科技人才为目标，力图为青年科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1993年2月，首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在北京颁奖，在270名竞争者中，共有6人获奖，这6名获奖者都有留学经历，他们是褚丁柱（留美）、张泽（留德）、赵玉芬（留美）、卢炬甫（留意）、盛承发（留美）、谢和平（留美）。1994年11月，第二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揭晓，在282位竞争者中，共有10人获奖，其中8人有留学经历，他们是王诗成（留美）、杨卫（留美）、白春礼（留美）、武向平（留法）、穆穆（留加）、王志新（留美）、陈竺（留法）、郭雷（留澳）。1996年，第三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正式公布，共有15人获奖，其中大多数依然有留学、进修、合作研究、访问学者等出国经历。如袁亚湘、郑南宁、陈剑平、郑泉水、樊建人等，便是广为人知的留学回国人员。

此外，在其他各类跨世纪人才工程中，留学归国人员也都占有较为突出的比例。

90年代后期，我们还可以发现，在全国重点院校和科研机构中，改革开放以来的留学归国人员已成为教授、研究员队伍的主体。大批归国中青年学子开始担负起各领域学术带头人的重任。

教育部副部长韦钰1998年撰文称：“据统计，在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近十几年回国的留学人员占到50%以上；在经过专家的严格评审，跻身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的人选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近几年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在参与国家人事部等七部委的‘百千万人才工程’、团中央的‘中国青年科学家

奖’、中科院的‘百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国家科技部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863 计划’等工程和计划的人员中，近年来学成回国的人员均占到这些工程、项目和计划等人数的半数以上的比例。”^①

以上资料均表明，改革开放后出去的归国留学人员因其特有的知识优势和年龄优势而成为跨世纪科技人才的主体力量。如果说，在现今国内科技界中，主要还是解放前和五六十年代的老一代留学人员在起领导作用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到 21 世纪前 20 年，老一辈留学者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中国科技发展的大梁（从领导到主体作用）将主要由改革开放以来的留学归国人员为主体的跨世纪人才来担任。

四、外国留学生在 中国

接受外国留学生，既是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是否强盛的重要体现。接受留学生在我国本有自唐以来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但自明清之际尤其近代以来，由于国势日衰而导致的中西差距悬殊，留学教育是十分有限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才开始较多地接受来华留学生，这也是当代中国教育的一个明显特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家的日益强大，接受外国留学生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且来华留学生的地域越来越广、人数越来越多，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来华留学热。

新中国接受来华留学生是从 1950 年开始的。是年 11 月 30 日起，波、捷、罗、匈、保等五国首批交换留学生 35 人，陆续抵京，进入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举办的外籍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

^① 韦钰：《出国留学工作二十年》，《神州学人》1998 年第 7 期。